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的文化貢獻

作者 朔雪寒

2022.04.18

內容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的文化貢獻	1
史學四大家之一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的謬誤與文化貢獻	4
原本的子華子是誰不重要：子華子公案	9
先秦諸子繫年	9
結論	11
搞錯時代還是史學大家：宋國子罕囚禁墨子事件	14
結論	16
資料部分	17
考證	20
家譜順序我說了算：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公案	23
先秦諸子繫年	26
〔附〕論詹何、環淵年世〔附：召滑〕	32
朔雪寒駁	34
道德經論正相關考證	38
列子	39
戰國初期中山公子牟	43
戰國後期魏牟	46
兩個公孫龍	53
結論	58
誰才是楊朱的朋友：兩個季梁與楊朱公案	60
先秦諸子繫年	62
季梁考	62
朔雪寒駁	62
楊朱考	63
小結	67
道德經論正相關考證	67
子貢之世父	70

梁王.....	83
田氏之相齊.....	98
爺爺與孫子不是同時人：列子公案.....	122
先秦諸子繫年.....	123
小結.....	128
道德經論正相關考證.....	130
老聃必須消失，孔子才能成為至尊.....	163
先秦諸子繫年.....	166
小結.....	175
道德經論正相關考證.....	176
錢穆《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	176
朔雪寒駁.....	196
錢穆《再論《老子》成書年代》.....	197
朔雪寒駁.....	198
錢穆《老子雜辨》.....	205
朔雪寒駁.....	218
參考書目.....	224
個人著作.....	224
網站與檢索系統.....	224
版權頁.....	225

史學四大家之一錢穆《先秦諸子繫年》 的謬誤與文化貢獻

蒙文通批閱《先秦諸子繫年》稿子，稱錢穆「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

陳寅恪曾說《先秦諸子繫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陳寅恪、錢穆、陳垣、呂思勉」被稱為「史學四大家」。

疑古派大將顧頡剛在日記中稱錢穆的著作：「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以上引自維基百科《先秦諸子繫年》條。）

這些都是疑古派、史學大家對於《先秦諸子繫年》一書的褒獎之詞。也就是說，這些人完全沒有足夠的程度看出錢穆的謬誤所在！甚者可以合理推論，錢穆所用的考證方法，這些人是認同甚至是稱讚的。當然，至少同是疑古派的顧頡剛一定是認同的，因為分析他的考證方法，可以發現很多技術都是錢穆用過的。

以下將用表格形式列出錢穆對於「維護傳統文化」的偉大貢獻。這個表還沒完全好，因為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的謬誤太多了！個人時間不足，因此只能先稍微整理一下那些跟《道德經論正》有關的考證，也順便讓大家看看錢穆所謂的考證，跟真正的考證的差距究竟在哪裡！這些內容會隨著方格子專欄「[古籍與文字考證](#)」相關的考證文章而增加。到時候，很多一般讀者就能看清楚，被捧為「維護傳統文化的國學大師」的錢穆究竟實際上幹了哪些「維護傳統文化的事情」以及他實際的「國學程度」。

目前已經完成了「道家」體系的考證，「道家類」書籍在班固〈漢書·藝文志〉中佔據了九流十家中的一席之地。占比不低。〈漢書·藝文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再看儒家類書籍：「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儒家家數上超過了道家，但篇數上卻遠遠不如！至今還能流傳到今天的道家類書籍已經不多，而錢穆對於中華文化的重要貢獻就在於把這些所剩不多的道家類書籍以及相關作者的真實性、可信性，予以摧毀！不能摧毀的，也要貶低。

以下只是因為目前筆者只寫到了《先秦諸子繫年》「道家」類的部分，不是說錢穆的貢獻僅僅在於摧毀道家，實際上他運用疑古技術所加以摧毀的遍及整個先秦文明。由於《子華子》案內容與時間不屬於任何一家，只是因為牽涉到文子公案，且書中多引《文子》中「老子曰」的內容，並提及許多黃帝的東

西。有黃老道家的思想成分，因此也歸類在此。至於孫子公案，將歸類在「兵家」，等完成《先秦諸子繫年》關於「兵家」的反駁，會再包裝成書，因此這裡只是列出錢穆對於破壞「兵家」類作者、書籍真實性所做的努力，相關文章請參考「兵家類」的反駁！

看完整本書，我想多數人會重新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錢穆是怎麼靠這種素質的東西成名的？又是怎麼把文化破壞到了這種程度卻還能被包裝成「維護文化的國學大師」的？更重要的是，這種程度的水平，怎麼就成了「史學四大家」之一了！而且還獲得了「史學四大家」之一陳寅格的讚賞，所以陳寅格的實際程度如何？不也值得人們思考嗎？

篇名	錢穆的貢獻
五九、 列禦寇考〔附南郭子綦〕	<p>將列子可能從春秋末年一直活到戰國初年的可能性消除，直接指稱《列子》是偽書。歸併了「南郭子、南郭子綦、南伯子綦、南伯子葵」為一人。目的是利用南郭子綦與田和交談過的事實下拉列子的年代，使其只能是戰國初年人。以此抹殺子產、壺丘子林、關尹子、老聃等人的相關事蹟之真實性。</p> <p>目的與結果：列子不是春秋末年關尹子弟子、不是春秋末年胡秋子林的弟子，《列子》是偽書。那些關於壺丘子林、關尹子與列子的事蹟都是假的。</p>
一四六、 魏牟考	<p>錢穆在考證過程中，完全迴避歷史上有兩個「公孫龍」的事實，更絕不去談，魏文侯以孔子弟子子夏為師、孔子有弟子公孫龍的事實，也不去談魏文侯手下禮遇或重用了其他儒家弟子如子夏弟子段干木、子貢弟子田子方、曾子弟子吳起、李克的事實，從而巧妙的迴避了兩個公孫龍誰最有可能跟魏文侯之子交談的問題。錢穆在這裡直接把「春秋末年被趙襄子所殺的代君、戰國初年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戰國後期被趙國滅國的中山王尚」全部拿來「歸併」成「戰國後期與平原君手下公孫龍交談過的魏牟」。一次性消滅了多項歷史史實與多位人物、抹去了重要的思想傳承脈絡（道家、名家思想）與學派之間的關係（早期道家與儒家）。</p> <p>目的與結果：消滅戰國初年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的真實性、當然也包括他是魏文侯之子、他是中山王尚的祖先的事實，更重要的是將他所寫的被班固等人歸類為道家類書籍的《公子牟》打成了偽書。雖然根本沒人看過這本書。但因為高誘已經註明《公子牟》就是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寫的、《列子》也引用過。因此把中山公子牟的人格權與著作權加以取消，這本書自動的不再是戰國初年的著作，而把這本書認定為戰國初年著作的所有文獻自動被錢穆認定為是錯誤的、偽造的。</p>

<p>〔附〕 論詹 何、環 淵年世 〔附： 召滑〕</p>	<p>作為〈魏牟考〉的附錄。這裡錢穆直接把「楚莊王」時的「詹何」、與中山公子牟對談的「瞻子」都歸併到錢穆自以為的楚懷王時代的「詹何」身上。而其目的就是為了下拉《老子》的成書時間與真實性、消滅老聃。而這裡當然也僅僅就是利用了「瞻詹」都有「詹」字符的文字構造，然後就把不同時代的人都歸併了。所以這一次更絕了，錢穆把兩個分處不同時代的真人直接歸併成他自以為卻其實沒有證據的假人身上，或者更精確的說是他把其中一個拉到了戰國中後期，然後再把另一個歸併到這個人身上。</p> <p>同時錢穆也把老聃的弟子「蜎淵」與戰國中後期的「環淵」歸併成了一人。更被說成是楚懷王時的「詹何」的弟子。儘管完全沒有任何證據，沒有任何推論過程。就只是因為錢穆找到了「蜎」有被寫成「環」或反之的案例。於是兩個不同時代的人又被歸併成了一個人。</p> <p>目的與結果：老聃是假人、《老子》是戰國時代的偽書又找到了新的證據。因為把老子的弟子都說成是戰國中後期的人，老子還能是春秋末年的老聃嗎？《老子》還能是春秋末年的書嗎？</p>
<p>四四、 宋信子 罕之計 而囚墨 翟考</p>	<p>錢穆搞錯司城皇喜的年代，以為是司城皇喜放逐了宋後昭公。考證過程將錢穆缺乏訓詁學基礎，濫用文字對應，缺乏歷史知識的缺點嚴重暴露。</p> <p>（這一篇由於牽涉到楊朱篇的考證，因此一併收入道家系列。）</p>
<p>七九、 季梁考 〔附： 季真〕</p>	<p>錢穆要讀者去參考楊朱篇的考證，結果楊朱篇的考證直接使用了要讀者去參考楊朱篇考證的季梁篇的猜想。而歷史上的兩個季梁，也就莫名其妙的被錢穆一句話，簡單粗暴的歸併成了一個人。於是春秋末、戰國初年的楊朱的朋友季梁就被歸併到了勸諫魏惠王不要攻打邯鄲的戰國中期的季梁身上。而楊朱比季梁晚死，自然活過了魏國攻打邯鄲的戰爭。楊朱就被下拉到了戰國中期。至於證據？不需要！</p> <p>目的與結果：春秋末、戰國初楊朱的朋友被歸併到了戰國中期奉勸魏惠王不要攻打趙國邯鄲的季梁身上。楊朱被拉到了戰國中期，自然所有提到楊朱的人只能在這個時間點之後，所以《列子》既然收錄了楊朱，就表示《列子》的作者不可能是關尹子的弟子列子，自然只能是偽書。</p>
<p>八〇、 楊朱考</p>	<p>錢穆用季梁篇的「考證」結果（其實是猜想結果）直接把楊朱下拉到了戰國中期。而全然不提，這時候的孟子、莊子、惠施都與魏惠王有過交集，卻從來沒有任何除了季梁以外的戰國初年以後的人與楊朱有過交談，包含莊子以為惠施可以與楊朱相提並論，這些人卻從來有沒交談過。而楊朱交談的對象其實不是自己的老師老聃、自</p>

	<p>己的兄弟楊朱、自己的朋友季梁，就是墨子的弟子一輩人，而墨子弟子與墨子的年代最早就是春秋末年。這些錢穆都不提。而他這篇考證也主要是在貶損楊朱的影響力。以為去信孟子所說楊朱的話能遍天下，那是愚蠢的事情。</p> <p>目的與結果：貶低楊朱的影響力。盡可能削減其真實性。既然楊朱沒什麼影響力、事蹟缺乏真實性，那麼疑古派就可以不用去談春秋末年的老聃怎麼跟戰國中期的楊朱交談的邏輯與常識問題。既然楊朱已經變成了戰國中期的人，那些把楊朱說成是春秋末年的人的文獻自然都是假的。道家文獻《列子》自然是偽書、《莊子》相關提到楊朱、墨子的部分也被當成了後人偽造的。因為錢穆認為這些都是受到了孟子影響的，只能產生在孟子之後，至於考證、證據，免了。</p>
七二、 老子雜辨	<p>將老聃弟子文子、蜎淵、關尹子做一次性消滅。說文子不可信，將蜎淵、關尹子這些各有自己的著作傳世並且記載也很確實的人物，歸併到戰國末年同樣有明確記載的環淵身上。而完全不管這些人各自有自己交談的對象，完全不管司馬遷、班固區分這些人很明確，完全不管這些人有各自的著作傳世。完全不管，只要名字上有可以扯到的點，就把這些人直接消滅掉。</p> <p>為了消滅列子是關尹子弟子的問題，則繼續把壺丘子、狐丘子林歸併，然後說孫叔敖時代的人怎麼可能跟列子交談！所以列子事蹟又被打成假事！</p> <p>最後當然不忘最後的王者目標老聃。所以根據名字上有相似點，於是錢穆就把春秋末年孔子之師老聃、楚莊王時人詹何、戰國初中期的周太史儋等歸併成一人，至於叫什麼也不重要，因為反正事蹟都不可信。也就是說把老聃等人都打成假的還不夠，消滅還不夠，事蹟還要說成都不可信！</p> <p>目的與結果：一次性消滅老聃以及其弟子、再傳弟子群，把整個道家師承徹底搞亂，下拉到戰國末年。所有觸及的道家書籍都成了偽書，人如果不能消滅的都是假人，事蹟都是假事蹟。妥妥的全是偽造的！所以孔子之師老聃的事蹟既然都不可信，弟子們也都是假的，不僅弟子們是假的，甚至說弟子蜎淵才是老聃的老師，顛倒師承關係。把道家一鍋端了，當然就沒有人可以搶奪孔子的至聖先師的地位了！所以至此，從老聃開始的弟子傳承：文子、蜎淵、關尹子、楊朱、關尹子弟子列子，全數消滅、詆毀、貶低完畢。一句總結：人是假的、書是假的、事也是假的！</p>
八九、 子華子考	<p>錢穆在考證過程全不討論《子華子》的原始作者程本的任何相關事蹟，直接判定《子華子》是偽書，沒有任何證據與推論過程。而「子華子」也被簡單粗暴的直接隨便拿戰國時代的幾個名字帶有</p>

	<p>「華、子華、子華子」的人物頂上，說這些人才是原始《子華子》的作者，至於誰看過所謂的原始《子華子》，原始《子華子》講什麼？跟錢穆所謂的偽書《子華子》有什麼關係？有什麼差別？全然不談。「春秋末年孔子朋友、晏子門客子華子程本、戰國中期魏國人子華子（應為華子）、楚國楚威王時人沈尹華、莫敖子華」都被錢穆歸併成了一個人。而證據與邏輯並不存在，就單純是一個名字或稱謂上帶了「華、子華、子華子」，邏輯與證據，是不需要的。</p> <p>目的與結果：消滅春秋末年程本為子華子以及寫下《子華子》的事實，把程本打成假人、《子華子》打成假書。</p>
七· 孫武辨	<p>消滅孫武，將春秋末年的孫武的人格權予以取消，將十三篇《孫子兵法》打成偽書。《孫子兵法》成為戰國孫臏（孫武後代）的作品。而孫武的相關事蹟也變成了假事。</p> <p>目的與結果：孫武是假人，孫子的事蹟是假事、《孫子兵法》是假書。（反正是一個懂兵法的人寫的，但那個人絕對不准是春秋末年的原始作者孫武就對了。）</p>
八五· 田忌 、 鄒忌 、 孫臏攷〔附司馬穰苴〕	<p>將孫武與孫臏歸併成一人，同時否認孫臏的一些事蹟（成了假事）。即使是孫臏的兵法《齊孫子》也是假書。並且也把春秋末年的司馬穰苴歸併到戰國時期的田忌身上。司馬穰苴的事蹟成了假事、人也成了假人、書也成了假書。《司馬法》不是春秋末年司馬穰苴寫的，是戰國時代的司馬穰苴寫的。所以一堆人又都歸併成了一人。</p> <p>目的與結果：孫武與孫臏被歸併成了孫臏，孫臏的某些事蹟被當成假事，而孫武的事蹟也被當成假事。至於孫臏的兵法也還不是真書，必得是後人才能寫出來的書。反正就是假的。所以即使錢穆把《孫子兵法》的作者說成了孫臏，孫臏也未能享受什麼美譽，然後孫臏自己的兵法也被說成了假書。孫武與孫臏變成一人、司馬穰苴與田忌也變成了一人，本來不同時代的人，居然又被歸併了。</p>

原本的子華子是誰不重要：子華子公案

錢穆所謂的考證，其實多數都只是在複述古代疑古派的謬誤，我們仔細去看他每一條的說法，就能發現很多嚴重的邏輯弊端。這種弊端充斥全書（包含《先秦諸子繫年》、《國史大綱》）。在《孫子兵法論正》、《道德經論正》已經指出錢穆對於孫子公案、老子公案中所表現出的邏輯水平，但那種東西實在太長了，錢穆光是老子公案，在不想認敗的情況下，就前前後後堆疊了三大篇資料，但其實卻不講邏輯！所舉出的證據，不是與推論沒有因果關係（相對或絕對），就是毫無關係的兩件事被牽扯到了一起！

可是這種素質的東西，出版社、中研院還在推波助瀾的推廣！這是怎麼回事呢？最近台灣商務印書館結合一幫中研院的研究人員以及院士，要來推《國史大綱》，想把這本書捧成新史學，就不免讓我又想多說幾句了！錯誤那麼多的東西，究竟還要靠這些媒體、老牌出版社、中研院的標籤誤導多少人？出版的書籍敢不敢指出那些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甚至謬論的地方？當然不敢！否則還需要不停的攻擊我的相關文章與封鎖我的出版之路嗎？（出版社拒出版、中研院拒搞、募資平台拒絕募資出版！）

那麼那些長篇大論一般人看不下去，就更別提去錢穆那混亂的邏輯中理出頭緒了！所以我們接下來一篇一篇來看他的錯誤！也不怕社團、臉書繼續封殺（移除連結），能多讓一個人看到就多讓一個人少被誤導，勉強有點價值了！

今天就先看一下已經被《《子華子》公案徹底終結》解決的「子華子公案」看看錢穆怎麼考證的？其中（朔雪寒註：）為筆者自註與提問或反駁，其他文字都是原書所有。

先秦諸子繫年

〈先秦諸子繫年·八九、子華子考〉：

〈呂氏春秋·貴生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曰：兩臂重於天下，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所爭輕於韓又遠。奈何愁身傷生以憂之？」梁玉繩云：「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此事又見〈莊子·讓王〉，《釋文》司馬云：子華子，魏人也。」今按：韓、魏爭侵地，的在何年，已無可考。〈莊子·則陽篇〉又稱：「魏釐與田侯牟約，田侯背之，犀首請伐齊，華子聞而醜之，惠施乃見戴晉人。」牟乃午字之誤。其時在惠王早年，犀首、惠施均未仕魏，《莊子》蓋寓言無實。（朔雪寒：怎麼證明犀首那

時候還沒在魏國服務？這種說法本身就需要證明，而且也幾乎不能證明，因犀首的相關史料太少了！根本不足以證明！而且既然引出了這一段，不就是想要說明什麼嗎？結果錢穆又自己說「《莊子》蓋寓言無實」，那他引出這一段的理由是什麼？而且這個「華子」怎麼就變成了「子華子」了？如何證明兩人實為一人？）〔參讀《考辨》第七〇。〕大約子華子與韓昭侯、魏惠王同時，乃可信也。（朔雪寒註：為什麼孔子跟程本的事蹟就不可信，〈呂氏春秋·貴生篇〉提到「子華子」的事蹟就可信？而且錢穆連提都不提了？當然，如果無盡的懷疑，那相信疑古派都無法寫出任何人類能正常理解的文章。〈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韓嬰是西漢初年人，而他給出的這一段是引用了古籍「傳」的說法，這表明西漢以前這故事就存在了，為什麼這裡都被忽略？考證一個人的生平，就這樣草率？而事實上根據《《子華子》公案徹底終結》的考證，兩個子華子根本是兩個人！就好像那時候春秋有孫子、戰國也有孫子一樣。這乃是當時的稱謂常識，問題是錢穆連證明都沒有，就說兩個人是一個人了！如果這種簡單粗暴的想法、邏輯套用到所有考證上，那麼一大堆古人都要消失了！譬如孫子就得消失其中一個！是的，大家都沒猜錯，這正是錢穆考證孫子公案時的基本邏輯！）〈呂氏·貴生篇〉又引《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其言論實承楊朱一派，為後來道家宗。（朔雪寒註：按照《道德經論正》、《《子華子》公案徹底終結》的考證，程本與楊朱同時，都受到老子影響，《子華子》引用了很多的《文子》（記載老子言論）的文字。而楊朱、孔子又都是老子弟子，且孔子自己引用了老子五十幾次的言論，孔子門下的重要弟子也都有引用，《文子》在當時就是很重要的書籍，程本就算引用，也只能算在老子學派，而不該算在楊朱學派！關於孔子引用案例，可以參考以下連結：[道德經論正系列文章：孔子徵引老聃言論五十幾次的案例](#)）故高誘注《呂覽》，以為古體道人也。《誣徒》《知度》《審為》皆引子華子言，或是秦前原有其書。

《漢志》無著錄，則劉向時書已亡。今本系宋人偽作，謂子華子即程本，亦非是。〔《韓詩外傳九》：「戴晉生弊衣冠見梁王，辭而去」云云。晉生即晉人，相其議論為人，亦華子一路。此等皆在楊朱後莊周前，俱道家思想展衍中人物也。〕（朔雪寒註：這到底哪裡考證了？「《漢志》無著錄，則劉向時書已亡。」這兩件事本身並無必然的邏輯關係，這是基本的邏輯素養啊！可是疑古派很愛用這種邏輯、用一本目錄有沒有著錄來論斷一本書是否曾經存在的根據。但事實上，以《《鬼谷子》公案徹底終結》中《鬼谷子》的情況可以看出，很多時候不是劉向沒有著錄，而是被班固或後人刪除了！當時的文人還是

知道這本書，或者知道這本書是在當時的目錄中有著錄的。而錢穆「今本系宋人偽作，謂子華子即程本，亦非是。」「戴晉生、此等皆在楊朱後莊周前，俱道家思想展衍中人物也。」也沒有提出任何證明，就這樣隨便幾句，同樣的文章，同樣的風格，累積成了一本書，就能被學界捧為經典？不可思議！）

又〈呂氏·去宥篇〉：「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沈尹華疑即子華子。如匡章稱章子，田盼稱盼子，田文稱文子也。沈尹為楚姓。《左傳》宣公十二年「沈尹將中軍，」〈墨子·所染篇〉「楚莊染於孫叔沈尹，」沈尹華當其後人。又《楚策》有莫敖子華，疑亦一人也。（朔雪寒註：從以上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錢穆所謂考證的「瘋狂隨意性」。只要有「子華」的都能說成是同一個人！有點統計學常識與基本東周歷史素養的人都應該知道，春秋戰國時代以單名為主，撞名、撞字的情況根本稀鬆平常。名字就那幾個，撞名不是很平常嗎？根據《孫子兵法論正》舉出的案例，春秋時代一大堆同名的人，根據《考證概論》舉出的統計，春秋戰國時代也有一大堆同稱謂的名人！結果錢穆這裡怎麼操作？就是把有「子華」兩個字的人都不需要經過證明的牽扯到一起，叫做「疑亦一人也」！那麼我們看到這裡，究竟看到了什麼邏輯推論？有什麼東西證明了什麼？沒有！〈漢書·古今人表〉分別記載：「鄭敖子華（前）、沈尹華（後）」並且位子僅相隔一位。這明明就是兩個人，錢穆也不用什麼證據，就直接「疑亦一人也」！然後一堆錢粉也就毫不思索的加以接受了！而凡是這類對錢穆推斷不利的證據，錢穆就不提。譬如錢穆利用〈漢書·古今人表〉把「壺丘子林、狐丘子林」搞成一個人，但是對於魏牟、對於鄭敖子華、沈尹華，這些不利於他隨意胡謔的推論，他就刻意不提！）

又按：楚威王元，已值韓昭侯二十四年。其後六年，昭侯卒。又五年，威王卒。今如定威王元，華子年四十，則其生在楚肅王之初年。相其年代，當較楊朱、季梁稍後，較惠施、莊周稍前，而皆為並世。

結論

文中附註已經反駁的就不多說了！實際上，楊朱是春秋末、戰國初年人，是老聃的弟子。（請參考《老子弟子與老子》一書關於楊朱的考證。）

看了錢穆這段文字，我敢保證讀者一定沒有看到哪怕一段出自對《子華子》一書內容的討論，而只看到《呂氏春秋》轉引的其中一段。由於錢穆把老聃滅了，所以把楊朱擺在了戰國時代魏惠王時，既然要說子華子是楊朱一派，自然不能把子華子說成楊朱之前的人！不然就說不過去！但對於錢穆所謂戰國

時代的人如何就能保證看到同時期另一位思想家的書的哪怕一點證明，也沒有提出！至於《子華子》全書說什麼？錢穆完全可以不提！但這在疑古派的手段中，非常常見，在孫子公案不提《孫子兵法》、在老子公案不提《老子》、在鬼谷子公案不提《鬼谷子》，然後這些書就莫名其妙成了偽書！這樣的操作是疑古派基本操作，因為他們確實缺乏應有的能力！

也就是說錢穆在考證一個人的歷史、一本書的真偽時，可以完全忽略去討論這本書究竟在講什麼？可以完全忽略所有不利於他這種主張的證據！甚至，直白的說，我們難道不該懷疑，其實錢穆壓根就沒看過《子華子》嗎？

而這樣的欠缺邏輯分析、欠缺史料支持，並且完全忽略《子華子》作者程本的所有事蹟以及《子華子》內容的討論，究竟有什麼價值？譬如討論一下《子華子》中子華子、程本跟誰交談過？有沒有露出破綻？程本引用過哪些書？提到哪些史事？有沒有露出破綻？程本使用的詞彙有沒有超越那個時代的情況？程本與孔子的事蹟究竟哪裡有破綻？究竟哪裡有問題？

什麼都沒有！

錢穆除了轉引《呂氏春秋》，承認古代有《子華子》，而且還是他認為的戰國時代的「子華子」寫的。他並不談論《子華子》的內容，而這讓他犯下非常可笑的錯誤，因為《子華子》一書裡程本（子華子）都在跟春秋時代的人交談！而《呂氏春秋》引用的部分也確實出自《子華子》一書之中。如果說錢穆想要證明還有另外一本《子華子》，那他得證明！可是他沒有！而一本春秋時代的書籍，就這樣被打成偽書了！連討論它的內容都屬多餘了！

至於為什麼一本要把自己偽裝成是跟春秋末年孔子交談的程本所寫的書籍的作者，卻去扯一個戰國時代沒什麼人談論的「（戰國）子華子」來當自己作者的名字，而全書裡面卻連一點戰國時代的特徵都沒有，疑古派都沒有任何哪怕一點的解釋。我們從最簡單的思維來入手，為什麼一般正常人要偽造一本春秋末年的書，卻去扯一個戰國時代的人來當作者？而且是去拿一個戰國中期楚威王老師這種人的名字來當作作者。這根本就不合理。要偽造書籍，難道就不能自己編個名字？難道在春秋時代找不到其他人，卻還要去戰國時代來找？而且誰不找，居然去找一個有威名的楚威王的老師來當作者？這腦子還行嗎？而且由於《子華子》絕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與春秋時代的人，諸如晏子、趙簡子手下、孔子弟子與自己的弟子交談，以至於說這本《子華子》的作者卻去抄了戰國時代「子華子」的東西，就顯得非常可笑！而且《子華子》中程本與孔子的交談其實很少，如果是想要借用孔子的名號，難道不該多談一些？反正都是假的，多偽造一些有什麼差別？可是《子華子》並沒有這樣的內容，反而只是

如實的反應了他離開趙簡子去投靠齊國晏子的相關事蹟。如果偽造者愚蠢到需要去抄一個戰國時代作者的文字，那麼他的水準也就這樣，那麼他在整本書的篇幅下能不犯錯嗎？可是我們無法在《子華子》中找到任何只能屬於戰國時代的特色！

像錢穆這樣一篇其實比朱熹的考證還不如的資料與猜想雜湊而成的文章，對於考證子華子其人其書毫無任何價值可言！知道的人都知道！但這樣毫無價值的文章，卻也毫無意外的會繼續藉由這個被塑造出來的「國學大師」品牌而繼續發揮它的影響力「今本《子華子》是偽書，因為錢穆說的！」！

可是最令人納悶的一點是，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裡面把一大堆的先秦諸子打成假人、書打成假書，發揮他的影響力讓人自動不去研究！結果一個把先秦文化破壞到如此地步（請參看《先秦諸子繫年》）的人，居然被塑造成了一個「維護傳統文化的國學大師」！這不禁讓人啼笑皆非！

《子華子》公案已經徹底終結，想要理解錢穆與朱熹等人的差距，以及什麼才是正確的考證書籍的方法，可以參考《**《子華子》公案徹底終結**》。

程本，字子華，春秋末年人，著有《子華子》。與老聃、孔子、趙簡子、晏子、楊朱同時。與孔子有一面之緣，孔子在這場交談中命令子路送禮物給程本，遭到子路以不符合禮儀為由拒絕，這件事情因此被其他子書所廣為收錄。程本曾在齊國與孔子的弟子公析哀有過交談，為程本主動上門拜訪，關於孔子弟子公析哀（齊人，字季沈。）的存在僅在《子華子》與《孔子家語》兩本春秋末年的著作中提及。

搞錯時代還是史學大家：宋國子罕囚禁墨子事件

認真去看錢穆的文章，越看越會好奇，他究竟是怎麼走到今天這種地步，被包裝成國學大師的！今天只是隨機挑一篇來寫，就發現可笑錯誤。

這一篇錢穆講「宋國子罕囚禁墨子」事件。不僅這裡犯的錯很可笑，甚至連維基百科的相關條目也要幫錢穆遮掩，怎麼遮掩呢？我們來看看今天擷取的這一段：「宋後昭公」條：「宋後昭公請墨子到宋國參政，拜為宋大夫，稱「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事」。楚國在楚惠王、楚聲王時曾兩次包圍宋都，未能攻克。晚年任用戴歡為大宰，司城皇專政，二人互相殘殺。後司城子罕擊敗戴歡，又驅逐了宋後昭公，宋後昭公在邊境潛心改過，三年後又被迎回復位。在位 65 年。」（維基百科：2022.4.9 檢索）

這一段一般人應該看不出任何問題！正是因為如此，才顯得其如此可笑！「戴歡」其實是「戴驩」，但如果把人名寫正確了，就會被引導到「戴驩」的連結，從而發現錢穆連時代都搞錯了。再看看「司城皇專政」，刻意的把「皇喜」的「喜」拿掉，這樣也就不會自動出現連結，把大家導到「皇喜」的條目，從而讓大家又發現錢穆又搞錯了時代了！那麼看看這一條前面是怎麼寫的：「宋後昭公」一開始的註解就是引用錢穆的說法：「《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宋前後亦有二昭公。《韓詩外傳》六，《賈子先醒篇》並有昭公出亡反國事，皆指後昭公言。而高誘注《呂覽》，謂春秋時子罕殺宋昭公。（見《召類》。）此當由戰國時子罕與後昭公同時，擅權逐君，高氏誤記，遂謂在春秋時也。（梁玉繩《呂子校補》則謂高注子罕殺昭公為無據。）據此則翟當與宋後昭公同時。」既要吹捧錢穆的發現，又要幫忙遮掩錢穆的錯誤，真是辛苦啊！

好了進入正文。讓我們先來看看錢穆開下的笑話。當然也別忘了，中研院等一大群歷史學者還要繼續幫錢穆的《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繫年》抬轎的事情喔！

其中（朔雪寒註：）為筆者自註與提問或反駁，其他文字都是原書所有。

〈先秦諸子繫年·四四、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考〉：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鄒陽傳〉作子冉，誤。考子罕有二人。一在春秋魯襄公時，〈呂氏春秋·召類篇〉，稱其

「相平公、元公、景公，以仁節終其身」者也。其事蹟詳《左傳》。一在戰國初年，韓非〔《二柄》《外儲右下》《說疑》諸篇。〕李斯〔《上二世書》，見《史記》本傳。〕韓嬰〔《詩外傳》七。〕劉安〔《淮南·道應》。〕劉向〔《說苑·君道》。〕諸氏書，言其劫君而擅政者也。（朔雪寒註：很難得的錢穆沒把兩個「喜」字的宋國官員再次合併成一人！）韓非《內儲》，「皇喜與戴驩爭權，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左傳》子罕樂喜字，則此子罕乃皇喜字也。殺者，《孟子》殺三苗於三危，《虞書》作竄。《左》昭元，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殺、蔡」互通，謂竄逐放之耳。子罕劫君當為昭公。（朔雪寒註：錢穆為了把時間搞亂，特地指出「蔡、殺」古代可通假，「蔡」表示「竄逐放之」的意思。這是完全誤解了所謂通假的說法。「蔡、殺」通假是指「蔡」因為音近而被通假為「殺」，說直白一點，「蔡」就是錯字。而「蔡」這裡也就是假借了「殺」字而非「放」字，註釋者註釋出「放」其實是錯誤的，應該註釋成「殺」。因為「殺、蔡」音近通假但「蔡、放」沒有，且「殺」也無法假借為「放」。把「放」說成「殺」，只有說者記憶失誤可以解釋，〈史記·管蔡世家〉：「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蔡叔度既遷而死。」、〈春秋繁露·五刑相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淮南子·齊俗〉：「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淮南子·泰族〉：「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其中董仲舒、劉安各有一次把「誅管叔、蔡叔」連著說，於是可見「殺蔡叔」的說法。但「放」沒有「殺」的意思，兩字也無法通假。〈尚書·虞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大戴禮記·五帝德〉：「孔子曰：……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淮南子·脩務〉：「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史記·五帝本紀〉：「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從這裡我們不難發現，僅有孔子的說法拿「殺三苗於三危」來與「殛鯀於羽山」配對，這可能是出自孔子的修辭或記憶失誤，其他都是「竄、遷」，說法的不同，不表示兩個字可以相通。這是很基本的訓詁學知識。否則，古代異文、後人改造前人出現失誤，難道這些莫名其妙的對應文字都能相通不成？但錢穆如果不這樣做，他就很難掰下去了！）宋前後亦有二昭公。

《韓詩外傳》六，〈賈子·先醒篇〉並有昭公出亡反國事，皆指後昭公言。而高誘注《呂覽》，謂春秋時子罕殺宋昭公。〔見《召類》。〕此當由戰國時子罕與後昭公同時，擅權逐君，高氏誤記，遂謂在春秋時也。〔梁玉繩《呂子校補》則謂高注子罕殺昭公為無據。〕據此則墨翟當與宋後昭公同時。（朔雪寒註：高誘確實誤記，而高誘當時春秋戰國的分界常常搞錯，呂不韋既然提到了孔子，高誘便自然的以為殺宋昭公是春秋時的子罕。其實殺宋公的是戰國中期的子罕，高誘錯了！墨子確實與楚惠王、宋後昭公有交集，而這個子罕也只是專權，並沒有殺宋後昭公。）〈史記·孟荀列傳〉：「墨翟為宋大夫。」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孫詒讓則斷為正在昭公時。《年表》昭公薨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孫氏《墨子年表》云：「疑昭公實被放弑，墨子之囚，殆其末年事。」余考昭公末年在周威烈四年，去墨子止楚攻宋已逾二十年。墨子若仕宋，應即在止楚攻宋後。子罕劫君擅權，並不在昭公之晚節，則宋囚墨翟，烏見其必在昭公之末年乎？大體在昭公三十一年以後，則頗可定也。

結論

我們先看一下韓非、〈呂氏春秋·召類〉的原文。

〈韓非子·內儲說下〉：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呂氏春秋·召類〉：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隳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輓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

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

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高誘註：按春秋子

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

看完以上兩段話，可以清楚的看出，錢穆為了把宋後昭公與皇喜扯到一塊，不惜亂用訓詁學的通假現象。而且宋後昭公死期與皇喜篡位相隔五十年左右，硬要把兩人扯在一起，這符合錢穆喜歡把「有相同名字的人消滅其中一個」的奇特考證想法。

而這裡最大的問題不只是錢穆搞錯了皇喜篡位的對象，而且他刻意忽略了〈呂氏春秋·召類〉孔子針對子罕的評論問題。**請問春秋末年的孔子是怎麼可能去評論一個戰國中期的宋國官員呢？**這不是常識問題嗎？結果錢穆把這些段落都隱藏起來，也不加以解釋、討論，目的何在？

關於子罕囚禁墨子，我在〈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的考證中已經考證得非常詳細，囚禁墨子的正是春秋時代的子罕，因此更加確立了墨子的生卒時間段落。由於錢穆根本搞錯皇喜年代，以至於鬧出這些笑話。如果按照錢穆的說法，那麼墨子要被皇喜囚禁還得跑到戰國中期了！而那時候吳起都死了數十年、墨家鉅子都不知道傳到第幾代了！（吳起死後，墨家鉅子是宋國田襄子。吳起死前是楚國孟勝。）

結果維基百科相關條目的人，既要引用錢穆的說法來捧一下錢穆，又要幫忙遮掩一下錢穆的失誤。於是把「戴驩」改名、把「皇喜」去名，以免把大家引導到正確的連結，真可謂用心良苦啊！

以下是〈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關於子罕與墨子的相關考證，請先閱讀相關資料再閱讀考證，以免不知所云！關於墨子的完整考證，請參考〈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其中已經藉由墨子的人際網路，證明墨子主要與春秋時代的人交往，而這既牽涉到墨子公案，也牽涉到楊朱公案。這些以後都會陸續提到！

資料部分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新序·雜事三〉：

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於諂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呈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

〈漢書·賈鄒枚路傳〉：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陽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紇，乃從獄中上書曰：……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

〈禮記·檀弓下〉：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不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左傳·襄公六年〉：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

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呂氏春秋·召類〉：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犖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輓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

〈新序·刺奢〉：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輓，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束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荊，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說苑·反質〉：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

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

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

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

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史記·太史公自序〉：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長弗能廢也。

〈左傳·哀公七年〉：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強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

〈淮南子·道應〉：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考證

司馬遷「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至劉向「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無「而」字，「罕」變為「冉」；至班固「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信」再變為「任」。根據文穎註：「子冉，子罕也。」則兩字當是音近而誤。「信、任」形近而誤。

根據西漢人鄒陽的敘述：「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孔子離開魯國是可信的，那麼宋國子罕是誰呢？東周時代春秋宋國有一

個司城子罕、戰國宋國也有一個司城子罕，此外再無其他宋國子罕的記載。當然，沒有記載不表示沒有。但以現存文獻來說，春秋末年這個司城子罕的職位是司城，司城即是司空，係宋國為了避宋武公的諱而改的。根據〈左傳·哀公七年〉的記載，則宋國司城可以「聽政」，根據〈左傳·襄公六年〉那麼這個子罕也是有很大的權力的，如果根據〈淮南子·道應〉等先秦子書所載戰國宋國司城子罕專擅刑罰一事，則春秋宋國司城子罕也當有相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呂氏春秋·召類〉直接指明宋國的司城子罕歷任宋國「平公、元公、景公」之宰相，並且「以終其身」。宋平公於前 575 年至前 532 年在位，宋元公於前 531 年至前 517 年在位，宋景公於前 516 年至前 469 年在位。則此子罕確實與墨子的時間存在客觀事實上的交集。因為墨子能見楚惠王，而楚惠王其在位時間為前 489 年至前 432 年。正與宋國宰相司城子罕時間有極多重疊之處。以前 489 年至前 516 年計之，則是 27 年。

鄒陽曾與枚乘等文學家游於吳王劉濞門下，這一篇又是《獄中上樑王書》用以自救，除非是作者自己記憶失誤，或者後人傳鈔失誤，否則實無理由去質疑這則記載的可信度。那麼按照鄒陽的說法，則宋國曾經因為子罕的計謀而囚禁墨翟。宋國司城子罕，於魯襄公六年（當前 567 年）首見記錄，於魯襄公二十九年（當前 544 年）便沒有記錄，則此時宋國司城子罕已經在位 24 年。如果比照叔向、晏子的壽命與在位時間，這還不算長。並且完全符合〈呂氏春秋·召類〉所說司城子罕歷任宋國「平公、元公、景公」之宰相的時間記載。更重要的是根據〈呂氏春秋·召類〉的描述，則顯然這位司城子罕是信從墨家的節儉之主張的，其稱：「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這不正與墨子自己陳述的理論以及司馬遷對墨家的相關描述近乎一致嗎？所以說「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其背景顯然更為複雜，甚至超乎人們的想像。更重要的是，楚王因為士尹池的說法而「故釋宋而攻鄭」，儼然就是「止楚攻宋」的「先聲」了！

而最重要的是，孔子對這件事發表了評論，這表示士尹池這件事是發生在孔子去世之前，也即前 479 年以前。士尹池這種藉由出使其他國家，以確定是否可攻的做法，在春秋末年是很普遍的做法，包含晉文公（〈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六〉：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趙簡子（〈呂氏春秋·召類〉：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都曾經使用過！且針對「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孔子也曾經發表相關評論！可惜「宋陽門之介夫」一事未能點出誰是當時的晉

侯！否則對於司城子罕的死期就有了更精確的推斷！如果以實際能對晉國是否攻宋下令的晉侯來說，晉出公開始便無可能了！如此則有「晉昭公、晉頃公、晉定公」三個人選，加上孔子曾經評論此事，則最大可能當是在位於前 512 年至前 475 年的晉定公。不管如何，從以上的資料也能知道，士尹池的做法符合其時代特徵！

如此一來，顯然鄒陽所說是完全符合這個時代的氛圍的！宋國司城子罕確實有可能、機會與能力「囚墨翟」，我們雖然不清楚子罕這麼做的用意！但顯然，宋國司城子罕（樂喜）以魯襄公六年（當前 567 年）首見記錄為二十歲計算，則其至宋景公卒年之前 469 年已經過了一百二十歲，若以當時叔向八十歲而韓平子仍去向其請教為例，則以司城子罕八十歲「囚墨翟」，則當前 507 年左右；以九十歲「囚墨翟」，則當前 497 年左右。以子罕八十歲時，墨子至少二十歲計之，則墨子約生於前 527 年；以子罕九十歲時，墨子至少二十歲計之，則墨子約生於前 517 年。因此僅以鄒陽此說與〈呂氏春秋·召類〉所透露出的重要信息，則按照一般人類壽命衡量，墨子的生年無論如何都在春秋末年，孔子死前！

家譜順序我說了算：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公案

「中山公子牟」事件牽涉到列子公案，列子公案又牽涉到楊朱公案、季梁的考證，要解決列子公案，必須先解決幾個小公案，這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從這個公案先說起。

「中山公子牟」這一個稱謂本身的信息量就很大，一是為什麼不直接叫做「公子牟」就好了，還得加上「中山」來加以「區別」或「突出其身分」？一般而論，那是因為有兩個同名的人存在，因此如果其中一個有比較特出的區別特徵，就會使用這一個。如果沒有其他特徵可以區別，就會採用類似「子+X子」的方式來加以區別，譬如子華子程本等。戰國初期的「中山公子牟」與戰國後期的「魏牟」都是出自魏國，都是魏國公室的後代，唯一的區別正是「中山公子牟」是被他老爸魏文侯封在魏國剛攻滅的中山國的「魏國公子」，而「魏牟」只是一般公子甚至只是魏國公室後裔，所以拿「中山」來放到「公子牟」以示區別兩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否則，把「公子牟」上面加上一個「中山」就很難解釋其目的！

戰國初期「中山公子牟」與戰國後期「魏牟」的差異還有一點，那就是「中山公子牟」有比較完整的家譜。他首先有老爸魏文侯，這一點高誘、張湛都提到，並且班固也指出《公子牟》的作者是早於莊子的，且高誘延續班固註而給出了更詳細的信息就是這位中山公子牟就是魏文侯之子；第二點，他在「中山國」有後代，也就是「中山國」第二次滅國的「中山尚」。魏文侯之子被魏文侯封在「中山」，然後他在中山國有後代，這不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嗎？更重要的是這些信息都是有史料支持的。而且中山國被滅之後，趙國就把「中山王尚」遷到了「膚施」軟禁了，趙武靈王也把「代、中山」這些地方封給了自己的兒子趙章，趙章成為「代安陽君」，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稱他為「代君章」！這些都是《史記》詳細記載的。換句話說，中山國被滅之後，管理這些地方的人已經是「代安陽君」趙章。但錢穆刻意隱藏後半段資料，只是為了解釋為什麼「中山公子牟」要冠上「中山」兩字。錢穆為了「合理化」（不是證明，就是編個故事）自己的猜想，因此不惜罔顧「政治常識、歷史知識」，於是說中山尚、魏牟就是同一個滅國之君，而且滅國之後還能擁有原有中山國當自己的封地，甚至還可以繼續不管封地的管理事務，而到處跑！至於被遷到「膚施」軟禁的滅國之君怎麼能到處跑，還自稱或被稱起「魏

公子牟」來，甚至因此還能繼續領有中山國做自己的「封地」（封地是趙章的錢穆也不提），錢穆沒有任何解釋！

反正讀者面對這麼多歷史、這麼多文言，不是有絕大的耐心，很難看「透」！等被文字迷障了，誰還記得那麼多！遑論胡扯的東西，究竟是要什麼解釋？然後一個道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中山公子牟」就被消失了！而一個拜儒家子夏為師的魏文侯，他的兒子成了道家思想重要人物這樣的事實，自然也消失了！從而也就不需要再討論了！而同時，由於《列子》記錄了「戰國後期魏牟」的事蹟，也就表明了這不是關尹子弟子列子所寫的書，也就表明了這是一本偽書了！所以只能說，疑古派的觸爪到處伸啊！

那麼錢穆是怎麼把戰國初年的中山公子牟說成戰國末年的魏牟的呢？

錢穆的作法很簡單，就是「消滅其中一個公子牟」。那麼錢穆提出了什麼證據嗎？沒有！那麼錢穆怎麼取消魏文侯與中山公子牟的父子關係？一句話，錢穆覺得是錯的、假的！證據呢？沒有證據！那麼錢穆怎麼解決「中山公子牟」這個「中山」的問題？錢穆扯中山國滅國之後，魏牟還可以到處跑，去跟平原君、公孫龍交遊，說因為公孫龍是墨家門徒、中山國也是受到墨家影響而亡國，所以就把受到墨家影響這件事扯到了關於人的考證上。而卻完全不提誰是「中山王尚」、「中山王尚」與「中山公子牟」有什麼關係，而是直接把「中山王尚」當成了「魏牟」！不提戰國後期的公孫龍才是向魏牟學習的人，不提為什麼他滅國之後還能把中山國當封地、不提為什麼滅國後他還能到處跑、不提為什麼滅國後他卻被人叫做「公子、先生」。整個所謂證明，就是一大堆的猜想與猜想，然後東牽西扯編故事，簡單粗暴！為了扯這一點，錢穆又扯到其他史料講到「代君」「滅亡」於信奉墨家學說這則史料，因為錢穆不知道墨子的真正活躍時間，也刻意隱瞞了他常用的〈漢書·古今人表〉提到「代君章」的事實，於是就說「代君」就是「中山君」的錯誤。而其理由是春秋時代「代君」當時墨家學說尚未盛行，而不提戰國時代與魏牟、中山王尚同時的「代君章」。但中山國有兩次滅國歷史，而且當時墨家學說都已經盛行。但錢穆也不需要解釋、證明、推論，反正就直接說這個代君就是第二次滅國的中山君，直接把「代」跟「中山」畫上等號。簡單粗暴！然後錢穆也不理會司馬遷記載中山國滅國後，中山王尚被遷到「膚施」軟禁的事情！以為滅國的王還可以到處跑！還可以繼續治理自己的中山國。趙國、燕國、齊國大家聯合攻打中山國打了半天，中山尚還能把中山國變為自己的封地（罔顧趙章的存在）。這種想法，既非常缺乏歷史與政治素養，更是令人覺得非常神奇！

所以整理一下相關信息，關於「中山公子牟」、「魏牟」的考證，有多少東西被忽略或直接被說成錯誤（請注意，錢穆這種做法不叫做考證）：

1．中山公子牟的父親是魏文侯。而魏文侯的老師是孔子弟子子夏，孔子最年輕的弟子則是公孫龍。

2．春秋末年孔子還有一個弟子叫做公孫龍。而魏文侯的兒子要想跟兩個公孫龍之一誰交談，跟魏文侯的老師的最年輕的同門公孫龍是唯一的可能。但錢穆完全不提有這個公孫龍存在的事實。自然也不會有任何相關的考證。

3．中山國第二次滅國之君中山尚是中山公子牟的後代。

4．最後一任代君是被趙襄子所殺，而事實上，劉安只是說「代君為墨而殘」，不表示這個代君就是被趙襄子所殺的代君，不表示他就是亡國之君。而且既然「代君」已經「殘」了，魏牟怎麼還能活著到處跑呢？

5．中山國兩次被滅，第一次是魏國所滅；第二次是被趙國、燕國、齊國三大國聯合圍攻而滅的，第二次被滅的中山王尚信不信奉墨家都無法阻止多國聯攻。但錢穆不提兩次中山國被滅的歷史，不提中山國第二次滅亡的實際原因。只是想把墨家扯進來，以牽合「代君為墨而殘」這個信息模糊的說法。

6．趙國滅了中山國之後，把中山王尚遷到了「膚施」。錢穆引出之後就忘了。然後也刻意忽略下文提到的，趙武靈王封長子趙章管理攻下來的代、中山一地，而成為「代安陽君」的事實。既然「代、中山」已經歸「代安陽君」管轄，魏牟何來什麼封地？而且班固已經明白說出了「代君章」，「代君為墨而殘」的「代君」即使不是春秋末年被趙襄子所殺的「代君」，也該是指「代君」章。但錢穆也不提，反正把資料隱藏著，誰會去找？而且趙國不只有「代君章」，還有「代王嘉」，兩人都處於一個墨家學說興盛的時期！要天馬行空的胡謔，代君章之後還有代王嘉，怎麼也輪不到毫不相干的「中山王尚」吧！

7．〈荀子·非十二子〉：「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這跟墨家學說有什麼關係？難道不是背道而馳？可是錢穆完全不提。而且劉勰指出「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鴉鳥，非妄貶也。」（〈文心雕龍·諸子〉）表明魏牟曾嚴厲批評公孫龍「白馬、孤犢」之說的荒謬，試問怎麼會受到他的影響呢？

那麼錢穆扯什麼呢？

1．代君就是中山王尚。理由是代君之時墨家學說還沒興起。至於第一次中山國滅亡時，墨家學說早已興起，錢穆不談。第二次中山國滅亡時，代君章一次統管了代與中山地區，錢穆也不談。也就是明明就有一個在墨家學說百分

百盛行的時候的「代君」存在，但錢穆不談，刻意隱藏！就是為了下拉中山公子牟，玩他最擅長的人物歸併遊戲！擾亂整個中國學術史、哲學史與歷史。

2·公孫龍是墨家學徒。所以是他影響了他所學習的對象魏牟，而非相反。至於荀子對魏牟學說的批評，錢穆不談。魏牟對於公孫龍的貶低，錢穆不談。

3·中山王尚就是魏牟。因為代君的代國的滅亡就是因為信奉墨家學說。所以代君就是中山王尚；而魏牟跟公孫龍有來往，受到公孫龍墨家學說的影響。且中山王尚喜歡賢人（所以喜歡賢人跟荒廢政事兩件事又被錢穆莫名其妙等價起來），所以他滅國就是因為他信奉墨家學說（所以只有墨家學說喜歡賢人，信奉墨家學說都會滅國，魏文侯也喜歡賢人，結果魏國不但沒滅亡還更強了，但錢穆也不提。惠施也受墨家學說影響，魏惠王還尊稱他為仲父，但魏國當時也沒滅亡，錢穆也不提。）。儘管根本沒有史料支持中山王尚信奉墨家學說。而跟魏牟（不是中山公子牟）有關的事蹟也僅有跟公孫龍、趙王、穰侯、應侯（一事兩傳，或為穰侯，或為應侯）交談過，不知道究竟魏牟如何喜歡賢人了？而且從魏牟與公孫龍、趙王交談的內容來看，兩人都稱不上所謂的賢人！但對於錢穆，這些完全可以忽略。

至於這些「故事」中間欠缺多少證明與環節，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所以錢穆所謂的「繫年」多數都在幹這種工作，把名字上有相關性（如子華子公案裡的華、子華、子華子）的或者能扯上哪怕一點點關係的（如代君與中山王），都直接暴力歸併！然後下拉時代，完成疑古、繫年偉業！

那為什麼這樣一篇累積了一大堆文言材料的東西，也沒什麼證據，也沒什麼合理的邏輯推論，就是作者自己主觀認為的東西，一個處處充滿漏洞的故事，卻能被學界所認同呢？時代病了！不然，我還能說什麼呢！

先秦諸子繫年

〈先秦諸子繫年·一四六、魏牟考〉：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云：「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今按〈莊子·秋水篇〉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龍既後於莊子，牟與龍同時，其年輩亦較莊後明甚。（朔雪寒註：錢穆一開始就先來個倒因為果了！因為非常奇特的事情是遍觀錢穆的文章，他似乎不能容許同名同姓的人存在不同的時空啊！因此，本來是兩個人，被他直接搞成了一個人。然後他再來用後面那個人的事蹟來指責、證明其他關於前面那個人的事蹟都是錯的！這種缺乏基本常識的東西，我實在想不透，怎麼中研院一大堆人都

看不出來呢！〈莊子·秋水〉：「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沕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這個公孫龍既然能知道莊子，就表明了這裡的魏牟是莊子時候的人而不是莊子所稱道的那個人！〈莊子·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這個才是班固所說莊子所稱道的那個「中山公子牟」，而且絕不混淆！這個「中山公子牟」也不會口出莊子的言論！明明就是兩個人，結果錢穆的世界觀只容許一個人具備有一個姓名，以至於類似這種把兩個人搞成一個人的荒謬事件，普遍存在於他的考證文章之中。且〈漢書·古今人表〉記載「魏公子牟」在「嚴周（莊周）、惠施」之後。而〈漢書·藝文志〉記載《公子牟》作者在莊子之前。可見班固區分甚明。錢穆曾經用〈漢書·古今人表〉瞎整「壺丘子林、狐丘子林」為一人，這時候班固給出了對其不利的信息，就乾脆不提了。反正誰會為了一個不出名的作者做考證呢？）《秋水》所記，亦謂牟稱莊，非莊稱牟也。班說自誤。〈列子·仲尼篇〉云：「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為公孫龍釋七辨。」此為牟、龍同時之證。張湛《注》云：「公子牟，文侯子。」公孫龍時，文侯沒且百年，張《注》誤也。後人疑《列子》為張湛偽書，然如此條陳義精卓，蓋得之古籍，或即四篇之遺，非湛所能偽。（朔雪寒註：只要對疑古有用的，那些已經被疑古派打成假書的，他所記載的相關文字就突然都可信了！而在把《列子》打成假書的時候，就說這本書是假的，完全不可信！至於證明？那是多餘的！人多就能贏！所以你要在先秦時代談列子的哲學思想，就得面對疑古派的謬論；但偏偏就是沒人把疑古派所謂張湛偽造的《列子》當成魏晉南北朝的思想來談！也就是說這本書一旦被扯到了疑古漩渦，你想去談，就不容易！談了，卻沒有解決疑古公案，那也沒人信！）湛《注》蓋本高誘。高誘注《呂覽》云：「公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中山，得之，以封公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魏滅中山在文侯世。〈史記·魏世家·索隱〉：「文侯既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史記志疑》論中山復立事云：「中山復立不知的在何時，《國策》述常莊談謂桓子，中山復立之故，殊不可信。中山滅於魏文十七年，當趙烈侯元年，安得在桓子之世？〔按：《中山策》言桓子自誤，然《志疑》依《史記》言文侯年亦誤，辨已見前。〕《樂毅傳》有中山復國之語，亦不言在何時也。《經史問答》謂：中山復立在魏惠王二十八年後，亦非。《趙世家》書與中山戰於房子，在敬侯十年，即魏武侯十年，〔按：此記趙、魏年

數亦誤。」明年，趙又伐中善，戰於中人，安得復立在惠王之二十八年後。殆不可考矣。」今按《韓詩外傳》卷八：「文侯封子擊於中山，其使趙倉唐來言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倉唐再拜獻之。」又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不當以名。」則自擊時，中山已儼為一國，同諸侯矣。〈說苑·奉使篇〉亦載此事謂：「倉唐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然則中山非能復國，乃魏之別封耳。〔趙襄子滅代，乃封其兄子周為代成君，與此略似。〕其後更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則中山之君乃魏文侯少子魏摯之裔，而公子牟亦其後人。（〈墨子·所染篇〉：「中山尚染於魏義樞長。」《閑詁》引蘇說云：「中山為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摯，至赧王二十年，為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為尚者，當為最後之君。」今按《呂氏春秋》高《注》：「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其說誤。蘇氏謂中山封自文侯少子摯，是也。（朔雪寒註：高誘這個註解是與他註解中山公子牟說是魏文侯之子相符的。錢穆什麼證據也沒有，直接就说這是錯的！）考《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一，引《史記》：「趙武靈王以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君尚於膚施。」則中山最後一君名尚，又得其證矣。《閑詁》據〈水經·滹水注〉，及《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為魏所滅。」謂：「尚或即桓公」。不知桓公為魏滅，尚為趙滅，不得混並為說。然則桓公乃中山之君，而武公則為魏滅中山後，中山別封之君。蘇說姑引《世本》，未能剖辨，亦失之。〔參讀《考辨》第五四〕。）〔又《魏世家索隱》：「魏文侯滅中山，子摯守之，後尋復國。」張文虎《笱記》據毛氏單行本《索隱》，乃「其弟守之」。按《呂覽》自知：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其弟即指少子摯。《索隱》此條，下語未瞭，疑有脫誤。〕（朔雪寒註：少子摯明明是魏文侯的另外一個兒子，這一點〈說苑·奉使〉：「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都有記載，錢穆引了這一段就莫名下了結論，把魏文侯的兒子變成了他的老弟！這不荒謬嗎？而且他上面還說：「蘇氏謂中山封自文侯少子摯，是也。」這時候又說「其弟即指少子摯。」一下子是兒子，一下子是老弟！到底是什麼？而且魏文侯「其弟守之」與後來魏文侯把中山封給自己的兒子不但不矛盾，甚至正好符合了魏文侯臣下任座的抱怨：「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正是因為原本是魏文侯之弟守護剛攻下的中山，但魏文侯最後卻將中山封給了自己的兒子，所以任座出言責罵！〈史記·魏世家〉：「齊

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按：魏文侯滅中山，其弟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這種註解也只能是唐朝人的註解，而且註解者會犯錯難道不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嗎？遑論魏文侯弟守中山在魏文侯把中山封給自己兒子前也確實是事實，難道能因為魏文侯之弟曾經守中山就說註釋者指明的魏文侯的兒子是他的弟弟嗎？而且這種錯誤從錢穆以前的人就流傳下來，又藉由錢穆繼續流傳，究竟何時能停止？〈史記·六國年表〉：

「（魏文侯）十七（前 408 年）。擊守中山。伐秦至鄭，還築洛陰、合陽。」則魏擊守中山最遲在前 408 年就開始了。）余考中山復立，蓋在趙烈侯十年，〔詳《考辨》第四三，又第五四。〕即魏文侯之四十八年也。《年表》梁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為相，正以魏與中山本屬一家，猶如齊封田嬰於薛，而薛公父子入為齊相。故中山公子亦或以魏氏稱，而公子牟亦稱魏牟。後人不察，因臆測為即魏文侯公子封中山者也。（朔雪寒註：錢穆的思考邏輯真的非常奇特。明明高誘、張湛都指明了中山公子牟就是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既然是魏文侯的兒子他當然叫做「魏牟」了，什麼叫做「故中山公子亦或以魏氏稱」？中山公子本就是魏氏後代！且高誘又指出中山尚是公子牟的後代。其他史料也指出魏文侯確實封了自己的兒子到中山。那麼中山君本來就與魏國有血脈上的關係！究竟後面的人為什麼要因此臆測什麼？這從頭到尾不都是錢穆自己在猜東猜西，隨便牽扯嗎？而且在錢穆的觀念裡面，竟然不允許同名同姓的人存在！一個歷史學者，一個備受推崇的學者，竟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想法！不是令人感到震驚嗎？而且明明高誘、張湛都已經指出《公子牟》的作者就是魏文侯之子，究竟說到這裡，錢穆提出了什麼證據來反駁？並沒有！而且他只是反覆論述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事實，那就是中山國被魏國攻下之下屬於魏國的領土！把一個大家已經知道的事實，包裹在這一串大串的論述之中，居然就能把中山公子牟變成了魏牟，把兩個人說成了一個人，這是何等厲害的考證方法！更厲害的是連中研院的一大票學者都還在繼續追捧充滿類似質量的考證！不可思議！本來中山公子牟就是魏文侯之子，他叫做魏牟也屬於正常。請問誰「後人不察，因臆測為即魏文侯公子封中山者也。」？哪個後人？誰臆測了？什麼證據都沒有，然後一個重要的道家思想人物就這樣消失了！更可悲的是，後來是趙國第二次滅了中山而不是魏國。究竟戰國後期的魏牟憑什麼自稱或被稱為一個早就滅亡的國家的「公子」？他自稱或被稱為「中山公子」的意義何在？而且既稱「公子」豈不是在說這魏牟是中山國王室的後代？結果本來是中山公子牟後代的中山尚一下就反過來成了魏牟的前代了！錢穆短短幾句莫名其妙的話，就直接把人家的家譜給倒轉了！至於證據？並沒有！）〔雷氏《義證》亦

主中山乃文侯少子摯後，惟謂惠王時為相者即公子牟，則年代亦誤。〕《魏策》：「中山恃齊、魏以輕趙」，又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則中山固猶恃魏宗國，為其後援矣。《燕策》蘇代說魏王絕宿胥之口，鮑彪引「徐廣曰：《紀年》，魏救中山，塞宿胥口。」徐廣引見〈史記·蘇秦列傳〉，今脫一中字。朱氏《存真》云：「此未詳何年事。《趙世家》趙武靈王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俱攻中山，當魏襄王之十三、十四、十六年也。」今考吳師道、梁玉繩皆定中山亡在武靈二十五年，正韓、魏、齊、秦敗楚重丘之歲。所謂「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也。其前魏嘗救中山。宿胥口，朱氏謂：「今衛輝濬縣西南有宿胥故瀆。」魏救中山而塞宿胥，正如齊救邯鄲而圍襄陵矣。陳氏《集證》疑「中山之地與宿胥遼絕，何由魏救中山而塞宿胥乎？」因不信有魏救中山事，其實非也。然則中山固恃魏援，魏亦救中山，良以魏與中山，本出一宗故也。（朔雪寒註：按照錢穆這種邏輯，那齊國救邯鄲，不就表示齊國與趙國「本出一宗」？一個簡單的外交關係、國際形勢的權衡，硬被拉來扯到了血緣關係！豈不可悲！）又《中山策》云：「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此與《列子》書言子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正合。（朔雪寒註：按照錢穆這裡白紙黑字的說法，錢穆的意思是《列子》所記的子牟是趙主父時的中山之君！可是趙武靈王時的中山之君明明就是「中山尚」啊！趙國滅中山國在前 296 年，趙武靈王死於隔年前 295 年。這表明了中山之君只能是中山尚，中山尚明明白白的名字怎麼突然就因為一個「好與賢人游」的行為就被拿來與中山公子牟畫上等號，從而被說成是戰國後期的魏牟了！而且上面錢穆還說：「則中山最後一君名尚，又得其證矣。」那麼按照錢穆的意思「公子牟」就是「中山尚」，可是兩者的關聯，有沒有其他解釋？沒有！這裡錢穆把「戰國初年中山公子牟、戰國中期中山王尚、戰國末年魏牟」全部合併成了一個人！錢穆這種荒誕不經的做法，普遍存在於他的考證之中。〈戰國策·趙策三·建信君貴於趙〉：「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歸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趙奢被封為馬服君是在前 269 年的閼與之戰之後，請問如果魏牟原本是中山國國王，他的中山國滅了以後他不但沒死，還能這樣到處跑嗎？這種種莫名其妙、不符合古代知識與常識的東西，在錢穆看來只要隨便幾句話，用一

堆沒有邏輯關聯的東西隨便的串起來，就成了結論了！更荒謬的是，錢穆說這個魏牟就是中山之君，那中山國滅了之後，怎麼魏牟居然自稱或被稱為是中山「公子」呢？不是應該稱為「中山君牟」嗎？甚至誰會這樣稱呼或被稱呼呢？而且列子記載「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這是中山公子牟的兩件事件，但李疵對中山王的評價頂多符合「與賢人游」，如何能證明他也「不恤國事」？這本來就是兩件獨立事件，魏文侯也朝賢，難道他也「不恤國事」嗎？）〈淮南·人間訓〉：「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代乃中山之誤。〔參讀《考辨》第三十三。〕〈呂氏春秋·應言篇〉「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可證當時中山之信墨。（朔雪寒註：所以只要有人去你的國家與你的臣屬辯論，不管輸贏，都表示你信這種學說嗎？錢穆這是在考驗人的智商嗎？）〔《寰宇記》引《國策》云：「中山專行仁義，貴儒學，賤壯士，不教人戰，趙武靈王襲而滅之。」此則即據李疵一節潤澤自為文也。〕公子牟與公孫龍交好，而篤信其說。龍為墨徒，則牟亦墨徒，其所好皆墨徒也。〔其書《漢志》入道家，如宋鉏亦墨徒，而班《注》稱其言黃老意。戰國晚世道家，本頗取墨義也。〕（朔雪寒註：錢穆又開始天馬行空的胡謔了！「戰國晚世道家，本頗取墨義也。」誰？哪個道家？道家在墨家之前，這裡卻變成了道家取墨家之意了！而且究竟是哪個道家取了墨家的意，這些意古代道家沒有嗎？是不是應該指出一下，而不是這樣隨便來一句？「公子牟與公孫龍交好，而篤信其說。龍為墨徒，則牟亦墨徒」這又是什麼邏輯？所以孔子是老聃的弟子，孔子弟子也都該信奉老聃，為道家徒？還是凡是與孔子交遊的人，也都可以被說成道家徒？）故後人謂中山為墨而亡矣。公子牟或如平原、信陵，當國而見信於其君者也。（朔雪寒註：錢穆這種說法合乎常識與邏輯，甚至有案例嗎？趙國滅了中山國，然後繼續把舊王留著統治中山國？然後還能讓你到處跑？而且公孫龍面對一個亡國之君會這樣說：〈莊子·秋水〉：「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公孫龍稱魏牟是「先生」！這符合中山國國君或封君的地位嗎？而且遑論按照錢穆的謬論，他就是中山君，也就是中山王！他是誰的公子？中山國在中山成公之後就稱王了，這點歷史知識，錢穆不知道？錢穆上面還引出趙惠文王「遷其王於膚施」的歷史，怎麼這裡就忘光了？中山王既然已經被遷到了「膚施」，他跟中山國還有什麼關係？中山國還能繼續成為他的封地？這種荒謬想法豈不是嚴重欠缺歷史常識的表現嗎？春秋戰國時代有哪個國君，他的國家被滅之後，他還能繼續管理這個國家成為封君的？而且如果是封君，他也理應稱為「中山

君」啊！怎麼會稱為「中山公子」呢？遑論劉安「代君為墨而殘」有說「代國」因此滅亡嗎？代君被殘，能等價於代國滅亡？）

《趙策》：「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前世坐此者多矣。」此可以定公子牟之年代，又可以窺公子牟之為人。牟雖亡國之公子，其見重於當時者，有以也。（朔雪寒註：錢穆一直在說公子牟就是亡國的中山王，這裡怎麼就稱他是「亡國之公子」？誰會叫「亡國之君」為「亡國之公子」？）考應侯封在秦昭王四十一年，明年為趙孝成王元年，上距趙武靈攻中山三十六年。其後十一年，應侯免相，又四年平原君卒。上距滅中山五十年。慮中山之滅，公子牟年不出三十。至平原之卒，牟年已逾七十。《趙策》建信君貴於趙，公子牟通趙，趙王迎之，論尺帛。建信君與秦文信侯呂不韋、楚春申君黃歇同時，其貴幸或在平原卒後。則公子牟之卒，殆亦後於平原，年壽當近八十也。〔〈說苑·敬慎篇〉作公子牟游秦辭穰侯，穰侯較應侯稍前，亦無不合。然固當從《趙策》為是。〕余前論莊子卒歲當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間，〔《考辨》第八十八。〕周赧二十六年，公子牟至少亦三十二歲，〔以武靈攻中山，便年二十計之。則牟自及見周矣。吳師道云：「魏牟上及莊子，下及應侯，無疑。」〕

〔附〕論詹何、環淵年世〔附：召滑〕

又按〈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竊疑子牟身在江海，心在魏闕，其殆為中山既亡之後事。故曰隱岩穴，難為於布衣。瞻子，〈淮南·代應〉作詹子，即詹何。其與子牟問答，應在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世。《淮南》全篇又云：楚莊王問詹何，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此莊王即頃襄王也。〔參讀《考辨》第一三一。〕（朔雪寒註：任何「詹」氏只要具備一定的德性與學問，在那個時代都能稱為「詹子」。可是錢穆不懂，所以他就是要把人消滅掉！把人虛假化、把事實、真事變成假事、錯事！至於他考證詹何的年代的謬論，等講

到了那一則再來談。《道德經論正》已經指出其荒謬性了！暫時就不再引用了！因為這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大公案：文子公案！）

又考《楚策》：「楚王問於范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其事又見〈史記·甘茂傳〉。「甘茂奔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秦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楚王問范蠡。」茂奔齊在秦昭王元年，芹迎婦於楚在二年。然則楚王、范環問答，亦在是時也。范環、范蠡，皆蠡、環字訛。蠡環即環淵，值楚懷晚節。其游齊稷下，則當宣王末，或湣王時。其人尚應與莊周百世。而詹何與中山公子牟問答，中山亡已值楚懷暮年，則詹何、環淵宜亦得並世，而環淵稍前，詹何稍後。〔即猶謂關尹在前，老聃在後也。參讀《考辨》第七二。〕殆或有類於荀況之與孟軻，否則莊周之與公孫龍也。《漢志》顧謂「環淵師老子」，其然，豈其然？（朔雪寒註：〈漢書·藝文志〉：「蠡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顯然，錢穆偽造了歷史！「蠡淵」與「環淵」不同時代的兩個不同姓氏的人又被莫名其妙的搞成了一個人！僅僅因為錢穆找到了「范環」又被稱為「范蠡」，於是春秋末年老聃弟子「蠡淵」就莫名其妙的成了「環淵」了！兩個人又被合併成了一個人，春秋時代的人又被虛假化了！自然他那春秋時代的書也只能被錢穆等說成是戰國時代的書了！這叫做考證？）

又按：范環之語楚王曰：「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策》《史》文略同。〕〈韓非·內儲說下〉作干象告楚王，前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云云，賈誼《過秦論》，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則召滑蓋楚懷王時，而為楚亡越有功者。

〈先秦諸子繫年·三三、趙簡子卒年考〉：

又按：《戰國策》、《史記》載襄子滅代事云：「趙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世家》敘其事在越圍吳後，《年表》其事在襄子元年。若簡子固以魯哀二十年卒，則代滅在魯哀之二十一年也？呂覽記此事，謂簡子卒，襄子服衰登夏屋，始以姊妻代君，亦異。〈淮南·人間訓〉：「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嚙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其時墨子初生，墨術未起，烏有為墨而殘之事？其後趙武靈王時，中山君好墨而亡於趙，豈《淮南》乃誤中山為代耶？

朔雪寒駁

由於錢穆要把「中山公子牟」與「魏牟」合併成一人，於是不得不解釋「中山」兩個字的由來！而他的做法就是扯中山亡國是聽信墨者非攻之說。但其實這根本是對墨家的學說的無知啊！墨家當時為什麼會如此興盛？正是因為其「非攻」學說與相應的「守城技術」。《墨子》一書留下的「守城技術」在〈備城門〉以後諸篇。因此說因為信奉墨家學說就導致中山國亡國，這是胡說八道的推論！而且「非攻」不等於「偃兵」，兩者有相似之處，卻是不同的兩種主張。

那麼錢穆憑什麼說中山尚因為聽從墨家學說而亡國的呢？他的理由是：
〈呂氏春秋·應言〉：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

墨者師曰：「然。」

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

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

司馬喜曰：「然。」

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

司馬喜無以應。

從上文可見，這段文字只是描述了有一位墨者師，前去中山國，在中山王面前與宰相司馬喜辯論。即便司馬喜與墨者師辯論輸了，怎麼就能推論中山王信從墨家學說了呢？請問中山王信從墨家學說的描述文字在哪裡？所以司馬喜辯論輸了，就能推論出中山王信從「非攻」學說？這裡有哪怕任何邏輯與文字可以支持錢穆這種猜想？沒有！而且信從「非攻」學說不但無法與其滅國畫上等號或者說成是他的起因。甚至如果嚴格執行「非攻」，那麼國家實力得以保存！趙國想要攻下，得花更大的力氣。而且根據以下的事實，則明顯中山國亡國乃在於中山王禮遇賢者，跟墨家學說尤其「非攻」學說根本毫無關係：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

主父曰：「何故可攻？」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

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

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

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戰國策·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

主父曰：「何以？」

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

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其中李疵所說「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這頂多也就跟「上賢」扯上邊，問題是儒家也「上賢」啊！怎麼見得就是墨家了！怎麼又跟「非攻」有關了？難不成這些賢者都是「墨者師」不成？所以中山君的滅亡根本無法扯到墨家尤其非攻學說，試問錢穆扯「代君」又扯「司馬喜辯論輸了」，跟事實究竟有何關係？

錢穆另外引的一則是：〈淮南·人間訓〉：「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他認為「代乃中山之誤。」要讀者參考這一篇，然後這一篇說什麼？

〈淮南·人間訓〉：「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其時墨子初生，墨術未起，烏有為墨而殘之事？其後趙武靈王時，中山君好墨而亡於趙，豈《淮南》乃誤中山為代耶？

所以錢穆在這裡說「其時墨子初生，墨術未起，烏有為墨而殘之事？」於是「猜測」「豈《淮南》乃誤中山為代耶？」，於是僅僅因為他自己搞錯了墨子的時代，然後就隨隨便便的把「代君」當成了「中山君」了！「代、中山」不相同的東西，隨隨便便就等同起來了！然後這裡還在猜想，下一篇就說這裡

已經考證了！於是「代君、中山公子牟、中山王尚、魏牟」都成了一人了！了不起啊！

不過很不幸的是，「代君為墨而殘」，「代君」死於趙襄子之手，其實是趙簡子死後的事情。而當時墨子的學說早已興起。並且「代君為墨而殘」不表示「代國因此滅亡」，就好像前兩句「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都只是君主自己的遭遇而與國家無關，燕國沒有因為子噲之死而滅亡，魯國也沒有因為魯哀公被削而亡。所以究竟這個代君指哪一個代君，根本是不確定的。代君的「殘」如果不是指他本身（腦袋被趙襄子刺客砸碎），那麼也跟中山國的「滅」不是同等概念。要強說代君就是中山王，在文字意義上已經說不過。遑論，怎見得「代君」不是指「代安陽君」的簡稱？須知「代安陽君」是真實存在的，且趙章因為發動沙丘之亂，最後被趙成、李兌所殺也符合所謂「殘」的概念。就文字上「代安陽君」確實可以說是「代君」因為就是一個簡稱的慣用法。所以如果錢穆或其他人要把歷史這些瞎扯，首先就得把中山國第一次滅國與代安陽君的可能性加以排除！遑論究竟是誰描寫過「代君為墨而殘」的事蹟呢？遑論墨家學說在趙襄子之時已經興起了呢！（從宋國子罕囚禁墨子的考證可知）

因此，這一則不但不能證明所謂「中山君聽信墨者之言而亡國」的猜想，甚至剛好可以為證明墨子的早出多得了一項鐵證。另外一個佐證這種說法的荒謬是中山國亡國這件事是被記載在墨家經典《墨子》之中的。

〈墨子·所染〉：

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

〈呂氏春秋·當染〉：

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高誘註：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義、長，其二臣也。〕，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

雖然，從考證的角度可以確定「中山、宋」兩句是出自後人「典範累增」下的產物（參考〈先秦諸子與老子·墨子〉），也就是把相關的亡國典範添加

到了原始文本之後的普遍作法。但即使如此，要知道〈墨子·所染〉是墨家經典，即使西漢初年以前的人再怎麼不學無術，也不可能把「因為信奉墨家學說而亡國的典範」放到墨家經典之中。所以「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出現在墨家經典之中，恰好從情理上駁斥了錢穆的猜想。而且原文的意義都在於君主信任了錯誤的人，跟墨家學說根本無關！反倒與李疵的說法相合了。因為中山王愛好賢者，於是受到了「魏義、偃長」這兩位賢者的危害！使其人民厭倦農耕與作戰，最終敗給了趙國！但沒有任何根據說這兩位賢者是「墨者師」啊！

而且中山兩次滅國，兩次滅國時間，墨家學說都已經興起了。錢穆想扯，就得想辦法把中山第一次滅國給排除在外，可是錢穆沒有做。彷彿他天真以為只要把代君扯成中山君，就能混過去了。殊不知，「代君」只是「君」、第一次滅的中山是「中山公」、第二次滅的中山是「中山王」。「代君」更接近於「中山公」而非「中山王」，甚至更接近於「代安陽君」，因為只有「代安陽君」是「君」。不管接近與否，想扯代君就是中山君，就得先解決這個中山君指哪一個的問題！遑論單單靠一個錢穆所謂墨家學說還沒興起的錯誤說法就想把代君變成中山君，那是非常荒謬可笑的設想呢！

〈史記·趙世家〉：

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

〈史記·六國年表〉：

（趙惠文王四年）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齊）佐趙滅中山。

從以上兩筆資料可以清楚看出，中山國第二次滅國，是敗在了強國合攻之下，別說是中山這樣的被齊威王瞧不上而不允許他也稱王的中等國家，就是秦國也難以抵擋趙國、燕國、齊國的合力圍攻。那麼中山國的滅亡就根本跟中山君信奉什麼無關了，反而李疵的說法更接近，只是在三大強國的圍攻下，中山國即使都是戰士，也不太可能不滅國！而以上的記載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看點，那就是：「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既然中山尚已經被遷到「膚施」，而且「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趙國又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那麼「代、中山」這個地方已經屬於「趙章」的封地，究竟跟魏牟有什

麼關係？甚至跟中山尚都已經徹底無關了！所以錢穆如果引出這一段，仔細讀一下書，還會犯這種可笑錯誤嗎？

〈漢書·古今人表〉正記載趙章為「代君章」，這時候的墨家正屬於鼎盛時期，如果錢穆想瞎掰「代君為墨而殘」，難道不用證明這個「代君」不是「代君章」？而且如果按照錢穆隨意歸併古人的邏輯，這「代君為墨而殘」百分之百就是「代君章」了，那又跟魏牟、跟中山國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錢穆為了解釋「中山」兩字的由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四處東拉西扯，把一大堆他自己都還在猜測的東西就當成了一項證據來用！然後隱藏那些對他的謬想絕對不利的文獻，簡直非常可笑啊！

道德經論正相關考證

錢穆「短短」一篇考證，把「春秋末年代君、戰國初年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戰國中期亡國之君中山王尚、戰國末年魏牟」合併成了一個人，無法融合的人的歷史地位與著作自然而然的被取消而成了假貨了！「短短」一篇附錄，又把「春秋末年老聃弟子蜎淵、戰國中期齊國稷下學宮環淵」合併成了一個人！然後這也能成為學界某些人所推崇的東西、共識！？令人震驚啊！

關於「中山公子牟」與「魏牟」的相關考證，因為要解決列子公案等等，其實早已完成了。只是被封殺的人很難跟一個被威權時代享受風光、在當代繼續被中研院、老牌出版社吹捧的國學大師相提並論！影響力趨近於零。

直接上結論，與「中山公子牟」對談的公孫龍是孔子弟子公孫龍，而與「魏牟」交談的公孫龍是戰國末年趙國平原君手下的公孫龍。「中山公子牟」是向孔子弟子公孫龍學習的，中山公子牟對公孫龍的態度是正向積極的；「魏牟」是平原君手下公孫龍學習的對象，魏牟是嘲諷與貶低公孫龍的！正好相反！魏文侯禮遇孔子弟子子夏、子夏弟子段干木、子貢弟子田子方、曾子弟子吳起、李克，所以他的兒子中山公子牟能向孔子最小的弟子公孫龍學習，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而列子的老師是關尹子，關尹子的老師是老聃，孔子也是老聃的弟子。因此列子引用這一段公子牟的談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當時的儒、道不僅不是水火不容，甚至根據對「文子公案」的考證與統計，儒家從孔子開始就大量引用老聃的言論！那麼公子牟被歸類為道家，似乎也不奇怪了！

以下是相關考證，閱讀前依照慣例，先讀相關資料再讀考證：

〈道德經論正·先秦諸子與老子·列子〉：

列子

《列子》在內容的特色上，有劉向所說：「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而《列子》提到的關於「道家」的人物記有：

黃帝：〈漢書·藝文志〉：「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都屬於道家類著作。而早已失傳的《黃帝書》自然也該歸類為道家類著作。

鬻熊：〈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班固註：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屬道家類著作。

管仲：〈漢書·藝文志〉：「管子八十六篇。〔班固註：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屬道家類著作。

老聃：著有《老子》，相關著作：〈漢書·藝文志〉：「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這些研究或記錄老子言論的都屬於道家類著作。

長廬子：〈列子·天瑞〉：「長廬子聞而笑之曰。」、〈鄧析子·無厚〉：「獵羆虎者，不於外囿。釣鯨鯢者，不於清池。何則？囿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縻，長廬之不士，呂子之蒙恥。」、〈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漢書·藝文志〉：「長廬子九篇。〔班固註：楚人。〕」屬道家類著作。「廬、盧」皆從「盧」，故可通假。鄧析已經提到長廬，則長廬子可能與老聃同時，甚至早於老聃。〈太平御覽·地部二·地下〉：「《呂氏春秋》曰：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又曰：長廬子曰：山海岳河，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乎地也。」今本《呂氏春秋》已佚此段。

亢倉子：老聃弟子。著有《亢倉子》。班固時未被收錄，足見其時傳播已經不廣。

楊朱：老聃弟子。楊朱著作班固未收，可能早已亡佚！列子能記錄那麼多楊朱的事蹟，不可能都是親身聞見，而必有所本。這所本就可能是楊朱的著作。

關尹：老聃弟子。〈漢書·藝文志〉：「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屬於道家類著作。

老成子：〈列子·周穆王〉：「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則尹文先生與老聃同時，老成子在老聃之後。〈漢書·藝文志〉：「老成子十八篇。」屬道家類著作。「老成子」一本作「考成子」，「老、考」形近而誤。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七〈元和姓纂·老成〉：「老成子，賢人。裔孫老成方仕宋，為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此與〈漢書·藝文志〉著錄篇數有別，可能是載體演變導致，也可能是佚失八篇，或者老成子、老成方各有著作傳世。〈廣韻·下平聲·清·成〉：「《列子》有考成子，《國語》晉卻犢食采苦成，後因以為氏。《世本》曰：宋有大夫老成方、盆成括，仕於齊、晉。」如此，則「老成子」當即晉國卻犢之後。

中山公子牟：〈呂氏春秋·審為〉：「中山公子牟謂詹子〔高誘註：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列子·仲尼〉：「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張湛註：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漢書·藝文志〉：「公子牟四篇。〔班固註：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屬道家類著作。

列子：關尹弟子，《列子》作者。

與以上諸人牽涉到的人物有：楊布、季梁、孟孫陽、樂正子輿、壺丘子林、子產等。這其中可能牽涉到長廬子、楊朱、中山公子牟的相關著作，今日都已經失傳了！從以上眾多的人物以及所牽涉到的篇幅大小，可以說《列子》一書是早期集道家思想大成的書籍。往後的《莊子》，其調性已經與《列子》有不小的差別。

「儒家」人物，從老聃弟子孔子開始記有：孔子、子貢、顏回、公孫龍、子夏、魏文侯（子夏弟子）、段干木（子夏弟子）。與以上諸人牽涉到的有：端木叔（子貢伯父）、禽子（墨子弟子）、白公勝。

「墨家」人物，與道家人物楊朱事件結合。墨子、班輸、東門賈本身並無對話記錄，主要參與對話者有：禽子。楊朱道家（老聃數來第二代）、段干木儒家（孔子數來第三代）、禽子墨家（墨子數來第一代）。

「靠近列子時代」的人物，除以上諸人之外，有（晉侯、趙文子）、（魏文侯、魏王、趙簡子、趙襄子、齊景公、梁王、白公勝、中山公子牟）、（子產、鄧析）、鄭君（孔子死後之鄭君）、鄭子陽。

「遠在列子時代之前」的人物，有：黃帝、粥熊、堯、舜、殷湯、夏革、周穆王、周宣王。

「遠在列子時代之後」的人物，有：「鄒衍」一個摻入的排比句。鄒衍的年代約在發生於前 314 年齊國討伐燕國，「殺王噲、子之」事件前後。「宋康王、惠盎」一組一段對話！宋康王的宋國被滅於前 286 年。距離列子死時大約有一個世紀以上！

《列子》一書的主要人物集合分為兩組：一組為以列子為中心的人馬、一組為以楊朱為中心的人馬，其他的年代則又有差異。

列子共出現 58 次、孔子 63 次（仲尼 15 次、孔丘 7 次）、楊朱 29 次、楊布 2 次、老聃 12 次（老子 4 次）、鄧析 12 次、子產 12 次、關尹 10 次、子貢 17 次、顏回 8 次、端木叔 3 次、孟孫陽 10 次、墨子 6 次、禽子 6 次（禽骨釐 1 次、禽滑釐 1 次）、班輸 1 次、東門賈 1 次、趙襄子 6 次、亢倉子 4 次、壺丘子林 4 次、晏子 7 次（晏平仲 3 次）、白公勝 1 次、尹文 3 次、魏文侯 1 次、子夏 6 次、公孫龍 5 次、樂正子輿 5 次、公子牟 6 次、季梁 9 次、趙簡子 4 次、宋康王 2 次、惠盎 5 次。

主要的人物都集中在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如老聃、壺丘子林、子產、孔子、列子、鄧析、趙襄子、趙簡子、子貢、顏回、子夏、魏文侯、關尹、亢倉子、晏子、白公勝、楊朱等。

其中有師徒關係的為：壺丘子林與徒弟列子、子產（曾向亢倉子問政，也可算其徒弟。）；關尹與徒弟列子；老聃與徒弟關尹、亢倉子、楊朱、孔子；孔子與徒弟子貢、顏回、子夏、公孫龍；楊朱與徒弟孟孫陽、心都子；墨子與東門賈（或為公輸班徒弟）、禽滑釐；列子與徒弟百豐。有血緣關係的有：趙簡子與繼承人趙襄子、魏文侯與兒子中山公子牟、楊朱及其弟楊布、子貢及其伯父端木叔。牽涉國家有：鄭、衛、魯、宋、齊、楚、梁、燕、趙、紀、周。已經邁入了戰國時代。

從春秋末期老聃、關尹、楊朱、孔子算起，加上疑似後出的人物如宋康王，其時代跨度已經超過兩百年。依照一般人的年壽推算，能與子產同時的列子就算活了一百多年，也不可能看到一些疑似戰國中後期的人物「公孫龍、孔穿、季梁」以及確實是戰國中後期的人物「宋康王、鄒衍」等人的出現。因此，只有解決「公孫龍、孔穿、宋康王、季梁、鄒衍」何以獨獨出現在這一本以春秋末、戰國初年人物與形勢的書籍中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列子》的成書時間問題。由於劉向曾經提及編纂《列子》的過程稱：「校除重十二篇，定著八篇」，因此對於一些似乎是出自戰國初期以後的部分，可以視為是劉向誤收的失誤，或者在歷代的流傳中產生注文摻入正文或他書混入此書的現象。然而經過本書考證，實則以上所謂「戰國中後期人」如「公孫龍、孔穿、季梁」

其實都是春秋時期以致戰國初期的人，而這些都還是在列子可見可知的範圍之內的！換句話說，《列子》成書於戰國初期，主要內容圍繞在春秋末年的人物事蹟之上！唯一例外就是「宋康王」一段對話！

其春秋時代主要人物關連性為：列子與關尹對話、關尹與老聃對話、老聃與楊朱對話、楊朱與禽子對話。

與列子有接觸的人，有壺丘子林，其人事蹟可見於：〈列子·說符〉：「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列子·仲尼〉：「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呂氏春秋·下賢〉：「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有伯昏無人、伯昏瞀人，其人事蹟可見於：〈列子·黃帝〉：「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莊子·德充符〉：「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莊子·田子方〉：「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列子·天瑞〉：「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列子·仲尼〉：「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莊子·列禦寇〉：「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有關尹子，其人事蹟可見於：〈列子·說符〉：「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呂氏春秋·審己〉：「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列子·黃帝〉：「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莊子·達生〉：「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莊子·達生〉引自〈列子·黃帝〉）

不管是與子產同時的壺丘子林、與壺丘子林同時的伯昏無人、伯昏瞀人、老聃的弟子關尹子。這些人都是春秋末年人，並且主要生活於春秋末年。

關於「楊朱、季梁」的問題，《老子弟子與老子》一冊已經考證甚詳，確認兩人都是春秋末年人。於是剩下的只有兩幾組人物：一是「中山公子牟、公孫龍、孔穿」，一是「宋康王、惠盎（或惠孟、唐鞅。「盎、孟」可能是形近而誤，也可能「孟」是排行！「盎、鞅」音近通假，也可能是兩人。）。以下先從第一組人物談起。「中山公子牟」與「魏牟」都可稱為「公子牟、魏牟」，且兩人都與「公孫龍」有過交談。因此要釐清兩人，得從三方面分別討論，一是「中山公子牟」、一是「魏牟」、一是「公孫龍」。

戰國初期中山公子牟

〈列子·黃帝〉：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

〈漢書·藝文志〉：

《公子牟》四篇。〔班固註：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呂氏春秋·審為〉：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高誘註：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故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浹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任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

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莊子·天下〉：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淮南子·道應〉：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呂氏春秋·當染〉：

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欒長〔高誘註：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義、長，其二臣也。〕，宋康王染於唐

鞅、田不禪，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

〈呂氏春秋·自知〉：

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

〈說苑·尊賢〉：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

〈說苑·敬慎〉：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

〈說苑·奉使〉：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

〈列子·仲尼〉：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張湛註：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

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團、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筆者註：〈莊子·天下〉：「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為龍弟子。給，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无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史記》云：綦國之竹。晉灼曰：衛之苑多竹篠。〕之箭〔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

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

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盧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无意則心同。无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於馬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魏國早在文子、關尹子時（春秋末年）便已經實存了！「魏王」一說也屬於合理稱謂！因此列子提到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中山公子牟」這個人。與「中山公子牟」牽涉到的還有「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韓檀」、「孔穿」、「詹子」。其中除「公孫龍」確認有兩人之外，其餘皆不詳。其中「孔穿」可以與戰國後期的「孔穿」同名同姓而為孔子族人（因為公孫龍是孔子弟子，因此孔子族人與公孫龍有過交談實在太正常了。），或者僅僅是因為牽涉到公孫龍與孔穿而被文本同化了。（也就是原本不叫做孔穿，卻被改為孔穿。）。

「韓檀」，〈莊子·天下〉：「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其中「桓團、公孫龍」相提並論，當即樂正子輿所說之「韓檀」，但難以確定。可惜，韓檀、樂正子輿時代都不詳，否則這個案子就不可能產生疑義了！

「樂正子輿」，〈禮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孟子·梁惠王下〉：「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趙岐註：「克，樂正子名也。」可見樂正子與樂正子輿不是一人。樂正氏並且由來已久，在曾子之時已有樂正子春，其時與孔子弟子公孫龍相當。

由以上引文也可見「中山公子牟」的事蹟確實沒有牽涉到其他戰國時代的人事物。其中〈呂氏春秋·審為〉：「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高誘註：「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公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呂氏春秋·當染〉：「中山尚染於魏義、樞長」高誘註：「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義、長，其二臣也。」都表明中山公子牟是魏文侯之子，被封於中山，並且中山國的後代王者就是其後代。同時中山公子牟也是《公子牟》一書的作者。但魏牟並沒有相關的著作流傳，也未曾有人說戰國末年的魏牟有一本著作。

戰國後期魏牟

〈莊子·秋水〉：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一本作「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虬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文心雕龍·諸子〉：

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

〈說苑·敬慎〉：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戰國策·趙策三·平原君謂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仆得聞此，不忘於心。愿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戰國策·趙策三·建信君貴於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

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

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

王曰：「郎中不知為冠。」

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僅僅，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荀子·非十二子〉：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楊倞註：它蹠，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

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也。」

〈韓詩外傳·卷四〉：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鉞、鄧析、惠施之徒也。

平原君趙勝於前 298 年拜為趙國相國，前 251 年死。平陽君趙豹於前 272 年被趙惠文王封為平陽君，直到趙孝成王四年（前 262 年）仍未死。穰侯魏冉於前 300 年拜為秦國相國，至前 271 年多次擔任秦國相國，約死於前 265 年之後。趙奢被封為馬服君是在前 269 年的閼與之戰之後。應侯范雎於前 266 年接任魏冉為秦國相國，前 260 年離職。莊子從楚威王（前 339 年至前 329 年在位）時期開始活躍，至少活到前 307 年。其中〈說苑·敬慎〉作「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而〈戰國策·趙策三·平原君謂平陽君〉平原君說：「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說的是同一件事情，而一作穰侯、一作應侯，都在平原君可知的範圍之內！而必有一誤！即使是穰侯，那麼與穰侯對談的「魏公子牟」也絕不可能是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而不帶「中山」字樣的「公子牟、魏牟」，則根據其所接觸的對象可知為同一人，〈莊子·秋水〉：「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今吾聞莊子之言』」這時間點與在平原君面前與孔子七代孫孔穿辯論的公孫龍的時間是一致的。

錢穆在〈先秦諸子繫年·一四六、魏牟考〉企圖將「春秋末年被趙襄子所滅的代君、戰國初年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戰國中後期中山國第二次滅國的亡國之君中山尚（中山公子牟的後裔）、戰國後期與平原君手下公孫龍交談的魏牟」全部合併成一人。於是編造、牽扯了很多荒誕不經的事情。首先就是錢穆未能理解「代君、趙襄子」之時，墨家學說已經盛行，於是扯被滅的「代國」是「中山國」，問題是〈淮南子·人間〉：「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禽矣。」其中魯哀公被削，魯國並未亡國；燕子噲身死，燕國也並未亡國。何以見得這個代君是亡國之君？即使退一萬步說，這代君就是趙

襄子所殺之代君，他的滅亡也並非被趙國攻擊直到滅國，而是被趙襄子暗殺所致。這與第二次中山國被趙國、燕國、齊國聯合攻擊最終滅亡相差不知凡幾。遑論，劉安並沒有指明代君被誰所滅呢！而且中山國第一次滅國被魏文侯所滅，當時墨家學說已經盛行，錢穆想憑空想像的把「代君」扯成「中山公、中山王」，得先解決何以見得所謂「為墨而殘」必得是第二次中山國滅國而非第一次。而且「中山王尚」何時「為墨而殘」了？何時「殘」了？

根據〈史記·六國年表〉：「（魏文侯）十七（前 408 年）。擊守中山。伐秦至鄭，還築洛陰、合陽。」則魏擊守中山最遲在前 408 年就開始了。其中魏國滅中山在前 408 年，即使是三年後才換上公子牟治理中山，仍在列子可知的範圍內！〈史記·六國年表〉：「（趙惠文王）四（前 295 年）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齊）佐趙滅中山。」、〈史記·趙世家〉：「（趙惠文王）三年（前 296 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這就是「中山王尚」的最終下場，也與「中山公子牟」、「魏牟」都無關！而且「中山、代」被趙武靈王封給了趙章，稱為「代安陽君」。這時候別說八竿子打不著的魏牟，就是中山國原本的中山王尚也與這些地方無關了！

因此錢穆試圖將「中山尚、中山公子牟、魏牟」歸併成一人，其實就是因為他欠缺對相關史料的認知罷了！而且錢穆為了扯「代君」亡於信奉墨家學說，就是中山尚，所以扯公孫龍是墨家門徒，魏牟受其影響而導致亡國。這種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胡說八道，很容易就被證反。譬如「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明明是公孫龍向魏牟學，跟列子中中山公子跟公孫龍交遊完全是兩回事。怎麼反而說成徒弟影響了師父呢？而且劉勰指出「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鴉烏，非妄貶也。」表明魏牟曾嚴厲批評公孫龍「白馬、孤犢」之說的荒謬，試問怎麼會受到他的影響呢？而且荀子批評魏牟「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楊倞以為這個魏牟仍然是戰國末年的魏牟，試問，這就是受到墨家學說影響的結果？「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這些難道不都是墨家所反對的東西嗎？且〈漢書·藝文志〉《公子牟》四篇被班固歸屬於「道家類」而非「墨家、名家」類，而平原君手下公孫龍的《公孫龍子》十四篇卻被歸屬於「名家類」，與鄧析、惠施的著作一類。這三類著作的差異性頗大，錢穆要硬扯《公子牟》作者被公孫龍影響以至於亡國，難道不該解釋一下，怎麼這樣的影響沒體現在其實質內涵上？卻單單反映在了亡國之上？這合理嗎？

高誘在註「中山尚」時指明「尚，魏公子牟之後。」表明高誘確實知道更多「中山公子牟」的事蹟！否則他如何能說中山尚是「魏公子牟之後」？而按照時間，「中山尚」也只能是「中山公子牟」之後，而不可能是戰國後期與公孫龍辯論的「魏牟」之後。因為中山尚滅國時，當前 296 年，如果他是公子牟的後代，而且已經繼位又滅了國，公子牟不可能還存在。以至於還能跟穰侯、應侯、建信君時的趙王交談了。

根據以上文獻更可知，其中「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試問一個被殘的亡國之君，是怎麼還能到處跑的呢？又「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一本作「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試問一個已經被軟禁在膚施的亡國之君，還能在數十年之後到處亂跑，一下子去秦國、一下子去趙國，還能「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這是在開什麼低級玩笑？而且一個亡國之君，趙王、應侯稱他「公子」、穰侯、公孫龍稱他「先生」，這像話嗎？

高誘能註《公子牟》是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所寫，能知道中山尚是中山公子牟的後代，必然都是有所本。這些所本可能就寫在已經失傳的《公子牟》這本書中。換句話說如果不是這本書已經失傳，疑古派根本沒有入手瞎扯淡的機會！且魏文侯把中山國封給自己的兒子，呂不韋也有相關記載，其記載魏文侯的臣下任座當面指責魏文侯：「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又根據〈說苑·奉使〉：「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足見魏文侯把中山國封給自己的兒子確實是事實！則「中山公子牟」乃是魏文侯之子並且就是「少子摯」，「摯」古代有禮物的意思、「牟」有獲取利益的意義，因此兩字符合東周時代見名知字的命名規範。中山公子牟：「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魏文侯之子，道家類人物，因此同屬於道家類集成者的列子、莊子都有引用，實在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也就是說，這裡無疑又發生了一次「楊朱」事件！也即所有相關人物都具有另外一種可能性。譬如所謂「中山公子牟」與戰國中後期的「魏牟」實是兩人，趙人公孫龍其實是孔子弟子公孫龍而非趙國平原君時的公孫龍。那麼這個公孫龍所欺騙的孔穿也就是孔子之孫子思或孔子家族的其中一位孔穿，而非孔子七代孫子高！這一點從子高與平原君時的公孫龍的辯論中不難看出其間差異：

〈孔叢子·公孫龍〉：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

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

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

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為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先）教也；失（先）教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非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眾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敢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

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

異日，平原君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

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

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

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鵠（鵠）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鵠（鵠）。鵠（鵠）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牛麗]牛玄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論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之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

平原君曰：「先生之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泛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會〕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首先，《孔叢子》記子高有兩篇，都是子高與平原君、公孫龍等輩交談之記載。一篇為此篇〈孔叢子·公孫龍〉，一篇為〈孔叢子·儒服〉。都以「子高」稱呼孔穿，只有孔穿自稱「穿」。且從其中與公孫龍的辯論看來，也與聽到公孫龍的描述就「孔穿駭之」的孔穿判若兩人！加上「樂正子輿、韓檀」兩人年代不詳，也無法將「韓檀」與「桓團」輕易畫上等號！因此，除非能確切知道「樂正子輿、韓檀」的年代，否則僅僅是根據「中山公子牟」是魏文侯之

子就能判定，這一則記載是沒有錯誤的！而且魏文侯之師是子夏，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得與孔子最年輕的弟子公孫龍交談也屬於合理之事。樂正子輿稱：「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孔子弟子子夏是魏文侯之師、其弟子段干木、子貢弟子田子方、曾子弟子吳起都受到魏文侯禮遇或重用，並與魏文侯有過交談記錄。但平原君手下公孫龍卻並沒有與魏王有過交談的記錄。魏文侯被稱為魏王有以下的案例：〈說苑·奉使〉：「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呂氏春秋·自知」：「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梁王」就是誤稱，也就是把魏惠王遷都大梁之後的梁王稱號套用到了其他更早期魏國君主的稱謂之上。所以即使樂正子輿稱「龍誑魏王」也是合理的！

至於孔穿的「穿」也是當時可知的名字，如「趙穿」。因此從「中山公子牟」可以確認，公孫龍其實是小孔子五十三歲的公孫龍，〈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而如此看來所謂「趙人公孫龍」或「公孫龍，衛人」恐有一誤！而平原君的公孫龍據張湛註為「字子秉」與孔子弟子公孫龍「字子石」並不相同。

兩個公孫龍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齊。……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說苑·臣術〉：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

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

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

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

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

李克曰：「季成子為相。」

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

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臣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

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

翟黃方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

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

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間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

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

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

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

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

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呂氏春秋·舉難〉：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

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

〈呂氏春秋·當染〉：

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呂氏春秋·尊師〉：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

〈吳子·圖國〉：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鬥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醺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新序·雜事四〉：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

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入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

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史記·魏世家〉：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筑雒陰、合陽。

東周時代，（有名的）公孫龍有兩個，一個是春秋末年孔子最年輕的弟子公孫龍，一是戰國末年趙國平原君手下公孫龍。其中能跟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交談的公孫龍只有一個，那就孔子的弟子公孫龍。從以上的引文可以確認，不僅孔子第一代弟子子夏為魏文侯師，年長於子夏的子貢其弟子田子方以及子夏的弟子段干木都受到魏文侯禮遇、敬重。至於曾子弟子李克、吳起也都受到魏文侯重用。其中「子夏、子貢、公孫龍、吳起」都是衛國人，段干木是晉國人，田子方是子貢弟子籍貫不詳。魏文侯身邊既多孔子弟子、再傳弟子，其中更以衛國人居多。衛國本來依附於魏國，因此多數人選擇去魏國服務，實屬正常。公孫龍為衛國人一如師兄、師兄弟子服務於衛國再正常不過了。而魏文侯手下既然重用這麼多孔門弟子、再傳弟子，其子公子牟與公孫龍來往，與其子魏擊（魏武侯）與田子方、吳起等有較深的交談，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山公子牟」與孔子弟子公孫龍交談，本是正常之極的事情。但由於戰國中後期又確實有一位趙國平原君的屬下公孫龍與孔子七代孫孔穿辯論之事實發生，於是眾人便將兩事相混了！且〈公孫龍子·跡府〉記載公孫龍與孔穿之辯論，與〈孔叢子·公孫龍〉只是視角轉換的差別，卻並沒有任何關於列子此段「孔穿駭之」的相關情節。這從另一方面證明，《孔叢子》作者仍然知道《列子》中「孔穿（可能涉及文本同化現象）、公孫龍」並非子高與平原君手下公孫龍。

且〈列子·黃帝〉也記載了魏文侯與子夏的對談，符合列子記載魏文侯之子與孔子弟子公孫龍的氛圍特徵！更重要的是「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唯一能有機會見到的確實也就只有一位公孫龍，也即年紀比魏文侯之師子夏更

小的公孫龍。如果從孔子弟子公孫龍的事蹟來看，也能發現他具有一定的辯論能力：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其中多人請行，子路具有人脈，而子貢、子張都有辯才無庸置疑，而子石即公孫龍，其時年紀大約十五歲。公孫龍如果沒有辯才，敢於在如此年紀與子路、子貢、子張爭出嗎？

因此綜合以上證據，可以合理推論：〈列子·仲尼〉：戰國初期「中山公子牟」與「孔子弟子公孫龍」與戰國中後期「平原君手下公孫龍」與「魏國賢公子魏牟」是一對歷史上的巧合。至於與孔子弟子公孫龍相涉的孔氏族人「孔穿」，其實遠比平原君時的公孫龍遇到孔子七代孫孔穿的機會要大！另一種可能是，與孔子弟子公孫龍相關的「孔穿」也有可能是牽涉到文本同化現象而產生的失誤！而《公孫龍子》、《孔叢子》沒有記載這個與中山公子牟交好的公孫龍與孔穿的故事，卻只記載了平原君時公孫龍與孔子七代孫孔穿的故事，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這只是兩個獨立的事件！

關於公子牟與公孫龍，張湛以為是有錯誤的，而稱「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更以為這個公孫龍是平原君手下公孫龍。試問，張湛如果是偽造者，他這不是自找麻煩嗎？而一個被描述成高明的偽造者又企圖想要偽造春秋末戰國初年文獻《列子》的人，在其自我認知「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的情況下，還會把這種東西加入到一本偽造的書中嗎？

於是解決了「公子牟、公孫龍、孔穿」問題，原始三組有問題的人馬，最終只剩下「宋康王」了！

結論

「中山公子牟」是魏文侯兒子，「中山王尚」的祖先。與孔子弟子公孫龍交遊學習，著有《公子牟》，其思想內容被列子、莊子所引用，後被劉向、班固等人歸類為道家類著作。

孔子弟子公孫龍已經展現出了一定的名家學說，許多詭辯其實起自孔子弟子公孫龍，惠施、平原君手下公孫龍只是繼承者。而詭辯其實在與孔子同時的鄧析就已經開始發展了，公孫龍在這時期發展了相關的理論，是合理的！

而所有疑古謬說的起因就是因為《公子牟》早就失傳了！如果這本書沒有失傳，就算疑古派舌燦蓮花，也不能隨意的取消魏文侯與中山公子牟的父子關係！

最後，我們來複習一下，錢穆提出了什麼證明「中山公子牟」就是「魏牟」的證據？沒有！僅僅因為「中山公子牟」與一位叫做公孫龍的人交談，並不能證明「中山公子牟」活在戰國後期，並且無法證明他不是魏文侯的兒子。因為公孫龍本來就有兩個，一個是孔子弟子公孫龍，活躍於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另一個是平原君手下公孫龍，活躍於戰國末年！兩人都同樣喜好詭辯之術，孔子弟子公孫龍受業沒有幾年，加上當時鄧析、少正卯成名在前，無法說公孫龍沒有受到任何影響！而如果從這一點而論，孔子弟子公孫龍才正該是一堆詭辯的發明者，至少都是初代的傳道者！

從人際交往的理論來觀察，春秋末年孔子的公孫龍接觸到魏國君主的機會遠多於戰國末年平原君手下公孫龍接觸到魏國國王的機會。而就實際而論，魏文侯的兒子被封到了中山，是事實，他的兒子能接觸到同樣出自孔子門下的公孫龍也是合理之事。因為當時魏文侯手下或禮遇之人，孔子門下與再傳弟子就有子夏、子夏弟子段干木、子貢弟子田子方、曾子弟子吳起、李克等。在這種氛圍下，中山公子牟與公孫龍交遊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而列子也不可能去記載關於戰國後期的人事物。中山公子牟與魏文侯的關係，也是多方記載的。甚至中山公子牟是中山國復國後的祖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要將戰國初期的「中山公子牟」（魏牟）與戰國後期的「魏牟」畫上等號的唯一線索僅有「與公孫龍交談過」。但公孫龍既然本來就有至少兩個，想要證明「中山公子牟」就只能是戰國後期的「魏牟」，就必須先證明這個公孫龍必然不是另外一個公孫龍！

所以從證據上來說，「中山公子牟」是戰國初期人的證據遠遠大於他是戰國後期人的證據。錢穆的所謂考證，其實什麼證據也沒有提出，只是想把公子

牟扯到中山國，然後再把中山國亡國扯到墨家學說，但最終卻也只能不停的觸碰常識的底線！而這樣素質的東西，可以說是整本《先秦諸子繫年》的基調！也是一堆中研院的人極力吹捧的著作！

以上，錢穆關於解釋「中山公子牟」「中山」兩字的由來，可以說毫無根據可言！其次，他想把「魏牟」扯成「中山尚」，更是異想天開！最終，他又要把「中山國」的亡國與墨家學說牽扯到一起，然後聯繫魏牟與公孫龍。但完全忽略是公孫龍向魏牟學習這一事實，反過來說成是具有墨家思想的公孫龍影響了魏牟！而魏牟因為信奉了墨家學說所以導致自己的中山國滅亡！然後自始至終也沒有解釋為什麼魏牟能成為中山王，為什麼中山國滅亡後，中山王都已經被遷移到小地方軟禁，居然還可以到處跑！而以上種種一切都是錢穆的胡思亂想！我們看不到任何符合邏輯水平的東西！有的只是東牽西扯、胡說八道！試問，就算中山王信奉墨家學說，那不過也是戰國時代的日常，孟子都說當時墨家是顯學，中山王信奉墨家還得他是公孫龍的朋友、師父或徒弟才可以嗎？其實這些事件之間本來就都沒有因果關係，更沒有任何史料支持，想要以此做推論，那些結論也都不可信！遑論是違背常識的胡說八道了！

不過也正是因为錢穆採用了這種東拉西扯的策略，以至於你想要反駁這種根本就不需要反駁的猜想，都得費很大的勁！於是這種胡說八道竟然就成了學界的共識了，這本《先秦諸子繫年》就成了什麼了不起的經典了！簡直可悲啊！

至於如果讀者遇到這種難題，怎麼解決，怎麼考證？可參考《道德經論正》之《先秦諸子與老子》的實例演示，以及《考證概論》的理論描述。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誰才是楊朱的朋友：兩個季梁與楊朱公案

看到這個標題，估計讀者可能已經猜到「季梁」有兩個，一個是春秋時代的，一個是戰國時代的，但其實季梁有三個，兩個在春秋時代（一個有可能橫跨到戰國初年）。甚至「季梁」這個詞，不一定就表示「季氏」裡面一個名叫「梁」的人，而可能是一個名叫「梁」的人在家裡排行第四（伯仲叔季）的意思。譬如孔子弟子子路又叫做「季路」、公析哀又叫做「季沈」。也就是說涉案的兩個季梁還不一定是同名同姓的狀態，而可能只是姓名與稱謂上的偶合！

估計看到這裡，老讀者都已經猜到錢穆要怎麼做了！確實，就是把涉案的兩個季梁合併起來，直接說成是一個人！所謂的「考證」就完成了！簡單粗暴。這樣，楊朱就自然只能是那一個人的朋友了！也就是說，錢穆再次的不容許同名同姓、甚至只是稱謂形式相同的人存在於不同的時空之中了！而這當然是違背常識與客觀事實！

所以如果仔細去數一下《先秦諸子繫年》到底「消滅了多少古人」（簡單粗暴歸併法，多數只是名字相似甚至不是相同，相關表格在持續統計中！）、把多少古人打成假人、把多少古書打成假書、把多少歷史打成假事！那就會讓人驚訝到合不攏嘴。除了讓我想起四人幫、破四舊、疑古派，我實在想不到其他相關事物了！錢穆把一大堆真實的歷史、人、物，用極其荒謬的邏輯與言論打成假的，卻居然可以躍升為「維護傳統文化的國學大師」！不得不感嘆媒體與潛規則的厲害！仔細去審視錢穆的所作所為，這種恭維詞裡面，竟沒有一個是錢穆可以當之無愧的！

那麼出版社、一大票學者不是在睜眼說瞎話、愚弄世人嗎？還是其實這些人根本就看不出來這種荒謬論述本身的問題？或者這些人的文言閱讀程度甚至不如錢穆？

而錢穆本身也是玩開了！所以你看他同樣的思維模式不停的套用在不同組的人物身上，彷彿他就只會這招一樣！這才講到第幾篇，就有多少組人馬被歸併了！然而錢穆似乎一點都沒有發覺「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關於楊朱公案，首先所有史料都指出楊朱就是老聃的弟子，但錢穆為了把老聃打成假人，把「老子、《老子》」從春秋時代拉到戰國時代，使其成為偽人、偽書，使儒家孔子穩居至聖先師的一尊地位。因此不得不把「季梁」也打成一人。這樣一路看到這裡，估計讀者已經很熟悉錢穆這一套操作手法了。那麼他要怎麼證明季梁只有一個呢？答案是他沒有證明！直接就說這個季梁就是

戰國中期的季梁，然後要大家去參考楊朱篇的考證，而楊朱篇的考證又直接引用了要大家去參考的季梁的考證的猜想，把猜想當成了結論！

楊朱公案之所以複雜是因為裡面牽涉到了多組難以確認年代的人事物。說難以確認年代，有幾個原因，一是存在同型稱謂的人如季梁、梁王；二是存在具有爭議性事件的評論，如田氏篡奪齊國政權究竟是指哪一個田氏？三是因為文本訛誤導致的「子貢之世父（伯父）、子貢之世（葉，後代，子孫）」的差異。每一個事件都可能導致年代的誤判。其中也有年代確定的人物，如老聃、墨子弟子禽滑釐、子貢弟子段干木都是春秋末戰國初人（是曾經被誤稱為梁王的魏文侯所禮遇的對象）；也有沒有信息量的人物（無助於考證）如楊朱的兄弟楊布（如果楊布有跟其他人交談，那麼就有信息量了。譬如楊布跟魏文侯交談，就可以增加楊朱是春秋末戰國初年人的證據。）。而主要記載楊朱事蹟的列子又是關尹子弟子（關尹子是老聃弟子），而《列子》不僅記載了楊朱，也記載了列子所能見到的所有他之前（老聃、關尹子以及一些著作已經失傳的道家人物）或同時的（如中山公子牟）其他重要道家思想人物的事蹟或言論，儘管有些篇幅非常短小。所以一個正常的考證思路應該是先去釐清楊朱、季梁大概都牽涉到哪些人？與誰對話？這些人大多都生活在哪個年代？然後逐一解決其疑難點！

說真的，楊朱的年代也曾經讓我產生困惑，其原因就在於以上提到的三個疑難點。因此沒有解決這些疑難點，即使確認他是老聃弟子是無法動搖的事實，心裡也不踏實。（譬如可能生出兩個楊朱的猜想）雖然楊朱遭遇到了這種破事，但所幸有不變的時間座標如老師老聃、墨子弟子禽滑釐，因此楊朱要能與這些人交談本身就已經限定了他的年代。因此只要找到能解釋那些疑難現象的相關證據，考證就能宣告結束！也就是說這些考證只是附屬的，是為了解決這些疑惑的，也是為了把楊朱公案徹底解決用的。即使沒有相關的證明，也無法用一個可以解釋為同名同姓的季梁、不可確知的梁王來抵銷唯一存在的老聃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與楊朱交談的事實。可是如果放任其中哪怕一項繼續存在就容易讓人產生困惑！進而讓邏輯觀念不清的人受到疑古派的愚弄！

先秦諸子繫年

季梁考

〈先秦諸子繫年·七九、季梁考〔附：季真〕〉：

〈列子·力命篇〉言：「楊朱之友季梁病」，《仲尼篇》言：「季梁死，楊朱望其門而歌。」則季梁先楊朱而卒。梁之與楊朱，殆如惠施之於莊周矣。《魏策》云：「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而諫梁王」，是惠王圍邯鄲之歲，梁尚在也。鮑注云：「季梁魏人，非《列子》所稱。」不知楊朱亦與梁惠王同時，則烏見季梁之非一人哉？（朔雪寒註：鮑彪正確註出了這個季梁不是《列子》裡面的季梁，是明白兩人不是一人。結果錢穆便開始毫無根據的說兩人是一人！還說人家不知「楊朱亦與梁惠王同時」！要說楊朱是「亦與梁惠王同時」的人，那麼錢穆理應指出證據。但錢穆沒有。直接就說人家是錯的就好，那麼所謂的考證豈非太容易！）〈荀子·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楊注：「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按：此均見《則陽篇》。〕則是梁惠王、犀首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今按：《魏策》：「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調梁王云云。田需之相，在惠施去相後，當魏襄王之世。則季子、惠子、莊子同時。季梁死楊朱前，不能至魏昭王時猶存。（朔雪寒註：所以季梁也有可能稱為季子，但前提得是所謂的「季」是姓氏而非排行。）《莊子》書稱季子，皆季真，非季梁。《荀子》以季、惠並稱，殆亦指季真，非季梁，韓說非也。（〈韓非·外儲說左上〉「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識誤》「李當作季，季梁也。惠，惠施，宋，宋鉞，墨，墨翟。」今按：顧氏改李為季是也。然亦為季真，非季梁。又按：〈莊子·天地篇〉有季微，似魯人。釋文云：「蓋季氏之族。」馬氏《義證》謂「季微疑即季真，古讀照紐歸透皆舌音」，未知信否。

朔雪寒駁

所以我們可以請問一下究竟錢穆在這一篇考了什麼？指出了什麼證據？用了什麼樣的推理邏輯？僅僅「不知楊朱亦與梁惠王同時，則烏見季梁之非一人

哉？」就能說楊朱時的季梁就是梁惠王時的季梁？問題是考證的證據與推論究竟在哪裡？隨意的猜想也能當成考證？

楊朱考

〈先秦諸子繫年·八〇、楊朱考〉：

自《孟子》書言楊、墨，曰：「楊、墨之言盈天下」，又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後世盡人讀《孟子》書，因莫勿知有楊、墨。墨為先秦顯學，顧無論矣。至於楊朱，其事少可考見。先秦諸子無其徒，後世六家九流之說無其宗，《漢志》無其書，《人表》無其名。（朔雪寒註：班固以前天下人口有多少，那些各國歷代王者、大臣都在人表上面嗎？沒有！漢朝政府能收盡天下藏書然後寫於目錄嗎？不能。這是常識！）

〔梁氏《人表考》，梁耆疑五等離朱乃楊朱字訛，謂等次時代皆相近。其實楊朱與梁惠王同時，今《人表》離朱在公輸般下，尚出墨子前，與吳王夫差相次，決非楊朱字訛可知。〕則又烏見其為盈天下者？〔〈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天論》《解蔽》諸篇，曆辨諸家，亦無楊朱。〕惟劉向《說苑》稱楊朱見梁王而論治，〔《政理篇》。〕（朔雪寒註：〈呂氏春秋·不二〉：「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高誘註：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生」乃「朱」字之誤，兩字形近而誤。說沒有提到楊朱，那是錯誤的說法，更是站在今日可見少量先秦文獻下的說法。而今日流傳下來的先秦文獻不僅不多，而且多數已經殘缺。如《尸子》、《慎子》、《申子》，就別提已經失傳的《公子牟》等書了。這些書沒有提到楊朱嗎？誰知道呢？所以錢穆這種說法僅能是以偏概全了！且〈呂氏春秋·不二〉也遍說諸家，怎麼不見孟子？怎麼不見莊子？怎麼不見惠施？所以就能推論出莊子、惠施、孟子不存在？不重要？這不是很可笑嗎？）

《列子》書言楊朱友季梁，季梁先楊朱死。而季梁之死，在梁圍邯鄲後。〔詳《考辨》第七九。〕（朔雪寒註：除了季梁阻止梁惠王攻打邯鄲可以證明這位季梁在魏國攻打邯鄲前還活著。錢穆根本沒有對季梁做任何考證！）則楊朱輩行較孟軻、惠施略同時而稍前。（朔雪寒註：錢穆什麼證明都沒有，季梁就自動的從兩個變成了一個。然後楊朱的年代也就跟著這個戰國中期的季梁跑了！）〔〈淮南·汜論訓〉：「歌舞以為樂，揖讓以為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而楊子非之。」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而孟子非之。」亦謂楊子在墨後孟前。〕果使其言盈天下，則當時文運已興，又勝孔墨之世，其文字言說，何至放失而無存，不又可疑之甚耶？（朔雪寒註：古代墨家學說一堆，至今留下什麼？書籍會消失，會失傳，這本是常識！但在疑古派眼中，全都成了人是假的、書是假的、事是假的證據了！）余故知儒、墨之為顯學，先秦之公言也。楊、墨之相抗衡，則孟子一人之言，非當時之情實也。（朔雪寒註：這時候孟子的話又不可信了。）孟子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之名尤不聞，並世無稱，後世無傳，不足以自表見，則亦一曲之士，而孟子以與楊、墨並稱。（朔雪寒註：古代很多名人事蹟失傳，因為事蹟失傳就這樣被錢穆貶低成在當時沒什麼重要性的人物。這種武斷在錢穆的所謂考證文字之中，非常常見。）此非孟子之尊子莫，乃其輕楊、墨。則楊、墨之並稱，非孟子之尊楊，乃其所以輕墨也。孟子既輕楊、墨，何以又謂其言盈天下？曰：孟子謂墨氏無父，今未見其果無父也。則謂楊氏之言盈天下，又安見其果為盈天下哉？且孟子之言則別有指。孟子以謂墨氏之言過於仁，楊氏之言不及於義。故曰楊、墨肆行，充塞仁義。蓋人之常情，非自私自利則又務外為人，皆不足以合於仁義之道。凡天下之務外為人者，皆孟子之所謂墨氏之言，而未見其果為墨也。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之所謂楊氏之言，而未見其果為楊也。則孟子所謂楊、墨之言盈天下者，亦其充類至極之義，非當時學術分野之真相也。〔《莊子》書每以黃帝形堯舜，老聃形孔子，正如孟子之以楊朱形墨翟耳。後人遂疑黃帝與堯舜於政治史上有同等之位置，老聃與孔子於學術史上有同等之影響，則亦如謂楊、墨在當時思想界有同等之勢力，陷於一例之誤。〕（朔雪寒註：老聃的影響力請見《道德經論正》諸冊舉例。這裡錢穆把孟子的實際指稱，直接了當用抽象譬喻來解釋。簡單粗暴。毫無根據。而且錢穆在「子華子」那篇又說「華子」吸收了楊朱的思想，現在又自己說楊朱的學說不能遍天下！不用道理的論述，不用邏輯的論述，想怎麼說都可以啊！現在算一下，列子講楊朱、戰國華子講楊朱理論、孟子稱楊朱之言遍天下、莊子講楊朱、呂不韋講楊朱，所以這樣還不夠嗎？請問一下現存文獻裡，戰國時代有哪幾位思想家、哪幾本著作提到了孟子、荀子、韓非？不過如此輕率武斷的判斷，在錢穆的文章中實在是太平常了！簡直不值一提。）

然則莊子亦何以言楊、墨？曰：莊子衡量並世學術，備見於內篇《齊物論》，獨稱儒、墨，不言楊、墨也。言楊、墨者，在其外雜諸篇，固不足盡憑。（朔雪寒註：不是扯別人沒提楊朱，就是人家提了就說人家的不可信！這

就是疑古派常用的爛招啊！）且其言曰：「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堅白同異之辯，此自後相調別墨者乃有之，非楊朱、墨翟之辯也。又非楊之徒與墨之徒之辯也。（朔雪寒註：這些都是錢穆站在自己對古籍的無知的前提下說的話，楊、墨有沒有辯，不是沒看過失傳古籍、生活在其時的錢穆所能知道的！）猶其言曾史之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也。夫以此言曾子，猶之可也。以此言史鮒，則違之遠矣。今乃據此言春秋時學術，謂有曾參、史鮒一派，則人笑之矣。楊、墨之言，夫亦猶此。特其書出《孟子》後，襲用楊、墨之名，非確指楊、墨之實也。〔《莊子》又云：「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亦與此同例。《荀子》書言史鮒、陳仲，又言鄧析、惠施，所重只在陳仲、惠施，不在史鮒、鄧析。先秦書此例極多，會通觀之，可勿拘也。又按：〈文選·潘嶽西征賦注〉《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注》，引《莊子》皆作「鉗墨翟之口」，劉峻《廣絕交論注》引，則作「鉗楊、墨之口」，知古人於此等處，本自不拘。〕

又稱莊子之語惠施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而五」，此尤不足據。何則？夫秉為公孫龍字，則不得為學派之稱。（朔雪寒註：錢穆說「夫秉為公孫龍字，則不得為學派之稱。」試問難道「惠施」這個「夫子」就不得為學派稱嗎？學派就不能跟特出的人相提並論嗎？這是什麼邏輯？根據在哪裡？既然莊子已經指出「楊、秉」這些都是個人，且「惠施」也是個人，那麼請問哪裡有「則不得為學派之稱」的胡說八道呢？這不是表示錢穆根本就看不懂這句話的意思嗎？詳細考察錢穆所有的考證文章，大家便越能肯定錢穆無法讀通文言文的嚴重缺陷。譬如老子公案。）且公孫龍在惠施後，亦不能並世稱雄，則無來有五也。（朔雪寒註：這也是莫名其妙的說法。說「秉」是公孫龍，那也只是一種可能的解釋。可是如果按照楊朱稱楊的做法來例「秉」，那麼「秉」就不一定是公孫龍了！說「秉」是公孫龍，出自唐朝成玄英的註解。但如果莊子能口出此言，而「秉」又確實是公孫龍，那麼是公孫龍的活躍年代要調整，而不是反過來說莊子的話不成立。如果所謂的「秉」其實是「季」的誤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顯然，從所有跡象與史料來看，「秉」正該是「季」的誤字。與「楊」用氏來指稱相合。指的正是荀子所說「慎、墨、季、惠」中的「季」。）然則楊、墨固不當並稱乎？曰非也。昔荀子曾言之曰：「慎、墨、季、惠百家之言。」〔《成相篇》。〕夫墨子最顯矣，惠施則遜焉。慎到又遜之。季真之名，若存若亡。韓非言之曰：「儒分為八，墨分為三。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

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三墨既皆不傳，後之言儒者，不聞以仲良氏與孟子並稱，又不聞以樂正氏與孫氏齊舉也。今必據韓非之言，謂仲良氏、樂正氏，其學力之所至，風尚之所靡，與孟軻、孫卿等量，則惑矣。必據荀卿之言，謂季真之在當時，與墨翟齊名，則愚矣。必據孟子而謂楊朱之在當時，與墨道相抗衡，平分天下學徒，又何異於此哉？（朔雪寒註：這些根本都是不一樣的論述。側重點都不同，錢穆等同論之，實屬可笑！而且錢穆並不是親自生活在那個時代，所可見的文獻又稀缺，怎知這些人所說不符事實？證據何在？）然必謂楊朱不得與墨翟齊稱，亦妄也。有一人之言，有一時之言，有舉世之言，有歷久之言。夫以儒、墨為顯學，此舉世之言也。亦歷久之言也。或言楊、墨，或言慎、墨、季、惠，或言八儒三墨，則皆一人一時之言也。後人不曉此，據一人一時之言，以評量上世之學術，又安所得真？（朔雪寒註：錢穆說的好像很高明，那麼請問他靠什麼來評量當時的學術？東拉西扯、胡說八道？）

又按：〈莊子·應帝王〉：「陽子居見老聃」，《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遇老子。」《釋文》：「陽子居姓楊名朱，字子居。」又《山木篇》：「陽子之宋」，《釋文》：「司馬云：陽朱也。」字皆作陽。而《駢拇》《法篋》《天地》稱楊、墨，《徐無鬼》稱儒、墨、楊、秉四，皆作楊。〈孟子·盡心〉：「楊子取為我」，〔取猶「異取以為高」之取。上言取為我，下言執中執一，取與執略同義。《墨子》書有《小取》《大取》，皆此義也。〕〈呂氏春秋·不二〉，則曰「陽生貴己。」〈莊子·山木篇〉陽子，〈韓非·說林〉作楊子。古書陽楊通段，則陽子即楊子也。惟《莊子》書本作陽子，《孟子》書則作楊子。今《莊子》書中作楊字，以楊、墨並稱者，其文盡出《孟子》後。蓋《莊子》書非出一手，非成於一時，此亦其證。（朔雪寒註：錢穆把古籍流傳過程中必然發生的文字訛誤當成了一本書「非出一手，非成於一時」的證據，這程度簡直荒唐可笑呢！而隨意的就說那些提到楊朱的都是孟子之後的偽作！但這很奇怪啊！楊朱本來就在莊子之前，即使按照錢穆的胡扯也還在莊子之前啊！莊子怎麼就不能提了？那些所謂的莊子假貨怎麼就必得要遵照孟子的說法來偽造了？這是什麼道理？孟子的影響力這麼大？孟子以後、先秦以前，提孟子的有提楊朱的多嗎？影響力誰大？）而莊子著書並不稱楊、墨，亦可見。（朔雪寒註：那些莊子說楊、墨都被錢穆說成是假的，然後再回過頭來說莊子不稱楊、墨。這是疑古派常用的爛招。所以疑古派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至於考證、邏輯、證據，不需要的！）近人馬氏《莊子義證》疑陽子為老子弟子，非楊、墨之楊，謂有陽、楊二子，其說大誤。（《山木》陽子之

宋，《寓言》陽子居南之沛，兩文均見於〈列子·黃帝篇〉，均作楊朱，可證馬說之誤矣。

小結

所以錢穆在季梁篇考證說要大家參考楊朱篇的考證，彷彿他在楊朱篇提出了什麼兩個季梁就是一個的證據。可是請問證據在哪？楊朱篇不過就是用了季梁篇的猜測，說兩個季梁就是一個，然後春秋末年戰國初年的楊朱就被拉到了戰國中期了！這算什麼考證？隨便瞎猜瞎說，不用講任何證據，隨意的否定前人的註釋，於是就得出結論了？可是當我們看一下疑古派在想要把一本書打成假書時，那些對他們似乎有利的註釋類證據，就都不可疑了。甚至靠後的註釋家隨意的猜測也都成了鐵證了！（如鬼谷子、孔子家語公案）就具有無與倫比的證據力了！而靠前的註釋家的註釋又成了不可信的廢話了！雙重標準，就是在這裡萌發茁壯的！

那麼我們回顧一下，錢穆在楊朱篇的考證幹了什麼？錢穆在把一堆楊朱的資料引出之後做什麼高明的闡釋？沒有，而且顯然錢穆是在貶低楊朱！因此他說孟子說楊朱的學說遍天下不可信，只是孟子的一家之言！說莊子記錄楊朱的部分都是後出的。非常奇怪的事情是，按照錢穆已知季梁在魏國攻打邯鄲前還沒死，而楊朱死在其後，如果是真，那麼楊朱本來就在莊子、惠施之前，而莊子、惠施、孟子交集的時間也很多，所以為什麼孟子能提楊朱，莊子提了就是假的？就說那是外篇那些假貨按照孟子的說法提出的？孟子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幾句誇張的話就被當真了？說穿了，其實無非就是錢穆想要貶低楊朱的影響力罷了！因為楊朱不是儒家，是道家。作為新儒家，貶低道家是基本操作！所以貶低老聃、貶低楊朱、說莊子有部分內容都是假貨，這些都是道家被貶低的事實啊！

所以看完錢穆這篇所謂的考證、繫年，讀者並不會因此更理解楊朱，而可能只是更瞧不起楊朱！

道德經論正相關考證

那麼筆者怎麼考證楊朱呢？首先，與楊朱有交涉的有老聃、季梁等人，而其中有問題的就出在季梁。因為季梁本來在春秋末年以前就有一個，現在楊朱

又與季梁交談、晚於季梁而死，而疑古派如錢穆隨便就咬季梁就是一個。所以自然得考證一下，究竟楊朱認識的季梁為什麼不是魏惠王時代的季梁？但其實本來歷史中存在多個同名同姓的人就是正常的事，這是常識範疇的東西。理應是疑古派去證明兩個季梁是一個，而非主張史料可信的人去證明什麼！但楊朱公案牽涉到列子公案，所以對於楊朱所交往過的人的事蹟只要都能證明其實都是春秋末、戰國初年的人，那麼季梁自然也就絕不可能是戰國中期那位企圖阻止魏惠王攻打邯鄲的季梁了！因此，為了避免疑古派再生事端，乾脆把考證做得徹底一點。

以下是關於楊朱與季梁的考證：

〈道德經論正·老子弟子與老子·楊朱〉：

楊朱，又稱楊子（〈列子·力命〉、〈列子·楊朱〉、〈孟子·盡心上〉），則楊為其氏。〈莊子·應帝王〉稱其為「陽子居」，則「子居」可能是其字。

關於楊朱，其思想主張「貴己」，〈呂氏春秋·不二〉：「聽群眾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陽生」依照高誘註即孟子所說的「楊朱」。〈金樓子·著書〉正作：「老聃貴弱，孔子貴仕，陳駢貴齊，楊朱貴己，而終為令德。」、〈昭明文選·序下·豪士賦序〉：「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罔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昭明文選·詩甲·述祖德詩二首〉：「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李善註：「《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也引作「陽朱貴己」，〈容齋四筆·卷六·王廖兒良〉引作：「楊朱貴己」。「楊、陽」古通，「朱、生」形近而誤，非另有別稱！唯「孔子貴仁」又誤為「孔子貴仕」，「仁、仕」也是形近而誤。

從目前可見的資料可以得知與楊朱有過接觸的人物先後有：老聃、禽子、梁王、季梁。

至於楊朱與老聃的關係，只有三則相關記載：

〈莊子·應帝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莊子·寓言〉：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列子·黃帝〉：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荅。至舍，進涓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孔子家語·王言解〉：

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曾子曰：「非敢以為足，請因所聞而學焉。」

子曰：「居，吾語女。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

「陽子居」依照文本對應關係，當作「楊子居」。「楊、陽」形音皆近而誤，若以列子所記「楊朱、楊布」以及孟子也稱「楊朱」等等眾多例子來衡量，則應該以「楊」為正確的寫法。楊朱與老聃的關係，目前僅存此兩例，其中一例重複。「朱、子居」很難「見名知字」，如「朱」無誤，則「居」當為「梲」。兩者都是一種樹木。〈說文解字·木部〉：「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說文解字·木部〉：「梲：櫝也。」、〈說文解字·木部〉：「櫝：梲也。」、〈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皇矣〉：「啟之辟之，其櫝其梲。攘之剔之，其絜其柘。」「梲」的木料可用來做拐杖給老人使用。這一點猜測，可能得出土文物出土相關文本之後才能斷定了。至於關於楊朱的其他相關推測，可參考〈亢倉子〉一節。

老聃對楊朱講述「明王之治」、孔子對曾子講述「明王之道」，都是當時頂尖知識份子所關注的議題。其中孔子「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也是化用自老聃的話語。

子貢之世父

楊朱除見過老聃之外，還見過墨子弟子禽子，與禽子有過交談記錄。

〈列子·楊朱〉：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列子·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

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史記·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由以上引文可知，禽滑釐最晚可見到的事件是「子貢之孫」端木叔之死。子貢生於前 520 年，若以正常情況推知，子貢二十歲生子，子貢之子二十歲又生子，那麼端木叔死於前 420 年，若以三十歲生三十歲，則可推到前 400 年後。為其死亡上限。則禽滑釐的死亡上限也可定於此時。根據當時的禮法，則男子需要三十歲才能娶妻，因此當以三十歲為一個世代的間隔。相關資料引如下：

〈穀梁傳·文公十二年〉：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孔叢子·論書〉：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者、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

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孔子家語·本命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

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顴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

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群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耦。男子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疋夫之聽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閨外之非義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疋婦之德也。」

因此〈說文解字·卅部〉：「世：三十年為一世。」以三十年為一「世」代的間隔正是根據古代的禮而來。而其中的孔子與子張、孔子與魯哀公對談，都正是子貢生存的時間。

但事實上，關於這則「子貢之世」的記載是有問題的，表面上看「子貢之世」跟「辱其祖、德過其祖」似乎是相合的，但這是把「祖」跟「子貢」聯繫到了一起的緣故。事實上，這則記載還有其他「異文」存在，引如下：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八·施恩下〉：

《列子》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籍其先資，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埋葬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孫之財焉。金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奢〉：

《列子》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籍其先資，家累萬金。意所欲者，無不為；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及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實。一國之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六·貲財〉：

《列子》曰：端木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貲，家累萬金。放意所好，生民所欲，無不為也。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行年六十，乃棄其家事，都散庫藏；及其死也，無埋瘞之資。

其中〈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八·施恩下〉、〈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奢〉都引作「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子貢之世父」與「子貢之世」一字之差，解讀上相差十萬八千里。所謂「世父」：

〈爾雅·釋親〉：

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父之舅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釋名·釋親屬〉：

父之兄曰世父，言為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

父之弟曰仲父；仲，平也，位在中也。

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

根據引文則「世父」即今所謂「伯父」也。那麼這段話的解讀變成子貢的伯父的行為侮辱了他的祖先，也就是子貢的曾祖父。若以楊朱見老聃、見梁王以及未見其他戰國時代諸人，而僅見墨子弟子禽骨釐，墨子又見曾子等事，結合古文脫文為常見錯誤等事項，且「世父」脫文為「世」或涉後文「祖」而被「刪」的可能性與概率遠遠大於「世」之後衍一「父」字。反之，由於「世父」依照目前可見的文獻，其用例非常少，那麼就統計概率而言，「世父」誤為「世」的概率將遠遠高於「世」後衍一「父」字。又「X之葉也」也屬於古代的用法，但用例也不多。「世」也可能為「葉」之錯誤，但這種錯誤即便發生，其意義也不受影響！若就統計概率而論，「葉」壞為「世」的概率又大於「世」衍一「父」字。綜合考量之下，當以「世父」為是。從〈爾雅·釋親〉、〈釋名·釋親屬〉的解釋可知「世父」由來已久，屬於東周時期便已經

使用的詞彙。如此「子貢之世父」至少比子貢（生於前 520 年）大三十歲以上，則前 550 年是其出生下限；按照記載端木叔「行年六十，氣幹將衰……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則其死亡至少在六十一歲以後，但不會超出太久。今以六十歲計算，則六十年後是前 490 年。仍接近於老聃見孔子與出關時期，是一個最符合楊朱、老聃生存年代的答案。

若從古代實際用例來考察以進行研判，則可斷定所謂「子貢之世」確實為「子貢之世父」的錯誤。按照實際用例，如果要表達「子貢之孫」大可直言「子貢之孫」何須說是「子貢之世」？且「X之世」一般用來指某一段朝代、某一位帝王在位的時間，即使是用來指「世系」也一般用來指帝王的世系，用「之世」來說明是出自「子貢」，這種用法是唯一的孤例。以下分三種用例來舉例：

一：從春秋時代到漢朝的「X之孫」的普遍用例：

〈大戴禮記·五帝德〉：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

〈左傳·桓公二年〉：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左傳·文公八年〉：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

〈左傳·昭公七年〉：

（子產對趙景子說：）「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左傳·昭公十二年〉：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鮒。

〈左傳·定公四年〉：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

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

〈左傳·哀公十二年〉：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左傳·哀公十五年〉：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左傳·哀公十七年〉：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戰國策·趙策一·晉畢陽之孫豫讓〉：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

〈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

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

〈史記·樂毅列傳〉：

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卿，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

〈史記·匈奴列傳〉：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新書·禮容語下〉：

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

〈法言·問道〉：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臺。

〈漢書·匡張孔馬傳〉：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

〈前漢紀·高祖皇帝紀一〉：

籍字羽。故楚將項燕之孫也。

〈潛夫論·志氏姓〉：

祝融之孫，分為八姓：己、禿、彭、姜、妘、曹、斯、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甯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在權寵，為貴臣。

二、「X之世也」的用例：

〈論衡·實知〉：

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

〈呂氏春秋·謹聽〉：

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

〈漢書·高帝紀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從這僅有的幾個用例不難得知，以孔子而言，「宋大夫子氏之世也」與「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都是不明確指出是哪一「世」，而「遭紂之世也」，是指紂在位的世界。以此而論，假設「辱其祖、德過其祖」的「祖」是指子貢，則〈列子·楊朱〉是「明明」知道「端木叔」是「子貢之孫」，為何不直接說是「子貢之孫」而需要用「之世」這種模糊用語？因為「之世」可指兒子、孫子、曾孫、玄孫等等。

三：「X之世」例：

〈禮記·中庸〉：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孔子家語·五儀解〉：

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

〈孔子家語·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問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告子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荀子·儒效〉：

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潛夫論·志氏姓〉：

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戴、大臨、彪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

「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桀紂之世、堯舜之世、桀跖之世、高陽氏之世」，從這些用例不難發現，除了「桀跖之世」盜跖因與桀相提並論而用「之世」之外，其他都是帝王。因此說「子貢之世」從這方面來看，也是不適當的，缺少實際用例的。雖然「之世父也」的用例除字書解釋外，也僅此一見，但其在使用上符合古代的習慣卻也是無疑的。

因此，不管是從上下文的相關性、「之世父」與「之世」誰最可能是訛誤的概率高低、古代實際用例，以及子貢之世父、子貢之孫所牽涉的相關人等的綜合判斷，則顯然「子貢之世父」才是正確答案。如此，楊朱不管是否比禽滑釐年歲還大，其能見到陶朱公成名後的梁王，必然可以見到「子貢之世父」六十歲之死，是無疑的。

最後，其實還有一點能更加證明「子貢之世」確實就是「子貢之世父」的錯誤。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齊。……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韓詩外傳·卷八〉：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

〈列子·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墨子·所染〉：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淮南子·汜論〉：

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

〈淮南子·脩務〉：

夫墨子跌蹄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

〈呂氏春秋·當染〉：

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呂氏春秋·尊師〉：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

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史記·儒林列傳〉：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

〈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後漢書·郭符許列傳〉：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

〈說苑·臣術〉：

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方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間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

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新序·雜事四〉：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庸可？』此功之所以不及王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列子·楊朱〉：

楊朱曰：「原憲竄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竄損生，子貢之殖累身。」

子貢是衛國人，根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子夏」也是「衛國人」。「段干生」，根據〈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奢〉引文可知是「段干木」之誤。段干木即子夏之弟子。「木、生、朱」皆形近而誤，「楊朱」即一誤作「楊生」。
〈墨子·所染〉將「段干木、禽子」相提並論，〈列子·楊朱〉則兩人都對同一件事情發表議論。
〈淮南子·脩務〉甚至將「段干木」拿來與「墨子」相提並論，何故？段干生能聽到禽子對衛國端木叔的言論，而發表相反的言論，頗似儒、墨之爭。禽子是貶，段干生是褒。子夏生於前 507 年，根據推論則「子貢之世父」約死於前 490 年，此年子夏是十八歲，孔子死於前 479 年，該年子夏二十九歲。而子夏遠在孔子死前就已經成名了！因此，「子貢之世父」死或可晚個幾年，但依然符合子夏可收段干木為弟子的年紀。且禽子能在此時發表議論，與墨子與曾子曾經交談的時間也是符合的。但反之，子夏弟子段干木還能聽到前 400 年後子貢之孫死去並發表議論的可能性已經很低，甚至可以說不存在了！

根據〈呂氏春秋·當染〉則段干木乃子夏弟子。根據〈史記·儒林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則子夏之倫包括了子貢、曾子，其中田子方是子貢弟子、吳起是曾子之子曾申弟子、段干木是子夏弟子，那麼禽滑釐是誰的弟子？司馬遷將今日一般當成墨家重要人物的禽滑釐擺在一個儒家的師承脈絡之下，則表明禽滑釐也曾經是儒家弟子。如果兩人都是儒家弟子，甚至都是子夏弟子，那麼段干生能聽到禽子對同是儒家重要人物子貢親戚的批評就很正常了。而魏文侯所用三人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其中子夏是衛國人，田子方也是衛國人子貢弟子，而段干木則是衛國人子夏弟子。都出自衛國或與衛國有關。

這裡的重點在於「衛端木叔」以及段干生所說的「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其重點完全圍繞在「衛國」身上，表明這「子貢之X」其實是個「衛國人、衛國之君子」。如果是「子貢之世父」，那麼子貢本就是衛國人，子貢的伯父是衛國人便也是情理之常。但子貢如果最終沒在衛國終老，則其子孫便不一定可以算做「衛國人」。根據〈史記·儒林列傳〉：「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則若是子貢之孫，則其當在齊國繼承家業，至少這可能性遠遠大於子貢在齊國終老，但子孫卻居然決定離開大國回到小國！且根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韓詩外傳·卷八〉：「子貢，衛之賈人也。」〈列子·楊朱〉：「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子貢之家「家富累千金」並不始於子貢而始於其先人。而這一點也符合「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的說法。「子貢殖於衛」與「子貢，衛之賈人也。」的說法相合，都是指子貢的職業。而後其子貢已經當過許多國家的宰相，並在齊國終老。若是子貢之孫不在齊國繼承子貢的遺產，卻反而回到衛國，並不合情理！

正因為子貢本是衛國人，因此在孔子的歷史中，眾多孔子弟子與衛國大人物交談的事件幾乎都與子貢有關，前去與衛國大人物交涉的事情也都落在子貢身上。這裡僅舉其中幾條資料如下：

〈韓詩外傳·卷九〉：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

〈孔子家語·困誓〉：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繫琴》以哀之。……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

由於子貢出生於富貴人家，因此才得以與衛國眾多大人物相熟。這一點也與端木叔的背景是一致的。因此，從以上的分析，由於「子貢之X」其實正是衛國人，因此即便僅就概率而論，其是「子貢之世父」的概率也遠遠大於「子貢之孫（世）」。

而「子貢之世父」一句也透露出，端木叔之死之所以引起禽子、段干木等人的興趣完全是因為子貢的緣故。

「端木叔」這個稱謂在春秋時期是很常見的一種「姓氏＋伯仲叔季」的形式，「叔」不是名字而是排行。〈國語·齊語〉：「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有鮑叔（鮑叔牙）、〈國語·晉語六〉：「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有欒伯、范叔、〈國語·周語下〉：「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者也。」有萇叔（萇弘）、〈國語·晉語九〉：「董叔將娶于范氏。」有董叔、〈禮記·檀弓下〉：「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吊。〔註：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有子叔敬叔、〈孔子家語·致思〉：「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有南宮敬叔（南宮閱），其中南宮敬叔、子叔敬叔的「敬」都是諡號。「端木叔」正符合「姓氏＋伯仲叔季」的形式。如此，則子貢的父親在家裡的排行至少是「季」或以後。

〈列子·楊朱〉：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禽滑釐以為以孟孫陽的說法問老聃、關尹，那麼他的言論是恰當的，但從《老子》裡所展現的老子思想看來，尤其其中針對「聖人」的說法，顯然相去甚遠了！但若以此衡量《文子》記載的老子相關言論，則禽滑釐的說法明顯合理！

從楊朱及其弟子對談的對象是禽子看來，至少可以證明三人是同時人。而禽子、段干木已經算是孔子的第二代弟子。

梁王

關於歷史上的「梁王」，一般學者都「認定」是指魏惠王，實則根據相關史料可證早在魏惠王稱梁王前便有梁王的存在了。即便只是依據常識推理，我們也不難知道，魏惠王滅梁之前，梁必然存在，梁存在就有一個國君，這個國君對外可以自稱梁君，也可以如楚國流域的一些小國如徐偃王自稱王，而對內則都可以被臣下尊稱為王，如〈墨子·魯問〉記載墨子所見齊王，而記載稱其為「齊大王」，其時齊國國君尚未正式對外稱王。因此，弄清楚「梁王」的生存時間是釐清楊朱生存時間或相關記載真假的關鍵因素。相關資料引如下：

〈說苑·政理〉：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

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說苑·善說〉：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柶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寧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二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新書·連語〉：

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蔡澤對應侯說：）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

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考證，魏惠王在位期間為前 369 年至前 319 年。根據《竹書紀年》：「（周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顓立。」周顯王四年當前 365 年。則魏惠王要稱為梁王已經是前 365 年以後的事情了！根據拙作《孫臏考》考證，則魏惠王遷都大梁在前 361 年。

陳子遊說「梁王」，陳子說：「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齊景公）」，而梁王說：「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口出「景公」如果不是後人追改，就只能表示陳子出口時，齊景公已經死了。齊景公死於前 490 年。

若以「陳侯」指「陳國之君」而論，陳國早在前 478 年，也即孔子死後一年，便被楚國所滅。此時哪來的「魏惠王」？若以「陳侯」指「田齊之主」而論，出土文物有「陳侯因諮敦、陳侯因諮戟」，其中的陳侯指的都是「齊威王」，而《孫臏兵法》有〈陳忌問壘〉一篇，內容牽涉到的主角正是「田忌」，齊威王、田忌都屬於田齊家族的一員，其祖先正是「陳國」陳厲公之子公子完，因此齊威王得以在未稱王前被稱為「陳侯」。以此而論，當前 334 年以前。而齊威王的年代也確實主要與梁王「魏惠王」相交集。〈戰國策·秦策四·或為六國說秦王〉：「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用的也是「梁王」對「陳侯」。

梁王：「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則其中所謂的「陳侯之國」必然大於「梁國」。戰國初期至魏惠王敗於齊國桂陵之戰、馬陵之戰前，魏國實大強於齊國。要魏惠王自謙「小國」是不合實際的事情。春秋的陳國則是所謂「三恪」的國家，所謂的「三恪」是指周武王滅商之後，為了安撫人心、鞏固自己的成果，因此抓了幾個古代帝王的後裔，封了幾塊土地給這些後裔。於是虞舜的後裔封於陳國，夏朝的後裔封於杞國，商朝的後裔封於宋國，「陳、杞、宋」稱為「三恪」。同時陳國也是春秋時代主要的十三諸侯之一，十三諸侯即「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參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而梁國不在其中，屬於小國之列。因此，梁國這麼說，是符合實際的。

雖然「陳國之君」諡號都是「陳X公」，但孔子著的《春秋》屢稱「宋公」、「陳侯」。以下僅舉部分相關資料，以資證明：

〈左傳·隱公四年〉：

（經）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史記·陳杞世家〉：

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疾為陳公**。……

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弑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

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湣公**。

〈說苑·善說〉：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國語·魯語下〉：

仲尼在陳，有隼極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罫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聞之。

〈孔子家語·辯物〉：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罫，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

〈說苑·辨物〉：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罫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罫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亢倉子·全道〉：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

曰：「敝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為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

〈戰國策·秦策四·或為六國說秦王〉：

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

〈墨子·魯問〉：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鵲冠子·世賢〉：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誠在身，必待俞跗。」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間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呂氏春秋·自知〉：

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

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

文侯喜曰：「可反歟？」

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

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新序·雜事一〉：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

群臣皆曰：「君仁君也。」

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

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

任座對曰：「君仁君也。」

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臣聞之，其君仁，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拜為上卿。

〈說苑·奉使〉：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眾，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

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

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

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

魯君曰：『吾千乘之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

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

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

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觀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

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

柳下惠曰：『臣君不懼。』

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

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剝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剝羊矣。」臣之君固以剝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

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因此，不管以「陳國之君」或「田齊之君」而論，「梁王」都可以口出「陳侯」！這也是楊朱的問題之所以難解的原因之一！因為幾乎每一筆與楊朱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資料都牽涉到了「多種可能」！但因「陳子」稱「今孔子經營天下」之說，且〈新書·連語〉記載梁王與陶朱公對談，因此可以確定此「陳侯」是春秋陳國之陳侯，而非戰國齊國之陳侯（田侯）。陶朱公即范蠡，范蠡在前 473 年越國滅吳國之後便先到齊國後隱居於陶，其時間符合梁王與陳子對談的時間。同時，陶、沛，在春秋戰國都屬於宋國領土。顯然楊朱所見的梁王根本不是魏惠王！而這一點也符合楊朱見老聃的相關記載所體現的時間線索。且根據〈亢倉子·全道〉：「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的說法，則「陳懷公」也可以稱為「陳君」。

根據以上的資料「魏文侯」也成被誤稱為「梁王」，而這種誤稱正來自於魏惠王稱為梁惠王的影響。以致於許多魏侯、魏王都被改為「梁王」了。根據這個事實，「梁王」本就不單指魏惠王，而是可以是其他魏國領導者的誤稱！

且春秋時代除了楚國稱王以外，吳國、越國也都稱王，甚至楚文王時的徐國也稱王（徐偃王），墨子時已可與「齊大王」交談（〈墨子·魯問〉），龐煖回答趙襄王時一稱「魏文王」、二稱「魏文侯」，則「魏文王」當是「魏文侯」之誤！或者相反，在龐煖的認知裡「魏文侯」已然是「魏文王」了！當時若依照《史記》所載「官方認證的說法」（得到周天子承認），則彼時齊國尚未稱王，齊國稱王已經是齊威王時的事情了！而另一種更大的可能則是，「梁君」被誤寫成了「梁王」！此外，由上文可以推論「梁王」的梁當靠近楚、陳以及宋國的陶之地，其稱王並非不可思議之事。且依照上引資料可證，「梁王」並不是「魏惠王」。

那麼誰是梁王？

〈左傳·僖公十八年（前 642 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左傳·僖公十九年（前 641 年）〉：

（經）梁亡。（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秦穆公）十九（年）滅梁。梁好城，不居，民罷，相驚，故亡。

秦穆公十九年，當前 641 年。秦國滅梁。梁國已經滅亡，梁國未滅亡前其國君稱為梁伯，梁伯曾經魯僖公十七年將梁嬴嫁給晉惠公。梁伯因為喜好築城，因此成為滅亡的主因。梁國之梁依照地理位置又稱為少梁，魏惠王遷都的大梁為區別於少梁因此稱為大梁。魏惠王遷都大梁在前 365 年，此時魏惠王始能稱為梁王。

如此，究竟誰是春秋末年的梁王？「梁王」的「梁」究竟在哪？個人認為有三種可能是在空間與時間上都符合條件的選項：

第一種可能：

魏惠王所滅的梁，必然存在於魏惠王所滅之前。而此前，天下不可能無故出現一個梁，如此則梁必然早已經存在了。而這個後來成為魏國首都的梁，也確實靠近楚國。其國君自稱為王，符合楚國流域一些大小國自稱為王的做法，如楚王、吳王、越王、徐偃王。

〈說苑·尊賢〉：

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武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

「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奚賁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周威公在位期間為前 414 年至前 367 年，其中提到楚國「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從文意可以推知「梁、鄭、宋、衛」當屬於同一個等級的國家，至少可以證明「梁」在周威公時還存在。這也符合魏惠王滅梁的記載！因為梁不存在，魏惠王無梁可滅，這是常識推論！

第二種可能：

依據《竹書紀年》：「（周貞定王）七年，晉荀瑤城南梁。」周貞定王七年當前 462 年。荀瑤即是智伯（智襄子）為當年晉國四將軍裡勢力最大的一位。若以文子、關尹子談及「魏」，而司馬子期之子魯陽文公得與「韓」構難觀之，如此，試問前 453 年智伯未被滅亡前其領地的稱呼為何？若以魏惠王之例類推，則所謂「梁王」或為智伯。果真如此，則楊朱見梁王的記載，只能發生於前 453 年。前 492 年，晉國六將軍中的范氏、中行氏被消滅，剩下的四將軍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共分其地。〈淮南子·兵略〉稱：「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以此而論，則智伯敢於稱王是有底氣的。可惜的是，目前所見文獻，智伯的稱謂裡絕不稱為梁王。因此這第二種可能，無法在領導者的稱謂上符合條件。

在這種可能中還隱含了另一種可能，也即梁王是指尚未被滅前的南梁的王。如此則南梁被晉國滅於前 462 年以前。這樣的可能性是從智伯「城南梁」推出的，其相關例子可見〈公羊傳·襄公二年（前 571 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瑤、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系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古代「城」一個地方有幾種可能的原因，這是其中一種。

第三種可能：

〈管子·輕重戊〉：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而財用足

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灸不相見，綈綺而踵相隨，車轂鬬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國語·楚語下〉：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註：「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不知其他。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根據魏惠王滅梁一事、〈管子·輕重戊〉、〈國語·楚語下〉的記載，則可以確定春秋時代還存在另一個梁國，這個梁國是靠近齊國與楚國的梁國，與秦國所滅的梁國不同。

老聃一向被傳為陳人與楚人，「梁」是楚國地名，既符合老聃是楚人的記載，也符合靠近宋國領土「陶」，以及楊朱想從北方到南方的「沛」卻在楚國的北部邊境「梁」遇到想要往西前往秦國的老聃的記載。而梁在未成為楚國領土前的統治者，因為其國土靠近楚國，一如吳、越、徐等，也可能屬於自行稱王的一類君王。如此，所謂的「梁王」當即指原本尚未成為楚國領土的「梁」的國君。而這個「梁」也可能就是後來魏惠王所滅的「梁」，之所以如此，乃在於「梁」可以被楚王作為封地賞賜給自己的大臣或親屬。

這個推論是最可能的結論，假設成立的情況下，由上文可知，「梁」在楚惠王時已經是楚國領土了。而「梁王」要提到「陶朱公」那是在前 473 年以後數年後的事情了。如此「梁」的滅亡在前 473 年之後，如此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這件事只能發生在前 473 年以後。

以這則記載來看，古代除了昏君之外，賞賜土地給大臣都有些緣故，其中最普遍的一個便是該人有戰功，而這種戰功又通常與所賞賜的土地有關。因此楚惠王要將梁賞賜給魯陽文子，可能正是因為剛滅了梁的緣故。這在楚國自有先例，譬如〈國語·楚語上〉：「靈王城陳、蔡、不羹。」韋昭註：「三國，

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

因此，可以推論，楊朱遇到老聃的「梁」正是當時的梁國，而楊朱可能就在相近的時間會見了梁王。後來梁被魯陽文子所滅，因此楚惠王便想將此地賞賜給魯陽文子，而由其駐守此地，但魯陽文子以梁國利於反叛祖國為由加以婉拒，而接受了魯陽，因此便被稱為魯陽文子。

根據出土文獻，北大藏西漢竹簡《儒家說叢》記載：

梁君問於仲尼曰：「我欲長有國，欲使列都得，欲使人竭力，欲使民無惑……時，欲使聖人自來，欲使官府治，奈何？」仲尼對曰：「萬乘之君，千乘之主，問丘者眾矣，未有君之問丘之悉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慧臣忠，則列都得；益士食，則……」

顯然，孔子之時，確實仍存在一個梁國，且其國王曾與孔子對談過。那麼「梁君」曾經交談過的便有孔子、楊朱、范蠡、陳子，前三者都是有智慧、有大名聲的人。

以儒家的角度而論，與仲尼對談的人只能稱為梁君或X君，而不會稱為梁王或X王。因為就儒家而言，王只有一個就是周王。因此在孔子的《春秋》中，楚王、吳王既是子爵，也只被稱為楚子、吳子。此外，從與梁君對談的是「仲尼」這點線索，也可以得知此對談是發生於孔子五十歲以後的事情，相當於前502年。因此僅是根據這一則，也能確定老聃的弟子楊朱見梁王是絕對合理、合乎客觀實際的事情！而且即便「梁」不稱王，依照「宋元公」又被稱為「宋元君」以致最後誤稱為「宋元王」的例子，「梁君」在流傳過程中被誤稱為「梁王」（梁王的名號因魏惠王而有名，而魏惠王有個下屬與楊朱的朋友同稱謂。）便有了前例可循。而梁王、梁君的存在，也證明了梁王口說「陳侯之國」與召見陶朱公也都是符合客觀事實的。「老聃弟子楊朱」、「陳侯之國」、「孔子」、「范蠡（陶朱公）」，這些都是同一個時代也即春秋末年仍然存在的人物或國家，因此，楊朱所見梁王非梁惠王，已無可疑了！

與楊朱有關的另一個人物是季梁，季梁在歷史上有多個，其中隨之季梁與楊朱的季梁保證無關。那麼問題便在於「剩下」的季梁是否是同一個人的問題。由於其中一個季梁有與「魏王」交談的記錄，因此，弄清楚季梁的問題，有助於釐清楊朱的時代問題。關於春秋末年以後季梁的相關記載：

〈列子·仲尼〉：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

〈列子·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十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眾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戰國策·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是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莊子·則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王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

「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

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

「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對公都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季梁，若把範圍侷限在目前可見的史籍之中，則春秋戰國之季梁有三位，其中兩位可以推斷出生存時代，一位的時代依附於楊朱的時代。兩位可推斷時代的季梁，一是魯桓公時隨國的名臣季梁，事見〈左傳·桓公六年〉（前 706 年）。一是魏國的季梁，其中魏國的季梁在魏王要攻邯鄲的時候曾前往阻止，可惜目前僅此一孤例。從季梁的言詞中，則此魏王為魏惠王的成份居大，主因在於魏惠王確實有想稱王的動機，而往後也確實稱王了，同時魏國也確實有攻邯鄲的軍事行動，也即梁惠王（魏惠王）十七年前 353 年因魏國攻打趙國邯鄲而引發的齊、魏桂陵之戰。又從魏瑩與季子的互動中，不難確定，季梁交談的魏王確實是魏惠王也即梁惠王、梁王魏瑩，因季梁可以稱為季子。兩則資料結合來看，可以確定確實有一位季梁曾經與魏惠王交談。

此外，〈列子·楊朱〉：「楊朱見梁王」，〈說苑·政理〉亦作：「楊朱見梁王」。但也有將「梁王」「改為」「梁惠王」的，資料引如下：

〈藝文類聚·獸部中·羊〉：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

百羊為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太平御覽·資產部四·園〉：

《列子》曰：楊朱見梁王曰：「王者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三·牧〉：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有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樂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矣。」

〈太平御覽·獸部十四·羊〉：

《列子傳》曰：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撇筵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藝，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這種誤引例或者搞錯人名、君主稱謂的情況在古籍的不同版本或引文中非常常見，加上「梁惠王」本有省作「梁王」者，因此這裡便產生了究竟是「省」成「梁王」還是「誤改」為「梁惠王」的多重解釋。根據以上的考證已經可知，「梁王」原始記載可能只是「梁君」而絕非「梁惠王」的省稱。即使原始記載就是「梁王」，根據以上楚王、吳王、徐王等例，也是可以成立的！

且事實上，「梁君」可被誤稱為「梁王」，有多種例子可循，如後於此梁王的有魏文侯又被稱為魏文王，實則魏文侯之子魏武侯都未曾被誤稱為魏武王，而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始稱王。如早於此梁王的例子有「宋元公」又稱為「宋元君」，後被誤稱為「宋元王」。同時宋元公之所以被誤稱為宋元王也是因為戰國時代宋國有一位君主稱王了，這與魏惠侯稱王、滅梁而被稱為梁王，最終與春秋時代的梁王混淆一事，其機制是相同的。又如前 375 年，韓哀侯滅鄭國，其後的韓宣王因此又被稱為鄭王、鄭威王，見〈戰國策·韓策二·齊令周最使鄭〉史舍稱韓王為鄭王，〈戰國策·韓策三·調鄭王〉，調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

權，莫如朝魏。』」則魏王又被稱為梁君、魏君。《竹書紀年》：「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鄭威侯即鄭宣王，《竹書紀年》又稱為韓威王，〈韓非子·說林上〉又稱為韓宣王。而春秋時代的鄭國自然根本未曾稱王。

從以上的證據對比可知，楊朱是春秋末年人無疑。畢竟季梁見魏王，仍然存在著至少同名同姓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姓在古代並不罕見。而楊朱若要能見老聃，實無可能活到見魏惠王的季梁死後。且春秋時代的「季梁」的「季」通常表示排行，一如羊舌氏的伯華（羊舌赤）、叔向（羊舌肸）之例。而戰國時代這位與魏惠王交集的「季梁」既然可以稱為「季子」，則「季」也便同時具有了排行與姓氏的可能。因此，就算都可以叫做「季梁」也不一定表示兩者「同名同姓」。從與楊朱有過交集的人如「孟孫陽、魯之孟氏」皆與魯國孟氏有關，如此則「季梁」可能出自「季氏」，也即魯國三桓之一。除此外。〈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八·哭〉：「《列子》曰：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列子·力命〉：「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十日大漸。」、宋·黃廷堅〈山谷內集詩注·樂壽縣君呂氏挽詞二首〉：「居然成萬古，何啻謁三醫。」宋·任淵（黃廷堅徒弟）註：

「《列子》曰：李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其中兩篇的「季梁」都有作「李梁」的例子。那麼所謂「季梁」也可能就是「李梁」之誤。

根據一般性推論：楊朱與季梁為友，而季梁曾經見過魏王，楊朱見過梁王。若魏王是魏惠王則魏惠王也可以稱為梁王。如此是楊朱與季梁兩人都見過梁王。如此在不考慮楊朱見過老聃的等等事實的前提下，自然很容易推論出楊朱是戰國時代魏惠王時人，主要活動於魏惠王遷都大梁的前後。但這樣一來，楊朱見梁王被嘲諷一事就跟孟子認為楊朱之言遍天下的影響力不合了！

且孟子已經稱楊朱與墨翟之言「盈天下」了，孟子也見過魏惠王。思想需要時間傳遞才能發揮影響力。如此，則楊朱、墨翟從他們都與禽子有過交談，且楊朱曾受教於老聃、墨子為禽子之師，兩人的輩份與年紀當亦相當。如此，則到孟子之時，兩人的影響力遍及天下，在傳播時間上也很吻合。此與戰國顯學為儒家、墨家的情況相當。但反之，吳起死時，墨家鉅子之位已經不是墨翟也不是禽子，則楊朱還要見魏惠王的可能性，即使僅考慮楊朱與禽子的時間也可以肯定已經不存在了！

〈淮南子·汜論〉：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

按照〈淮南子·汜論〉的記載，則孔子的主張必先於墨子而存在、墨子的主張必先於楊子而存在。從以上的討論，楊朱可以與禽子交談、楊朱反對墨翟的說法，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依然不存在矛盾之處。加上楊朱是老聃弟子、墨子與孔子弟子曾子等人有過交談，因此，可以模糊的說，楊朱與墨子同時。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說苑·脩文〉：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必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孟子將楊朱、墨翟、子莫三人相提並論，至少表示當時三人的學說為當世所知，同時成名早於孟子。其中楊朱、墨翟已經可知是同時人，而墨翟又與曾子同時（見本章〈墨子〉），同時由〈說苑·脩文〉可知顓孫子莫也與曾子同時。則三人是同時人的概率很高。

田氏之相齊

〈列子·楊朱〉：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

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其中楊朱在與魯國孟氏交談中提到：「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以實際上田氏稱王而論，據〈史記·六國年表〉齊康公於前 404 年繼位，前 386 年：「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為諸侯。遷康公海上，食一城。」、前 379 年：「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則此比禽子可見子貢之「孫」死的時間更晚。若不以實際稱王而論，則齊康公前一任齊宣公於前 455 年繼位，此時齊國政權已完全掌控在田氏家族手中。但事實上這些「說法、推論」都不符合春秋戰國時人的認知。

「田氏相齊……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這句話不一定指田氏「滅」齊，而可以只是指實際掌控也即「取」齊，猶如韓、趙、魏尚未滅晉以前已經享有「晉國」一樣。關於這一點的證據很多：

一、田成子取齊國，是目前可見春秋末年至漢朝時的學者共識，其資料有：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趙簡子》：

趙簡子既受X將軍，在朝，范獻子進諫曰：「昔吾子之將方少，如有過，則非子之咎，師保之罪也；就吾子之將長，如有過，則非子之咎，傅母之罪也；今吾子既為X將軍矣，如有過，則非人之罪，將子之咎。子始造於善，則善人至，不善人退。子始造於不善，則不善人至，善人退。用由今以往，吾子將不可以不戒矣！」

趙簡子問于成鱣曰：「齊君失政，陳氏得之。敢問齊君失之奚由？陳氏得之奚由？」

成鱣答曰：「齊君失政，臣不得聞其所由；陳氏得之，臣亦不得聞其所由。抑昔之得之與失之皆有由也。」

趙簡子曰：「其所由豈可聞也？」

成鱣答曰：「昔吾先君獻公，是居唐，有二宅之室，以好士庶子，車甲閑，六府盈，宮中六灶並六祀，然則得輔相周室，亦知諸侯之謀。就吾先君襄公，親冒甲冑，以治河濟之間之亂。冬不裘，夏不張簟，不食濡肉，宮中六灶並六祀，然則得輔相周室，兼霸諸侯。就吾先君平公，宮中三十里，馳馬四百

駟，美其衣裳，飽其飲食，宮中三台，是乃侈矣，然則失霸諸侯，不知周室之□□□儉之侈□□□□□□□侈之儉乎？」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

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

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列子·力命〉：

季札无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

〈莊子·盜跖〉：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莊子·胠篋〉：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呂氏春秋·似順〉：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

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

〈韓非子·說疑〉：

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韓非子·十過〉：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韓非子·喻老〉：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史記·李斯列傳〉：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瑊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淮南子·汜論〉：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儒所生也。

〈淮南子·說山〉：

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高誘註：陳成子將弑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欲，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

〈淮南子·人間〉：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鼃穴，一抔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台，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眾，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必多矣。諸御鞅復于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

〈越絕書·德序外傳記〉：

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真，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卻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敘，能知忠直所死，狂悖通拙。

從戰國初期列子（田恆專有齊國）、中期莊子、晚期呂不韋、韓非、李斯到漢朝的劉安，都把田成子說成是陳氏真正取得齊國政權的人。至於春秋末年則有三個相關的說法：其中滿苟得與孔子弟子子張同時（有一說此子張為虛構，是無據的。）而稱「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子張與楊朱的時代重疊多、滿苟得「田成子常殺君竊國」的說法也與楊朱「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相同。此外，趙簡子與老聃、孔子、楊朱、田成子同時，且早於田成子而死，而他問成鱣說：「齊君失政，陳氏得之。」如此趙簡子所指的陳氏只能是田成子。因為田成子以前，田氏尚未成功掌權。而趙簡子這一說法也與楊朱的說法相同。此外，春秋末年《晏子春秋》最終編輯者稱「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

而取齊國。」這裡的「田氏」既可以指整個田氏，也可以單指其宗主「田恆」。這種說法正與楊朱「田氏」之說相合。

二、關於姜氏齊國的滅亡，戰國時代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十二世而有齊國」，一種說法是「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這兩種說法的共同點都是「田成子取齊國」，而非「田和取齊國」。相關資料有：

〈莊子·胠篋〉：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郭象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 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故改為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于郎邪，自為封邑。至恒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於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註：「案：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記史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唯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刻即有十二代，乃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史記·陳杞世家〉：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集解：賈逵曰：「京，大也。」正義按：

陳敬仲八代孫，田常之子襄子磐也。而杜以常為八代者，以桓子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皆相繼事齊，故以常為八代。」

〈呂氏春秋·長見〉：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

〈淮南子·齊俗〉：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韓詩外傳·卷十〉：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

〈莊子·胠篋〉這一篇簡直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殺齊君而盜其國」的「盜賊」不是別人，不是誅殺齊康公的「田和」，而是已經實際掌權的「田成子」。這其中司馬貞又因為算出了田氏「有齊國」的一個十二代的版本，因此說《紀年》「不妄」！這也是可笑已極的說法！司馬貞引文作「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是截頭截尾的引用，但其版本仍有「而」字，表明是「經過了十二代的努力才終於擁有了齊國」！但可惜，司馬貞依然誤讀！

田氏在齊國發展始於陳完，其十二代計算如下：「田敬仲完→田孟夷稚→田孟莊潛→田文子須無→田桓子無宇→田武子開→田僖子乞→田成子恆（常）→田襄子盤→田莊子白→田悼子→齊太公田和。」

當莊子說此話時，田氏十二代（田和）取齊國的事實已經成立。因此莊子雖然把取齊國的事實歸於田成子，依然還是把最終滅齊之後的田和算了進去。

關於二十四代的版本，是指姜氏政權在第二十四代就被滅了。而其共同點依然是指向「田成子」。從《史記》、《左傳》統計齊國君主人數，則齊國從姜太公到齊康公大概三十一代，即使扣除短暫繼承而不稱「公」的君主：齊君無知（2個月）、齊君無詭（3個月）、齊君舍（3個月）、齊晏孺子（10個月），所謂的二十四代怎麼算也算不到齊康公身上。如此，從姜太公算起二十四代，稱「公」者，第二十四代是「齊悼公」，接著便是第二十五代「齊簡公」。也即被田成子所殺之齊君。姜氏政權傳承圖如下：「太公→丁公→乙公→癸公→哀公→胡公→獻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前莊公購→僖公→襄

公→公孫無知→桓公→公子無虧→孝公→昭公→齊君舍→懿公→惠公→頃公→靈公→後莊公光→景公→晏孺子→悼公→簡公→平公→宣公→康公」。

其中只有〈呂氏春秋·長見〉保留了珍貴的信息「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漢朝的〈淮南子·齊俗〉、〈韓詩外傳·卷十〉其實都取自〈呂氏春秋·長見〉，但已經有了變化，而單稱「田氏」了！而正是因為兩者把「田成子」泛稱為「田氏」，而讓後人開始有了誤解！從這一點又可推論〈淮南子·汜論〉中「故使陳成田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一句有極大的可能仍然是引自戰國時代的書籍。

因此，即便所謂十二代有齊國指的是第十二代的田和，但其始作俑者是田成子也都是一併連帶被追究的。因此，從以上引文可知，姜氏二十四代被滅指向的是田成子、十二代取齊國其始作俑者仍是田成子。因此，戰國時代把齊國被田氏取代歸咎於田成子的主要有：戰國中期鬼谷子、莊子、晚期呂不韋、韓非、漢朝劉安、韓嬰。而春秋末年的人則有四個：滿苟得、楊朱、趙簡子、《晏子春秋》的補記者。

三、楊朱「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所描述的正是「田成子」。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卒歸於田氏矣。」……

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并也，君其擇焉。」君弗聽。〈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

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鱉蠃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韓非子·二柄〉：

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論衡·定賢〉：

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為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土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

〈淮南子·人間〉：

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无筦籥之信、關鍵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

其中白公勝作亂在前 479 年，其前三年是前 481 年。後於田常，屬於模仿之作。這與「龐涓陷害孫臏、惠施陷害莊子、李醯陷害扁鵲」這種同時代的創始與模仿事件相同。因為有人成功了，所以有人模仿。

四、楊朱所說田氏事件與同時代智者孔子、晏子看法相合，晏子之例除見上文之外尚有他例。相關例子如下：

〈風俗通義·皇霸·六國〉：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姁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孔叢子·嘉言〉：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輅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輅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十七〉：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鐘。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履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眾，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左傳·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纓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前 539 年）（齊景公九年）九。晏嬰使晉，見叔向，曰「齊政歸田氏。」叔向曰：「晉公室卑。」

〈晏子春秋·外篇上·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為其民，是故尚之。」

〈晏子春秋·外篇上·十〉：

景公坐于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為圻矣。」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為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蟹，不加于海；民財為之歸。今歲凶饑，蒿種芼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前 516 年）三十二。彗星見。晏子曰：「田氏有德於齊，可畏。」

晏子對叔向說：「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此事根據〈左傳·昭公三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發生於魯昭公三年當前 539 年，其時在位的田氏宗主是田桓子田無宇。

晏子對齊景公所說：「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其田氏乎，田無宇為圻矣。」這兩次對話都著眼於田無宇，這與晏子的死期是相合的。因為根據本書考證「晏子的死期可以壓縮到前 494 年至前 491 年四月之前。」，考證請見〈晏子〉一節。

〈史記·秦本紀〉：

悼公二年，齊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是為悼公。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齊晏孺子元年田乞詐立陽生，殺孺子。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

〈史記·齊太公世家〉：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及使乞救而輸之粟。

〈左傳·定公十四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左傳·哀公元年〉：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根據〈史記·齊太公世家〉，則齊景公五十五年當前 493 年，魯定公十四年當前 496 年，魯哀公元年當前 494 年。舉此可知田乞謀救范、中行氏當在前 494 年至前 493 年。則田乞已經繼承了其兄田武子田開之位，而兩人的父親正是田無宇。而田成子在前 485 年繼位。從以上所引眾多資料可知，戰國時期至

漢朝所有大學者都認為取得齊國的是田成子、實際取得的是田和，而從未有人說是田無宇的。因此可見《晏子春秋》的記載完全符合當時的時勢，而這一點甚至今日的眾多學者尚且「弄不清楚」，不知道《晏子春秋》如何作假？因此那些隨意指摘就說這本書為偽書的疑古派只不過再次展現了自己的無知罷了！

孔子對晏子說：「**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也仍然是以「田氏」為說，這一點也是與晏子、楊朱的「用詞」是一致的。孔子、晏子「預測」說齊國恐怕會被「田氏」取得，用的是「泛稱」。其原因很簡單，無非是兩人本無法看到是田氏的哪一位宗主取得了齊國。因此用泛稱「田氏」。晏子在魯昭公三年（前 539 年）還有一個委婉的說法：「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姜氏即姜太公後代，嬀氏即舜的後代，指的就是田氏。而楊朱既然能說：「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那就表示楊朱已經看到了田成子取齊國的事實了。只是楊朱也沒有指名道姓的說是田成子（死後始有此號）或田常（人皆有名，生前可知。），如〈列子·力命〉中列子借虛擬的「命」之口說：「季札无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唯一合理的解釋無非是為了怕得罪這些掌權的人吧！至於「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說的也不過是自田成子取得齊國之後，子孫都享有齊國，那表示楊朱至少活到了田成子死後，或者這也不過是楊朱的一種誇飾之詞，如〈列子·楊朱〉：「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孔子有無「萬世之名」在當時也是一種誇飾法。但楊朱並不如戰國時代的莊子、鬼谷子般指明田氏經過了「十二代」才終於「滅齊」，或者如呂不韋般指明姜氏齊國走到第二十四終於滅亡的事實，其原因無非是因為楊朱說此話時，田氏十二代、姜氏二十四代與田和滅齊的事實尚未發生罷了！從這裡就不難看出楊朱在談論此事時，是確實與戰國至漢朝的諸位學者的差異！而這正是楊朱身為春秋末年人的證據之一。

從楊朱：「**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可以推出楊朱說此話的時間上限為田成子殺齊簡公之後，也即前 481 年之後。而這一點也與揚朱見梁王的時間是相符合的。而由於楊朱並不知道田氏滅齊的事情，因此前 391 年可以定為楊朱的年壽下限。此年，田和廢掉齊康公，自立為君。直到前 379 年，齊康公死後，姜太公的香火才正式斷絕了！

根據《晏子春秋》記載，則「大斗出、小斗入」的作法始於田無宇而非田乞，司馬遷誤！

五、「田成子」具有「典範性」。「典範性」的出現正來自於其獨特性與重要性，而典範性的成立絕大多數正代表了世人對此典範具有了共識。除了共識之外，如果典範不具唯一性，那麼不同典範之間的比對，也有助於我們對這一類典範特質的認識。取齊國的是田成子而非其他人，是表現了從春秋末年至漢朝時期學者的共同認知。除以上所引相關資料外，其餘相關資料如下：

〈左傳·哀公十四年〉：

甲午，齊陳恆弑其君王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史記·六國年表〉：

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

〈史記·齊太公世家〉：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驚，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史記·魯周公世家〉：

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

〈列子·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荀子·堯問〉：

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強。為惡得福，善者有殃。

〈韓非子·二柄〉：

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

〈韓非子·難二〉：

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

〈韓非子·人主〉：

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

田恆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於期。子罕為出處，田恆為圃池，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韓非子·說疑〉：

若夫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

齊君被殺如此之多，但孔子卻在田常殺齊簡公時才請求魯哀公去討伐他，為什麼？顯然，只能說這是明目張膽的殺，證據確鑿的殺！如果還要講究一個私人因素的話，那或許是孔子弟子宰我死於此事件之中。〈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蕢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不管如何，田成子（田常、田恆）殺齊簡公一件事發生之後便被當成了「典範事件」。其中除了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的以田和為「滅齊」的代表之外，所有目前可見的實例都說「取齊」的是田成子。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莊子·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即如〈胠篋〉篇說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成子到齊亡時，僅得十二世〔胡適自註：此依《竹書紀年》。若依《史記》，則但有十世耳。〕。可見此篇絕不是莊子自己做的。」關於這個田成子十二世而有齊國的歷史記載，千古以來，誤讀的不僅胡適一人。從以上的徵引與分析可知，鬼谷子、莊子「十二世有齊國」明明說的是自田成子的祖先陳完開始算起十二代，田氏終於完全取得齊國政權的事情，而姜氏政權的最後一位接班人齊康公也於田氏第十二代接班人時死亡

（接班人不一定是父子關係）。之所以用田成子做代表，乃在於田成子是真正掌控了齊國政權的田氏掌舵者。田乞殺齊晏孺子（齊晏孺子其父齊景公，齊晏孺子根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是被鮑牧所殺。此時田乞地位尚未穩固，仍需借助鮑牧的力量。），田成子（田乞之子）殺齊悼公（被大夫鮑息所殺）、齊簡公（被田成子所殺），已經不再需要假手他人了。

這些便是莊子、鬼谷子等以田成子立說的原因。但從唐朝司馬貞〈索隱〉註解〈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誤讀開始，一直到胡適都在誤讀。而乃以為是齊太公開始到齊國滅亡共十二代，於是乃以為《莊子》此篇並《鬼谷子》都出於齊國滅亡之後。這種無知誤讀簡直可笑到家！是連基本的文言文都讀不通的表現。

楊朱得見老聃且楊朱之友季梁先楊朱而死，如此，則見魏王之季梁不得與楊朱同時可知。換句話說，這裡所面對的依然是一個「巧合式」的難題。

以季梁而論，他與「魏王」的交談，可以總結出幾種可能：

一、歷史上的季梁有多個，屬於同名同姓或同稱謂的常見例子。由於季梁本身確實「已經」存在至少兩個的例子，因此其為同名同姓或同稱謂者的概率較高。

二、魏王可以指魏國的稱王者中的任一個，魏國稱王起於魏惠王，魏惠王以下都可以稱為魏王。雖然以攻打「邯鄲」這件事而論，可以說魏王就是魏惠王。而魏惠王又可以稱為「梁王」。一般戰國時代所稱梁王幾乎都是指魏惠王。

因此，由於楊朱見了「梁王」，而楊朱與季梁為友且季梁先楊朱而死，而季梁也見了「魏王」，魏王又可稱為「梁王」，若是「魏惠王」則又可稱為「梁惠王」。由於這種種巧合，因此歷來對於楊朱的時代不能釐清。

表格 1 關於楊朱事蹟的歧異解法

相關人物	春秋解	戰國解	結論
老聃	老聃為春秋末年人，前 511 年教導孔子禮儀等相關知識。楊朱有與老聃交談的記錄。其時間點在前 510 年十二月之後，老聃前往秦國之前。	老聃曾經被疑古派用毫無邏輯水平與常識的手法，藉由人海戰術硬生生取消人格權，並把所謂老子拗成戰國周太史。於是繼續不顧常識的用楊	老聃是春秋末年人已經本書考證定案。楊朱依賴於老聃的生存期限，而老聃不依賴於楊朱是否為春秋時人。而這

相關人物	春秋解	戰國解	結論
		朱與老聃對談，而將老聃劃歸為戰國時人。	一條，可以說是最證據確鑿的一條。
禽子	禽子為墨翟弟子。而墨翟據本書考證，他主要都是與春秋時人交談，並活到戰國初期。	一般將墨子、禽子當成戰國時人。因此認為楊朱能跟一個戰國時人的弟子交談，自然是戰國時人。	楊朱能批評墨翟，並與禽子交談。吳起死於前 381 年。此時墨子、禽子都非鉅子。按墨子年代，則墨子當已死了。
端木叔	楊朱能知道「子貢之世父（伯父）」死的事實，據推測其時間點約在前 480 年。子夏弟子段干木也就端木叔死去一事發表過評論。而段干木見子貢的伯父六十歲死的可能性遠遠大於見子貢的孫子六十歲死的可能性。	楊朱能知道「子貢之世（孫）」死，據推測其時間點約在前 400 年。	根據端木叔是衛國人，「子貢之世父」的異文的存 在、「子貢之世父」遠較「子貢之世」為更合理、段干木能對此事發表評論等證據。可知此處當作「子貢之世父」。
梁王	梁王、梁君都曾經與孔子、范蠡、陳子交談，梁王為春秋末年的梁國國君。楊朱有與梁王交談的記錄。其時間點約在前 480 年左右。	梁王為戰國時代梁惠王，也即魏惠王。魏惠王要能稱為梁王有三個條件，一是魏滅梁，二魏遷都大梁，三是魏惠王稱王。魏惠王遷都大梁在前 361 年，其稱王在前 334 年。	陳子與梁王的交談也面臨了歧異解釋，但因其提到「今孔子」，故可判定也是春秋末年之事實。戰國梁王稱王時間太晚，其時莊子、孟子早都已經描述楊朱的成名與龐大的影響力。如此便與梁王見楊朱時的狀況不符。

相關人物	春秋解	戰國解	結論
季梁	一、「季梁」是「李梁」的錯誤，李梁是春秋末年人，楊朱的朋友。比楊朱早死。 二、季梁是春秋末年人，楊朱的朋友。比楊朱早死。	季梁與魏惠王有過交談，其交談時是勸諫魏惠王不要攻打邯鄲。其時間是前 353 年之前。此季梁是戰國時人。	東周時代本有多個季梁。春秋二個，戰國一個。扣除楊朱的朋友，春秋還有一個季梁。東周時代名人同名同姓者多，如曾子、毛遂都是例子。不足據。
田氏	楊朱知道了田氏擁有齊國的事情，此事春秋末年以來的知識分子的共識都是田成子所為。其時間點落在前 481 年之後。	滅齊的是田和，前 391 年田和廢掉齊康公，自立為君。直到前 379 年，齊康公死後，姜太公的香火才正式斷絕了！	楊朱以「田氏」為說，符合當時孔子、晏子的說法，卻與戰國時代莊子、鬼谷子、呂不韋明確指出田氏十二代、姜氏二十四代不同。且春秋末年，田成子取齊國以來，取齊國的是田成子而非田和更是眾大學者的共識。田和只是撿現成的滅齊者。

楊朱為春秋末年人的證據，列如下：

楊朱與老聃有過對話，老聃為春秋末年人。孔子見老聃在前 511 年。

楊朱與禽子有過對話，而禽子既是墨子的弟子，又是子夏之輩的弟子，而子夏是孔子的弟子。禽子能見到子貢的伯父六十歲後死，則其時間當在前 480 年（假設子貢伯父大子貢二十歲）至前 500 年（假設子貢伯父大子貢四十歲）之間可能性最大。而墨子主要交談與接觸的人物都是春秋末年人，同時墨子接觸過的楚王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楚惠王，而楚惠王也是春秋末年開始繼位的。

〈列子·楊朱〉：「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楊朱所談論的人主要都是春秋時人，如孔子、柳下惠等，子貢、原憲是最後出的兩個，其中子貢生於前 520 年、原憲生於前 515 年。兩人的活躍時間與見老聃、梁王、墨子弟子禽子的時間都相近。子貢有字在前 501 年，原憲有字在前 496 年。楊朱稱原憲不稱其字的兩種可能是：一原憲還未滿二十歲，但這不可能。主因在於如果原憲尚未滿，他的事蹟恐怕很難跟子貢相提並論，而且去把一個未滿二十歲的拿來跟成功人士相提並論，豈非笑話，遑論兩人相差不過五歲罷了。原憲被拿來跟子貢相提並論，根據史料是在孔子死後。因此楊朱不稱原憲的字當與原憲、孔伋都字子思有關。如此，楊朱此評論的發生當在孔伋有字之後，而其時孔子確實已經死了！據本書〈子思〉一節考證，則子思有字約當前 480 年左右。

〈禮記·檀弓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

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據以上引文可知，則原憲活到五十之後！當前 466 年之後！如此楊朱稱原憲而不稱仲憲，則此事發生於前 466 年之前為其中一種可能！

楊朱能知田氏為齊相、有齊國，至少是在前 481 年之後的事情。而這一點與子貢的伯父的推論死亡日期吻合。也與楊朱稱原憲不稱子思的可能時間點有交集。

楊朱與梁王有過對話，而梁王又與陳子有過對話，陳子、梁王所說的內容都符合此梁王為春秋末年之梁王而非戰國時代之梁王的特徵。梁王又與陶朱公有過對談，陶朱公即是范蠡，范蠡所隱居的陶，與楊朱「南之沛」的「沛」都屬於宋國領土，且地點接近梁。梁君又與孔子有過對話。孔子死於前 479 年，陳國滅於前 478 年，范蠡稱為陶朱公在前 473 年以後。楊朱、孔子都是老聃弟子，范蠡則引用過老聃的許多文字。因此圍繞在「梁君、梁王」所發生的這四件事情，其時代都極為相近。且與老聃、子夏的時代相近。而楊朱所稱原憲也是宋國人。

其實從梁君見孔子、楊朱、范蠡、陳子一事，對梁君而言這能證明他具有一個固定的行為模式，同時是一個賢君。正是因為梁君有賢君的特質，因此諸如孔子、楊朱、范蠡這些智者才會前往梁國與梁君面談！

綜合以上資料，其交集非常明顯，楊朱留下的可考時間的話語與事件，主要都集中在前 481 年至前 470 年之間。具有高度的吻合度。

接著我們反向來看問題，也即如果楊朱是戰國時人，那會產生多少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必然是，梁王見楊朱時的輕蔑態度與孟子稱楊朱的學說已經大盛於天下的狀況不能契合。

〈孟子·滕文公下〉：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這句話也還有兩種以上的解釋，譬如公明儀的話如果包含了「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那麼這就是公明儀的話，只是被孟子引用了。

〈禮記·檀弓上〉：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禮記·祭義〉：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為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顙，頽乎其順也；啟顙而後拜，頽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則公明儀是孔子時人（據清人宋翔鳳：「孟子：公明儀、公明高，曾子弟子，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孔子死前已經存在。如果這句話其實是公明儀所說而不是孟子所說，那麼楊朱、墨翟的時代問題便就此論定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梁王是梁惠王，而已知楊朱比季梁晚死。且季梁勸諫魏惠王不要攻打趙國邯鄲，其時間是前 353 年之前。如此則楊朱必然活到前 353 年之後，這將導致吳起死時（吳起死於前 381 年）墨家鉅子並非墨子或弟子禽滑釐一事與楊朱可與禽滑釐爭論一事產生嚴重矛盾。因為沒有人能知道這兩個人什麼時候產生爭論，誰先死、誰後死！且魏惠王在位期間為前 369 年至前 319 年，則楊朱要能見魏惠王必然得等到前 369 年之後。

〈孟子·梁惠王上〉：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見梁惠王時，梁惠王提到幾大歷史事件：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為馬陵之戰，結束於前 340 年。相關考證可參考拙作〈孫臏考·馬陵之戰〉，相關史料見於：

〈史記·魏世家〉：

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

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史記·秦本紀〉：

（秦孝公）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發生於秦孝公十一年（前 351 年）年前諸事件總和。

〈史記·秦本紀〉：

（秦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秦孝公）七年（前 355 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

「南辱於楚」：發生於楚懷王六年（前 323 年）。

〈史記·楚世家〉：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魏惠王死於前 319 年。換句話說，孟子見梁惠王只能介於前 323 年至前 319 年之間。這與孟子能見其子梁襄王並與齊宣王有過交談記錄等事情是吻合的。如此一來，則孟子見梁惠王的時間甚至比莊子之友惠施進入魏國朝廷效命還要晚！也比莊子成名時間還晚許多！

當然，最重要的是如果楊朱是戰國時人，根據目前所有史料，則老聃僅有一位，是老子而非老聃的概念被刻意的混淆了。如此，戰國時代的楊朱自然見不到春秋末年就已經年邁的老聃了！

因此，從以上眾多客觀證據與推論可知，楊朱為春秋末年人，老聃的弟子，其友季梁與魏惠王時的季梁並非同一人。而楊朱所見梁王與孔子所見梁君，是同一個的可能性很高。即便不是同一個，也可以確定是梁國的君王！因此，可以確認楊朱主要活躍於春秋末年，與老聃、孔子、子貢、原憲、曾子、墨子、禽子、梁君等人都有交集。

爺爺與孫子不是同時人：列子公案

在這篇考證裡面，錢穆毫無意外的繼續使用「歸併」不同時代、時間的人的方法來製造混亂。因此，當有人想要指出錢穆的錯誤，你就得費很大的功夫。既要反駁本篇、本事，還要反駁他篇、他事。但說穿了，錢穆的考證絕大多數都是一大堆缺乏邏輯素養與史料支持、甚至常識的胡說八道與猜想！即使不厭其煩的指出荒謬錯誤，只要在外圍環境擋你幾下，讓你的論文不得刊登、書出不了。錢穆的考證還是可以繼續穩如泰山，繼續影響廣大群眾與學界。

所以這一篇考證列子的文章錢穆究竟又把多少人歸併到一起了呢？首先是「壺丘、狐丘」被歸併了，歸併以後就扯孫叔敖時候的狐丘丈人（楚莊王時）怎麼可能跟列子（鄭國子產時）交談？成為其師傅呢？（是啊！怎麼可能呢？所以「壺丘、狐丘」怎麼可能歸併呢！）這種做法不只是錢穆用，其他疑古派也用，只是錢穆用的特別多！本來不相干的人，他就隨意給你扯在一起，然後再用扯在一起的結果來質疑原始史料的正確性！至於扯在一起的原因，多數都是文字上（如華、華子、子華子；詹子、詹何）甚至讀音上（如壺丘、狐丘）有相近的地方，就硬生生被說成是同一件事情！多數這樣瞎搞之後，在取消了一件史實的同時，虛構與瞎掰出了另外一件不存在的事情！然後要大家去接受這些荒誕的事情！而學界也很配合的奉行了數十年！

除此外，錢穆更在這一篇充分把自己缺乏常識認知的缺陷暴露出來。譬如他認為一個師傅收了兩個徒弟，不能說這兩個徒弟是同時人，並舉出孔子與他的孫子子思來當案例，說難道能把孔子跟子思說成是同時人嗎？一個師傅收了兩個徒弟僅僅在前一個徒弟死去而後一個徒弟尚未出生時，才不能說兩個徒弟是同時人；一個爺爺僅僅在孫子出生前死去，才不能說這個爺爺與孫子是同時人。結果錢穆這位受人景仰的國學大師直接否定了本來根據特定條件才不能成立的事件的可能性。而不是指出這兩件推論在一般情況下都能成立，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不能成立的事實。更有甚者，錢穆指出班固說列子「先莊子，莊子稱之。」是指班固說「僅據莊子稱之，而云在莊子先，亦不以為在春秋時。」錢穆的問題很嚴重！不僅僅是看不懂文言的問題，而是連基本的邏輯推理都沒有了！班固說列子在莊子之前，莊子曾經提到他，是一個模糊的說法，也是一個模糊的說法。因為按照列子的事蹟，說他是春秋末年人也對、說他是戰國初年人也對，班固因此說列子在莊子之前而不是指明這個跨時代的人是哪一個時代的人！結果本來在莊子之前就包含了「戰國初年、春秋末年」等戰國中期（莊子時）以前的選項。但錢穆居然把這種常識認知解釋成班固「亦不以為在

春秋時」！老實說，當讀者很有耐心的讀完我對錢穆文章的分析，讀者就能發現：錢穆一來缺乏常識、二來沒有基本邏輯水平、三來欠缺歷史知識、四來讀不太懂文言！

所以要考證這一篇，得花很多時間，去指出一些本來就沒有邏輯推理效力的東西的其他顯而易見的弊病。因為錢穆不只搞列子，搞南郭子綦，搞魏牟，又搞了「壺丘、狐丘」一把，所以即使知道錢穆這種東西幾乎就是瞎掰胡扯！還是得耐著性子一個一個指出其荒謬之處！

如果讀者覺得看得很痛苦，我可理解，因為寫得更痛苦。但面對一大堆毫無邏輯效力的瞎掰鬼扯，卻又有著龐大影響力的「謬論」！用白話條分縷析的指出其弊端、盲點是一個讓一般讀者都能讀懂的唯一一條路。而且這種批評也一定不能客氣！一但客氣了，又會被這些人的粉絲，尤其疑古派本身當成了問題沒有完全解決的跡象！

先秦諸子繫年

〈先秦諸子繫年·五九、列禦寇考〔附南郭子綦〕〉：

〈莊子·讓王篇〉：「子列子窮，客言之鄭子陽，子陽令官遺之粟，列子辭。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之事，見〈呂覽·適威〉《首時》，又見〈淮南·汜論〉。云：「子陽好嚴，舍人有過而折弓者，畏罪恐誅，則因獬廌之驚，而弑子陽。」高《注》均云：「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而〈史記·鄭世家〉則云：「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楚世家》亦云：「悼王四年，伐鄭，〔本作周〕，字誤。）〔鄭殺子陽。〕《年表》同。故《志疑》謂：「鄭殺子陽，以說於楚。」〕二十七年，子陽之道共弑繻公。」與《呂覽》《淮南》異。據《史記》則列子乃周安王時人也。今《列子》書有劉向《敘錄》，以列子為鄭穆公時。柳宗元《辨列子》謂：「鄭殺子陽，當魯穆公十年，〔按實魯繆公十八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然今《列子》書既出後人綴拾〔如其書中言魏牟，孔穿，鄒衍，皆出列子後。〕（朔雪寒註：魏牟的荒誕可參考中山公子牟的考證，孔穿只是同名同姓者。至於鄒衍的例子，請參考下面給出的解釋。除此外，僅宋康王超出列子的時代，可以確定是後人摻入的文字，起因可能是竹簡編排散亂導致。然而即使有戰國後期的宋康王、鄒衍，甚或把孔穿、魏牟當成戰國後期的那些同名同姓者，《列子》一書所述的内容也沒有超出戰國時代。結果仍然被莫名其妙的直接打成魏晉南北朝的偽書！拿戰國時代的證據去打成魏晉南北朝的偽書！這腦洞確實不是常人可以想像出來的！）向《敘》不在《七略》《別錄》，後人

自得偽為，無足深論。高氏《子略》謂：「太史公不傳列子，莊週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濛列缺者歟？」然考《韓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有鵲至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曰：鵲。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此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則禦寇實有其人。鄭為韓滅，而韓徙於鄭。史疾在韓，習聞其說。蓋亦上承儒家正名之緒，一變而開道法刑名之端者。《爾雅疏》引〈尸子·廣澤〉云：「列子貴虛。」蓋其道因名責實，無為而治，如史疾所言是也。《漢志》道家《列子》八篇，晉有張湛《注》，後人多辨其偽。然時亦有先秦遺言，要在擇慎而取耳。（朔雪寒註：公孫鞅幕僚尸佼、稍後的史疾都指出列子思想上的特徵，或者表明自己正在學習列子的言論。如果沒有《列子》，要如何知道列子的思想？如何學習其言論？口耳相傳？明明可以寫下來的東西卻硬要搞成口耳相傳？但疑古派似乎從來不會放棄將他們缺乏常識的一面展露給大眾的機會！而且縱使今本《列子》有後人添加的「宋康王（一整段）、鄒衍（單句）」，這些仍然沒有溢出戰國範圍！但疑古派就直接用一些「主觀偏見」把書判定為假書，尤其馬敘倫《列子偽書考》更是將所有對列子有利的證據全部抹殺！「直接說」那些都是偽造者抄的，而不是去考證究竟是誰抄誰的？而不是去討論為什麼偽造者要抄這些東西？他根據什麼來抄？根據什麼標準來湊這本書？然後這群疑古派就把這種直接抹殺的「方法」叫做考證！錢穆為了使用《列子》，加以曲解以去抹殺其他古人、古書、古事，因此在這裡特別強調「然時亦有先秦遺言，要在擇慎而取耳。」不然難以解釋自己利用這本書資料的做法。但試問，不是說這是一本偽書嗎？想用的部分就說它不偽，想要把列子打成假人、把《列子》打成偽書就又說這本書是假的，不可信。或者直接說裡面都是寓言，不可信！只有在他需要所謂的偽書的資料來佐證自己其他猜想時，這些偽書的這部分文字才會突然可信了！這又跟馮友蘭寫哲學史講到老子時的做法一致。既要把你打成假的，又要靠你吃飯，於是只好自己用到的就說是真的，沒用到的就說是假的。話都給疑古派說了，好處與名聲也都給疑古派佔盡了！留下的只有被打得七零八落、乏人問津的古籍！以及疑古派建構的虛假的歷史！疑古派人數眾多，都是台面上的人物，難怪影響力持續至今。）

近人馬敘倫《莊子義證》，據《德充符》子產師伯昏無人，而《田子方》篇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又〈呂氏春秋·下賢〉，子產見壺邱子林，高誘

《注》：「子產壺邱子弟子」，而《應帝王》稱列子歸告壺子，司馬彪曰：「壺子名林，列子師。」**證列子與子產同時**。又據〈史記·老子傳〉關令尹喜強老子著書，〈漢書·藝文志〉道家《關尹子》，班《注》：「名喜，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呂氏·審己〉高《注》：「關尹喜師老子。」而《達生篇》子列子問關尹子，〈呂氏·審己〉子列子請於關尹子。**推證列子與老子、關尹子同時，亦正與子產同時**。謂：「《讓王篇》所謂子陽，疑當為子駟，亦子產時。傳其事者以子駟、駟子陽並為鄭相，又並不得其死，相涉而誤。」今考〈漢書·古今人表〉，列子在韓景侯、魏武侯間，亦自以列子在戰國，不在春秋也。《藝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列《莊子》後。班《注》：「名圉寇，先莊子，莊子稱之。」僅據莊子稱之，而云在莊子先，亦不以為在春秋時。春秋主政不稱相。（朔雪寒註：這是完全的睜眼說瞎話了！春秋主政，晏子稱齊國之相、孔子稱攝魯國之相，〈尹文子·大道下〉：「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史記·吳太伯世家〉：「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史記·管晏列傳〉：「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凡此類記載多如牛毛，而疑古派如錢穆等「歷史大師」卻都主張「春秋主政不稱相」。然後突然到了戰國大家都稱相了？這些錯誤偏見的來源大抵都是受到前人的誤導。《孫子兵法論正》已用實例舉出當時稱相之普遍。這種謬論可以終止了！而且說列子在莊子之先，從邏輯上來說，並不否認列子可以生活在春秋時代的可能！可是這裡錢穆卻明顯缺乏應有的邏輯思維能力，居然稱「僅據莊子稱之，而云在莊子先，亦不以為在春秋時。」本來沒有否認的東西，到了錢穆手上卻變成否認了！從這裡不難看出錢穆的邏輯思維水平真的是非常低下的！而且春秋戰國只是後人劃分出的年代界線，很多人其實是從春秋活到了戰國的，如孔子弟子子夏、公孫龍都是如此！這本是常識範疇的東西，在錢穆身上卻讓人難以看到！以至於他不能容許一個春秋時人的關尹子的弟子可以生活在春秋時代，而必須只能生活在戰國時代。於是乾脆連關尹子的真實性也給取消了！）且子駟見殺，子產已為政，亦不得稱相子駟。以國相遺窮士粟，其事正當在戰國。子產時猶無有也。（朔雪寒註：這種說法也是不學無術的說法。〈說苑·復恩〉：「北郭騶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左傳·昭公十年〉：「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孔子家語·致思〉：「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

之粟五秉。」相關的事例很多，錢穆等人不學無術，張口即來，誤導眾人，影響惡劣！）所謂壺邱子林，伯昏無人，縱非鴻濛列缺之類，然《韓詩外傳》七記狐丘丈人與孫叔敖問答，狐丘即壺丘也。〔參讀《考辨》第七二。〕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壺丘及見孫叔敖，豈又為子產師？（朔雪寒註：錢穆先胡扯壺丘就是狐丘，然後再扯因為狐丘是孫叔敖時人。並以自己的胡說八道當成證據，來質疑真實歷史的真實性。類似這種幾近瘋狂的所謂胡扯考證，充斥全書！關於錢穆狐丘的所謂考證牽涉到老子公案那篇，一併留待該篇檢討與反駁。）此等已難確定。伯昏無人尤渺茫，特以子產乃鄭之閭人，而列子亦鄭籍，故言兩人事多牽混。（朔雪寒註：列子、子產這次可是連名字、身分地位都相差甚遠了！國氏，名僑，字子產；列氏，名禦寇，被稱為列子、子列子。子產是鄭國宰相，受孔子稱讚，留下一大堆可考的事蹟；列子窮到快沒飯吃又到了四十幾歲以後還沒有多大的名氣，需要靠鄭國戰國初年時的宰相來接濟。兩人的事蹟都很明確，而且差了這麼多！但錢穆還是張口就來，僅僅因為兩人是同一國的名人，就能隨意說兩人的事蹟會被當時人搞混！常識何在？這究竟是什麼考證？哪裡考證了什麼？）此如諸書言孔子師老萊子，又稱子思師老萊子，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朔雪寒註：所以孔子與子思不是同時人？同時人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出生時孔子也還沒死，能不能同時人嗎？這是什麼缺乏常識的疑問？）先秦書如此類者甚眾，馬氏據不可據以疑可據，何耶？老子、關尹，其不可據，與壺丘、伯昏亦同。〔參讀《考辨》第七二。〕否則楊朱師老聃，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竊意列禦寇，仍當列戰國為允。（朔雪寒註：孔子與弟子年齡相差有四歲的如秦商、九歲的如子路；也有少孔子四十六歲的樊須、五十歲的冉孺、五十三歲的公孫龍，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這些人都與孔子同時，毫無疑義，只是交集時間多寡的問題而已。但如果以弟子身分想要釐清生卒年、活躍時間，也僅能得出大概。可以得出大概，而不是不能得出大概。按照錢穆的主張，「孔子師老萊子，又稱子思師老萊子，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楊朱師老聃，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有這種疑問，足見錢穆確實欠缺常識！比較精確的說法，因為不能知道楊朱的真實年齡，不能知道老聃收徒的時間，因此也就不能篤定的說楊朱與子產同時。但毫無疑問，根據老師的年齡，這個答案既沒有絕對的不是，也沒有絕對的是。楊朱的答案還要根據楊朱所交談的所有能考證出時間的人才能更加確定！無法單單用老聃就能得出必然性的結論，除非老聃死於子產之前。因此這個常識判斷其實牽涉到很多考量，但明顯錢穆是沒有相關認知的！而且當我們不知道秦商的死期時，我們根據他與公孫龍都是

孔子弟子而稱兩人應是同時人，這有什麼問題嗎？甚至這種說法遠遠比錢穆所調的考證還要靠譜上千倍。而且楊朱與墨子弟子禽滑釐有過交談，將楊朱所交談過的人的時間畫出一個相對可信的交集區間是能辦到的。依照目前的資料，則我們不能確認楊朱必然不能與子產同時！畢竟即使楊朱與老聃跟公孫龍與孔子一樣都存在巨大的年齡差距，由於不知道老聃的確切生年與收楊朱為徒的時間，也就不能斷定楊朱必然不能與子產同時！錢穆批評「馬氏據不可據以疑可據，何耶？」可笑的是疑古派尤其錢穆最常幹的就是「據不可據以疑可據」，可是這些人卻視為理所當然！那些有正史、多種子書記載的人物，譬如老聃、關尹子、子華子，錢穆隨隨便便就能拿什麼名字有一個字相關甚至不是相同，或者兩人是同一國名人所以兩人事蹟相混，這樣的違背一般常識與毫無邏輯效力的說法就把可信的人物與事蹟給消滅了！而他的理由是如此荒誕可笑！結果批評別人，卻忘了照照鏡子！也是挺可悲的！)

又按〈莊子·齊物論〉稱南郭子綦，其人蓋亦道家先宗也。《徐無鬼》：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遊入見，子綦告之曰：「吾常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矣，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南伯子綦即南郭子綦也。則子綦乃齊人而當田太公時。田和之尊禮子綦，蓋亦如魏侯師田子方，友段干木，以大夫僭國，乃敬文學高士，以收譽而籠眾望。子綦正與列禦寇略同時。〔今〈列子·仲尼篇〉，有子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云云，南郭子即子綦也。〕乃後世言道家，率言莊、列，子綦之名，若淪若晦，若真與鴻濛列缺為伍矣。爰特表之於此焉。又按《大宗師》南伯子綦，《釋文》引李云：「綦當為綦，聲之誤也。」《莊》書三稱子綦，皆涉忘我之學，固知亦有所受，非虛矣。（朔雪寒註：說「綦、綦」是「聲之誤」，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而且「南伯」氏就不准有其他子嗣了嗎？可是饒是這樣一個沒有根據的說法，錢穆隨便引用了誰說，也就居然就把「南伯子綦」當成「南伯子綦」了！那我們是不是也能隨便說「布、朱」形近而誤，所以楊朱等於楊布，所以楊朱跟楊布之交談其實是精神分裂者在跟自己交談？錢穆這種隨意的把姓名中甚至只要有任何一點可以扯上關係的東西都當成兩人是一人的證據，根本毫不考慮其間的邏輯、證據問題，直白的說就是一種瘋狂而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的作法！至於「南郭子綦」就是「南伯子綦」，那是因為描述兩人時都牽涉到他們與「顏成子」的交談，且對話內容基本一致！所以可以判定為一人。可是「南伯子綦」與「南伯子綦」之間就缺少了其他關連了！如果按照錢穆這種荒誕的做法，凡是同姓氏的都能歸併在一起，那麼有多少人要從歷史消失？但看完整本《先秦諸子繫年》，大家就能明顯發現，錢穆已經把這種荒誕的手法玩上癮

了！更扯的是，居然還能斬獲一大堆出自台大與中研院的學者的粉絲！不可思議啊！）

又顏成子游，陸德明《音義》引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諡成，字子遊。《齊物論》成《疏》，謂子綦乃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誤妄不足信。（朔雪寒註：顏偃，字子遊。怎麼錢穆不把這個人與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游、遊，通假。）歸併在一起呢？因為沒有意義啊！因為如果這樣做，加上言偃的時間又能確定在春秋末年，那麼這樣的做法就會把「南郭子綦」的年代往上拉了！這是疑古派最不願做的事情！）

小結

所以到底這一篇錢穆在講什麼？做出了什麼成果？

首先錢穆重述了疑古派認為《列子》是魏晉南北朝偽書的虛假結論。重申老聃、關尹子的事情不可信！至於劉向弄錯年代，他就直接說因為《列子》是偽書，所以也不值得深入討論！

最後又扯一些基本常識問題，錢穆以為把一個老師的兩個徒弟當成同時人根本不合理，說錢穆潛在想說這是違背常識的或者荒誕的，也可以！可是究竟誰才不合理？誰才荒誕？一個老師的兩個徒弟，除非第一個徒弟死了之前另外一個徒弟還沒有誕生，否則說兩人是同時人有什麼問題？為什麼錢穆居然缺乏這種常人都有的基本常識判斷？卻能被持續吹捧數十年而成為所謂的國學大師？

根據記載列子的所有子書的信息，列子的老師有關尹子、壺丘子，這符合當時拜師多門的現象，如孔子就向很多老師學習。墨子弟子禽滑釐也曾經向儒家子夏之輩學習。而關尹子、壺丘子是春秋末年人（主要活躍時間），於是錢穆為了不讓列子成為春秋時人，就開始針對這一點展開攻擊。首先取消老聃、關尹子的真實性，因此也就不需要考證了！反正是假的。接著又扯壺丘其實是楚莊王時跟孫叔敖交談的狐丘丈人，然後說孫叔敖時的人怎麼跟列子交談？可見是假的！這就很妙了！如果按照錢穆自己的邏輯：「孔子師老萊子，又稱子思師老萊子，豈得證孔子、子思同時？」、「楊朱師老聃，亦得謂楊朱與子產同時耶？」那麼為什麼「壺丘」跟春秋末年的「子產」交談，卻居然「狐丘」又能跟楚莊王時的孫叔敖交談呢？狐丘丈人明明只跟孫叔敖交談，而壺丘也明明只跟子產、列子交談，怎麼卻說「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壺丘及見孫叔敖，豈又為子產師？」錢穆如果知道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

載」，那麼又怎麼可能得出「壺丘」就是「狐丘」這樣的可悲結論呢！錢穆真的基本的邏輯推理能力嗎？而且「子產、關尹子」 確確實實就是春秋末年人啊，可是錢穆首先把關尹子打成假的，因為子產很難打成假的，因此只能把子產的事蹟打成假的！再用這種結論來把列子打出春秋範圍！可是錢穆的常識似乎沒有告知他，人類不是按照年代劃分線來決定生死的！但根據全書的所有鬼扯蛋，可以確認錢穆真的沒有這種認知！

最後就是指出〈列子·仲尼〉提到「子列子與南郭子」的故事，因此指出跟列子交談的南郭子就是莊子提到的「南郭子綦」，證據、推論過程，全部沒有！僅僅因為人家姓「南郭」氏所以就說兩人是同一個人。更以此繼續發揮，然後說「南伯子葵」也是「南郭子綦」（因為「南郭子綦」曾寫作「南伯子綦」）。所以好多人又被歸併了！而其目的居然是一個違背常識的「偏見」，也就是錢穆認為一個戰國初年人不能、不應曾經生活在春秋末年！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列子·仲尼〉的相關文字：

〈列子·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

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

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无知為知亦知。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首先，為什麼被錢穆等疑古派認定為魏晉南北朝偽書的《列子》的這一段話又可信了？反正疑古派說可信的時候就可信，不可信的時候就不可信！就是如此隨意，就問你能怎樣？學界與相關出版資源多數都掌控在這一幫人的徒子徒孫之中，就問你能怎樣？你想怎樣？

那麼為什麼這一段話裡，明明是這樣說的「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這段連著「南郭子」的故事說的事情，而且兩個事件具有

因果關係。為什麼居然又不可信了！錢穆怎麼說：「所謂壺邱子林，伯昏無人，縱非鴻濛列缺之類，然《韓詩外傳》七記狐丘丈人與孫叔敖問答，狐丘即壺丘也。〔參讀《考辨》第七二。〕孫叔敖與子產年世相距五六十載，壺丘及見孫叔敖，豈又為子產師？此等已難確定。伯昏無人尤渺茫，特以子產乃鄭之聞人，而列子亦鄭籍，故言兩人事多牽混。」所以短短一段話，錢穆想用的時候就說可信，覺得對自己的謬論有害了就說不可信！這是什麼東西？

說穿了，錢穆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能讓關尹子的弟子曾經生活在春秋時代。因為如果這種事實被人認可了，還怎麼把關尹子的老師老聃的人格給消滅掉呢？怎麼貶低、摧毀道家學派呢？怎麼繼續捧孔子為至聖先師呢？

關於列子公案，多數文章已經發表在〈先秦諸子與老子·列子〉一篇的考證之中。但列子公案是一個可以跟老子公案的熱鬧程度相提並論的公案，涉案者有諸如錢鍾書、季羨林等令人「景仰」的大師在其中。牽涉到的文章文字數量破百萬字，不是一本專書不能盡數收納。目前實在欠缺時間把所有證據加以完整陳述，並把相關文章打包成書。因此在此僅先將〈先秦諸子與老子·列子〉一節的部分文字交代於此。至於全書可待日後整理成《《列子》公案徹底終結》，再行公佈！這裡主要針對主要謬論進行反駁！

其他關於列子的相關考證，可參考「中山公子牟」一篇。

道德經論正相關考證

〈道德經論正·先秦諸子與老子·列子〉：

列子，列禦寇，鄭國人。關尹子弟子。劉向《列子》新書目錄稱：「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賡，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漢成帝年號）三年八月壬寅上。」、〈漢書·藝文志〉：「《列子》八篇。〔班固註：名圉寇，先莊子，莊子稱**

之。〕」、〈呂氏春秋·觀世〉：「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一曰鄭君。〕。」其中東漢初年班固指出《列子》有八篇，東漢末年高誘仍指出《列子》有八篇，都與今本的篇數相合。

〈尸子·廣澤〉：「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莊子》有〈列御寇〉。尸子、莊子、商鞅、孫臏、尉繚、孟子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而一說「列子貴虛」，一專列〈列御寇〉。

〈戰國策·韓策二·史疾為韓使楚〉：「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史疾事件發生於前 301 年之後（見以下考證），韓國滅鄭在前 375 年，並且以新鄭為首都。史疾能「治列子圉寇之言」既有地緣因素，也證明了《列子》已流傳於世。沒有《列子》，如何「治列子圉寇之言」？以上這些都證明此時列子的著作已經流傳了！

列子，據劉向所說是「鄭穆公」時人。這如果不是字誤，或者被後人所改而非劉向所說，或者就是劉向所見已經如此。鄭穆公於前 627 年至前 606 年在位，列子當然不可能是鄭穆公時人。就文本非自然變動而言，稱列子為鄭穆公時人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為了把老聃年壽造假之事做到無縫銜接。老聃曾被指稱為是在周幽王二年（當前 780 年）因「地震」而預言「周將亡矣」的伯陽父，而老聃的弟子文子據班固所見或所推論，則又被稱為是與周平王對談之人。從而使班固困惑！周平王正是周幽王之子，於前 770 年至前 720 年在位。文子與關尹都是老聃弟子，因此以此推之，關尹的弟子便被說成是鄭穆公時人了！因此可知，這些都是後代為神話老聃與整個道家體系而製造的假信息！不足取信於人！更不需要把列子與其他「穆公」牽扯上，因為《列子》中早有記載列子與鄭國子陽的事蹟（〈列子·說符〉），列子為何時人在此已經揭露，不需多做猜想！就文本是自然變動而導致訛誤而言，陳廣忠已經指出〈莊子·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唐·成玄英疏：「姓列，名御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游行，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參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其中鄭國子陽正與鄭繻公同時。那麼「鄭穆公」自然是「鄭繻公」之誤，「穆、繻」古音近通假、「繻、繆」形近而誤。《列子》中本就記載列子與鄭國子陽同時，列子是何時人，早已是不言自明之事！

若以列禦寇在可見的史料中所接觸到的人而論，列子是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人，與墨子同時。這是以事考人，若以書考人，則明顯行不通。主因在於

《列子》中已經屢屢稱呼「列子」並記載「列子」與他人的互動事蹟了。可以

說這是與《晏子春秋》體例一致。既包含了列子個人的作品、列子引用他人的作品（譬如〈楊朱〉篇即可能取自楊朱的著作，劉向稱「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屬於合理之說！但莊子也大量引用了《列子》的文字，因此不足為奇！），也包含了列子弟子記載列子事蹟的部分！從這一點來說，雖然事蹟是弟子所記，實則仍需師父列子認可，仍可視為列子的著作。（朔雪寒註：上接中山公子牟一書考證所引列子考證。以下為針對《列子》被疑古派指稱為偽書的幾點核心文字的考證。其他部分證據實在太多，可參考《先秦諸子與老子》關於列子的考證，這裡就不再繁瑣引用了！）

〈呂氏春秋·審己〉：

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列子·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眾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列子·說符〉：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呂氏春秋·觀世〉：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

〔高誘註：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獬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呂氏春秋·首時〉：

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高誘註：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獬狗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眾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逐獬狗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況乎以人為唱乎？

〈呂氏春秋·適威〉：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高誘註：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狡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韓非子·說疑〉：

若夫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

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額、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眾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

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併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

……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淮南子·繆稱〉：

簡公以懦殺〔高誘註：簡公，齊君也。以柔懦，田成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

〈淮南子·汜論〉：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高誘註：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史記·楚世家〉：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

〈史記·鄭世家〉：

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集解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繻」。〕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

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集解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

〈史記·六國年表〉：

楚聲王當元年。魯穆公元年。（當前 407 年）……五。魏、韓、趙始列為諸侯。六。盜殺聲王。（當前 402 年）楚悼王類元年。二。三晉來伐我，至乘丘。三。歸榆關于鄭。四。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當前 398 年）

〈史記·六國年表〉：

鄭聲公卒。（當前 463 年）……

（韓烈侯）二。鄭殺其相駟子陽。（當前 398 年）三。（鄭人殺君）三月，盜殺韓相俠累。四。鄭相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五。鄭康公元年。……**韓哀侯**元年。分晉國。二。**滅鄭**。康公二十年滅，無後。（前 375 年）

〈史記·六國年表〉：

齊康公貸元年（前 404 年）。二。宋悼公元年。……十。宋休公元年。（前 395 年）。

〈呂氏春秋·慎勢〉：

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高誘註：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

〈史記·楚世家〉：

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集解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索隱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也。〕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

〈繫年·第二十二章〉：

楚聲桓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於任，宋悼公將會晉公，卒于鼫。韓虔（虎）、趙籍、魏【119】擊率師與越公翳伐齊，齊與越成，以建陽、[巨邑]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與齊侯貸、魯侯衍【120】盟于魯稷門之外。越公入饗於魯，魯侯御，齊侯參乘以入。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晉師大敗【121】齊師，齊師北，晉師逐之，入至汧水，齊人且有陳[鹿垆]子牛之禍，齊與晉成，齊侯【122】盟於晉軍。晉三子之大夫入齊，盟陳和與陳湜於湜門之外，曰：「毋修長城，毋伐廩【123】丘。」晉公獻齊俘馘於周王，遂以齊侯貸、魯侯犇（顯）、宋公田、衛侯虔、鄭伯駘朝【124】周王于周。【125】

〈繫年·第二十三章〉：

楚聲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鄭伯駘皆朝于楚。王率宋公以城榆關，是（寘）武陽。秦人【126】敗晉師於洛陰，以爲楚援。**聲王**即世，悼哲王即位。鄭人侵榆關，陽城桓定君率【127】榆關之師與上國之師以交（邀/徼）之，與之戰於桂陵，楚師無功。景之賈與舒子共止而死。明【128】歲，晉[貝重]余率晉師與鄭師以入王子定。**魯陽公**率師以交（邀）晉人，晉人還，不果入王子。明歲，【129】郎（梁？）莊平君率師侵鄭，鄭皇子、子馬、子池、子

封子率師以交（邀）楚人，楚人涉沔（汜？），將與之戰，鄭師逃【130】入於蔑。楚師圍之於蔑，盡逾（降）鄭師與其四將軍，以歸於郢。鄭太宰欣亦起禍於【131】鄭，鄭子陽用滅，無後於鄭。明歲，楚人歸鄭之四將軍與其萬民於鄭。晉人圍津、長陵，【132】克之。王命平夜武君率師侵晉，逾（降）郕，止[弁卩]公涉澗以歸，以復長陵之師。厭（？）年，韓【133】取、魏擊率師圍武陽，以復郕之師。魯陽公率師救武陽，與晉師戰於武陽之城【134】下，楚師大敗，魯陽公、平夜悼武君、陽城桓定君，三執珪之君與右尹昭之族死焉，楚人盡棄其【135】旃幕車兵，犬逸而還。陳人焉反而入王子定於陳。楚邦以多亡城。楚師將救武陽，【136】王命平夜悼武君李（使）人於齊陳湫求師。陳疾目率車千乘，以從楚師於武陽。甲戌，晉楚以【137】戰。丙子，齊師至岳，遂還。【138】

列子時死去的「鄭子陽」即「駟子陽」，究竟是宰相還是國君，高誘已經弄不清楚了！按照〈韓非子·說疑〉則「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不僅鄭子陽與周威公、陳靈公、楚靈王這些國君相提並論，更重要的是「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如果子陽不是國君，不是領導者，死後為何會「國分為三」？如果子陽是被鄭國國君所殺，則鄭國國君未死，怎麼可能導致「國分為三」的結果？且韓非又說：「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結合〈繫年·第二十三章〉記載楚聲桓王（楚聲王）立四年即前 398 年，「楚師圍之於蔑，盡逾（降）鄭師與其四將軍，以歸於郢。鄭太宰欣亦起禍於鄭，鄭子陽用滅，無後於鄭。」則是子陽被太宰欣所殺，是鄭國宰相欣趁著鄭國四將軍都被楚國俘虜的時候，利用子陽的舍人，憑藉著「獠狗之亂」而殺掉子陽。是「臣」太宰欣殺掉「君」子陽。如果以「駟、駟」而論，符合春秋見名知字的一般慣例，但如此就無法解釋「子陽」的由來！但如果是「殺其『君』駟、子陽」則上面各種說法都能得解，但司馬遷卻是說：「鄭殺其『相』駟子陽」。

根據〈繫年·第二十二章〉「楚聲桓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於任，宋悼公將會晉公，卒于鼫。」楚聲王元年當前 407 年，其隔年當前 406 年。根據〈繫年·第二十三章〉的說法則「楚聲桓王立四年，宋公田、鄭伯駘皆朝于楚。」楚聲王四年當前 404 年，但根據〈史記·六國年表〉則楚聲王死於前 402 年，宋休公田立於前 395 年。則《史記》對於宋悼公、宋休公的即位時間的記載明顯有誤。而且《史記》對於鄭世家「聲公」以後的記載都非常簡略，

甚至與鄭國本身無關，而其記子產之死在鄭聲公五年也是錯誤的，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根據〈逸周書·諡法解〉或〈獨斷·卷下·帝諡〉，都沒有所謂的

「繻」這個諡。因此「繻」必有誤！《集解》稱鄭君的名字叫做「駘繻」。如此，顯然這個君主根本無「諡」，「繻」也確實不是「諡」。韓非稱「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繫年·第二十三章〉稱「鄭太宰欣亦起禍於鄭，鄭子陽用滅，無後於鄭。」、〈史記·六國年表〉稱「韓哀侯元年。分晉國。二。滅鄭。康公二十年滅，無後。」、〈史記·鄭世家〉稱「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集解》註引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則鄭康公的名字一傳為「乙陽」。不管如何，顯然關於「子陽之死」到鄭國的滅亡，這裡的歷史依然有誤是可以肯定的。

這一來，如果以〈繫年·第二十三章〉為正確，則「子陽」即是「鄭伯駘繻」，是宰相欣趁鄭國公族勢力被楚國俘虜，有篡位或叛亂之心，於是發動叛亂弑殺子陽。因此韓非稱「太宰欣取鄭」表明弑君成功，因此接下來的鄭君就是太宰欣。而司馬遷楚悼王四年也是楚聲王四年之誤。如果以《史記》為正確，則〈繫年·第二十三章〉便誤「楚悼王」為「楚聲王」。若以年代而論，結合司馬遷誤植子產死期，且對於鄭聲公以後的鄭國事件已經幾乎不知，則〈繫年·第二十三章〉所載明顯更為可信。而依據〈史記·六國年表〉則韓烈侯二年鄭君子陽被殺、三年鄭人又殺其君篡位者太宰欣，四年所謂子陽之徒又殺其君駘（或者其他名字）。如此連續三年殺掉君主，頗符合墨子與魯陽文君所謂「鄭人三世殺其父」的說法。但以「魯陽文君」的年代來說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史記》對於楚王世系、鄭國世系的記載仍有誤。

「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則列子為關尹子的弟子，而關尹子為老聃的弟子。如此，則列子的輩份相當於子貢、子夏、曾子的輩份。但一如孔子與弟子的年齡差距有達到五十三歲的，老聃、關尹子、列子三輩如果都相差四五十歲，就可能拉長三代人的活躍時間。除了師徒之間的年齡差距以外，還會影響到活躍時間總長度的還有收徒時間，如果收徒在晚年，自然總體活躍時間會更長。譬如孔子收公孫龍其時間只能在孔子晚年，而此時距離孔子生年已經接近七十年，若以公孫龍為例，則其拜師時未滿二十歲。

如此，則列子的年歲不超過一百歲，便不可能看到子陽被殺。但如果列子能看到子陽被殺，則如何可以師從子產的老師壺丘子林？有二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壺丘子林是長壽之人，一如孔子可以活到前 479 年左右甚至更後，否則列子要能與之對話，又要能見到子陽被殺，其機率太低了！而且壺丘子林尚且與子產有交集，而子產死於前 522 年，這壓縮了壺丘子林正常人類壽命的空間。但如老聃有孔子、楊朱兩位弟子，孔子死後，楊朱還能與墨子弟子禽滑釐交談，足見楊朱理應比孔子年輕。又如孔子收徒，有小孔子四歲的秦商，也有小孔子五十三歲的公孫龍，兩人不需要同時，但卻可以都是孔子弟子，而且兩人年齡相差近五十歲！而史料中並沒有子產與列子有交集的資料，這也證明了列子不需要與子產同時，但可以同時是壺丘子林的弟子。從「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鄭子陽死於前 398 年進行倒推，則列子居住在鄭國當前 438 年，這一年列子究竟幾歲不得而知，但這可以視為列子在鄭國的主要生存時間。至於列子何時向關尹學射箭，則不可知。但若以列子前 438 年剛滿二十歲而論，則關尹的死期上限可以定在前 438 年，而這個時間與楊朱、墨子、楚惠王等人都有交集。

第二種可能：列子的「鄭子陽」不是前 398 年的「子陽」。古代同名同姓者很多，這一點不足為奇！或者司馬遷對於「子陽」之死的时间有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鄭聲公）五（年），子產卒。

〈左傳·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依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則子產死於鄭聲公五年，當前 496 年。如果依照這個說法，「子產殺鄧析」並不誤，因為根據〈左傳·定公九年〉：「鄭

駟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鄧析死於前 501 年，此時若子產尚未死，自然可以說成是子產命令駟黻殺鄧析。

依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則子產死於魯昭公二十年，當前 522 年。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年當前 517 年，而游吉確實稱「先大夫子產」，因此《史記》的相關記載有誤，可以肯定。如此，則司馬遷誤子產之死後 26 年，如果這表示司馬遷把整個小國鄭國的歷史都誤置了 26 年，則將子陽之死提前 26 年，是前 424 年。往前推四十年，是前 464 年，是列子開始在鄭圃居住的時間。再往前推二十年是其生年，當前 484 年。但即使如此，除非列子生於更早之前，否則仍然無法與子產同時，但列子可以單獨與壺丘子林同時，如孔子晚年收小自己五十三歲的公孫龍為徒，其時孔子已經接近七十歲，而此時孔子第一代弟子很多都已經死去了。且根據〈繫年·第二十三章〉的記載，則子陽之死確實與司馬遷所說時間相當，與楚悼王時間重疊。因此列子之時的子陽不是後來被太宰欣所殺的子陽也是一種可能。但遠不如壺丘子林年壽長、收徒晚這一更大可能。

《列子》中除了引用《老子》之外，也引用《黃帝書》、《鬻子》、《山海經》、《周書》，同時其中幾則《黃帝書》的內容，《老子》、《文子》亦引。證明列子之時，《黃帝書》尚未失傳。除了《黃帝書》，今日還能辨認的古籍有《周書》如記《穆天子傳》或周穆王的部份等。

因此，從以上的總總論述，至少可以將壺丘子林、列子、楊朱、老聃的相關說法定在春秋末年。至於《列子》一書中沒有標明出自以上人等的，以及沒有標明實際說話者的，則應該視為戰國時期的引文。至於當今學術界考證《列子》一書年代者的證據多數荒謬可笑，不再贅論。譬如近年還有以詞彙為考證方式的，這種方式的做法是說譬如《列子》中的詞彙，「根據目前可見文獻」進行詞頻統計，結果發現春秋戰國時期的用例很少（春秋戰國留下多少文獻？），發現哪一個朝代用到了最多的詞，就說《列子》是這個朝代偽造出來的。而全書完全不用證明哪怕其中一個詞彙為什麼是那個時代才能用的哪怕一點證據！也不用管當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自然是時代越久就越少的客觀事實（文獻越少、字數越少，統計上已經產生嚴重偏差。），同時更缺乏統計學的基本水平。更沒有水準的乃在於這犯了邏輯謬誤中的「不當預設」謬誤，可以說這不過是早期疑古派拿「仁義」來證偽老子、孫子的「現代化」運用。可悲的

是，都二十一世紀了，還有學者連基本語言學規律與邏輯學規則都不清楚，就寫出了這樣的書，更可悲的是還獲得中研院等單位的補助出版。

以疑古學派「豐富」的成果而論，筆者若要對每一本被疑的子書進行完全反駁，每本幾乎都要耗費數十萬字的篇幅。以《老子》而論，本書老子其人其書的考證篇幅已超過一百多萬字，如果連帶將《文子》、《列子》甚至《莊子》的年代做一完整考證，則全書沒有兩三百萬字是無法完成的。然而若以《孫子兵法論正》、《道德經論正》（本書）已經揭露的疑古論文之荒謬性而論，實在「無此必要」。

《列子》公案雖小於《老子》、《文子》，陣容的影響力卻遠比《文子》的疑古派總和還大，因為牽涉其中的疑古派有季羨林、錢鍾書、胡適，只此三人名頭，足以唬弄眾多讀者矣！事實上，有興趣考證的讀者，只需遵照本書考證《老子》、《文子》的手法，利用當代的檢索系統，找出所有《列子》徵引實例，即可明白。逆向偽造「絕無可能」，可惜大學者、專家、權威，飽學如錢鍾書、胡適、季羨林者尚且要認此書為偽書，其他不識之無之輩焉能不望風景從！豈不可悲！

根據以下簡單的考證與多方比對，可以得知，《列子》成書後，先後為《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戰國末期經典所轉錄，其他看過《列子》書的尚有子順等人！

〈尸子·廣澤〉：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幬、塚、啞、畋，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贖人。

〈呂氏春秋·不二〉：

聽群眾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列子·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礫，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尸子是在商鞅被殺時逃出秦國，商鞅死於前 338 年。其稱列子等「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則表示列子等人的年代在「數世」以前！這與《莊子》已經大量引用「列子」的言論其時間是相合的。《呂氏春秋》約成書於前 239 年。根據〈列子·天瑞〉則列子「貴虛」甚至是列子自己承認並當時就廣為人知的主張，而非如其他人是後世總結出的例子。史疾之時，如果沒有《列子》流傳，試問他如何「治列子圍寇之『言』」！

〈戰國策·韓策二·史疾為韓使楚〉：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

〈史記·西南夷列傳〉：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頡頏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商君書·弱民〉：

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鉞，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為池，汝潁以為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沙，莊蹻發於內，楚分為五，地非不大也，兵非不眾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

史疾是何時人不得而知，但韓國被秦國滅於前 230 年。若以戰國時楚國歷史來衡量史疾的年代，則其「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可以當成一條重要線索。莊蹻為盜是戰國時代楚國重大的盜匪事件，起因於前 301 年唐蔑所率領的

楚國軍隊被齊國匡章所率領的聯軍所打敗，楚國軍隊因此分崩離析，無力全力制衡莊蹻所率領的盜匪。而莊蹻自稱為滇王約在前 277 年。因此史疾對楚王的相關言論可以定在前 301 年之後。如此，史疾的年代若能確認，則《列子》成書的下限可知，而其書中非列子時代的後出部分（如注文摻入、後人累加），即可予以校正。

〈列子·說符〉：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孔叢子·陳士義〉：

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牴。」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富猗頓。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是道士之學不死也。」

子順所引故事正出自〈列子·說符〉。子順即孔謙，為孔子八代孫，魏安僖王（前 276 年至前 243 年在位）時曾擔任魏國宰相。

〈列子·說符〉：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孔叢子·執節〉：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郁離子·淳于髡論燕畔〉：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為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於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為若請於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

搜於山，羅於林，罾於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於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鍛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掩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於巫曰：『神亦有迂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迂，非神迂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為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冤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為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放生的思想早在趙簡子之前便已有之，往後子順繼續談論到此事，也屬客觀證據！老子之前的孫叔敖則早有「陰德、陽報」之論，即便「報應」的思想也早在春秋之時便已有之，最有名的又莫過於戰國末年的白起自白：「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且依照子順的談話也不難推論，「放生」是趙國特有的習俗，而趙國的創國者正是周穆王的「駕駛」造父，而與周穆王相關而並載於《列子》的則是「周穆王西巡狩」時看到「機器人」的故事！造父、趙國、西方、放生、佛教思想，顯然都確實具有相關性！造父確實到過西方，而趙國確實是當時具有放生習俗的一國，因此，要說放生是趙國君主自己想出來而含宗教色彩與思想成分，難以成立！若有宗教色彩，那麼西方的宗教正好就是佛教！因此，可以推論，印度佛教思想的傳入恐怕遠遠早於今人的想像之外！果如此，則趙簡子時有放生的思想，即便依然出於佛教，也不足為怪！根據〈郁離子·淳于髡論燕畔〉記載，則齊國的巫也有主張放生的。如果按照人類思想共性而論，放生的思想正可以不必必然出於佛教。但如果趙簡子時就有放生思想，那麼戰國時代齊宣王之時的齊國「因此」有放生思想，也不足為奇。因此就總體可能性與時間先後而論，則以放生思想來自西方佛教的可能性為最大。

至此，子順已經談論到了兩個《列子》的故事，而子順的年代約當前 276 年至前 243 年。稍晚於《莊子》的成書時間，而《莊子》以及稍後的《呂氏春秋》都已經引用了《列子》。這些證據誰曾證反？誰曾證明不是《莊子》、《呂氏春秋》引用《列子》而是相反？若以歷史記錄而論，列子為關尹弟子，早於《莊子》等，誰先誰後的客觀證據已經在此，誰曾反駁？未曾反駁，如何能預設是《列子》抄襲（還故意不談引用）《莊子》、《呂氏春秋》？疑古派無視於客觀證據與邏輯的存在，學界也一而再、再而三的鸚鵡學舌、百犬吠聲，試問在這些所謂的「考證」文章裡有何科學、邏輯與理性的存在？

〈列子·湯問〉：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皜然疑乎雪。〔張湛註：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孔叢子·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立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國語·魯語下〉：

仲尼在陳，有隼極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磬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聞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磬，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漢書·匈奴傳上〉：

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玁狁，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列子所載這段故事既然是周穆王時的事情，而非列子所編，就必有源頭！而子順對魏王的回答中，以為「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這些內容出自《周書》。周穆王的事蹟被記載於《周書》實屬正常的事情！加上列子引《山海經》等也多是暗引（暗引更是諸子的主要引用方式），因此可以判定這則關於周穆王的記載確實出於《周書》。而且如果子順所引用的話，與列子幾乎一模一樣，不是出於《周書》也

該出於《列子》。以子順之博學，說他不知道《列子》而把《列子》當成《周書》，是比較不合理的！

此外「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子順的引文保留了正確的形式，而今本《列子》已經誤作「布則火色，垢則布色」，「乃、則」虛詞可通用，「灰、布」形近而誤。而張湛此段也說：「此《周書》所云」，如果不是張湛因為子順的說法而有了這樣的註解（也就證明了張湛看過《孔叢子》），那麼毫無疑問就只能是張湛看過記載此事的《周書》了！或者最後一種可能是在張湛之前的註釋者留下了「此《周書》所云」的字樣，張湛不過照抄而已！

至於子順「火浣布，必投諸火。」與列子「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則可以視為是子順在口語引用時所自然產生的變動！

列子所引「其劍長尺有咫」，這樣的表達「劍」或其他短長條物的長度的方式又見於孔子對「楛矢、石弩」長度的描述，孔子稱「其長尺有咫」。孔子與關尹同輩，而關尹是列子之師，因此孔子與列子所用描述長度的方式是相同的，也就在語言使用上為《列子》的成書年代多得了一份證據！當然，如果周穆王的事蹟是記載於《周書》，那麼孔子、列子描述長度的方式，也只是繼承了之前的用法而已！

關於周穆王征西戎的故事，〈孔叢子·陳士義〉也點出秦昭王是從「西戎」之處取得「利刃」。而〈漢書·匈奴傳上〉也仍有「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的相關記載！所以僅就周穆王征西戎一事，至少在班固之時，仍是可知之事！

晉·王嘉〈拾遺記·卷十〉：

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

〈晉書·列傳·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

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苻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晉書·載記·姚萇〉：

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萇復如秦州，為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偽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太元十一年當 386 年，太元十八年當 393 年。因此王嘉死於其間，晚於張湛。王嘉在〈拾遺記·卷十〉提及燕昭王二年（前 312 年）有海人獻燈，這個燈用「火浣布」纏繞而成。這則資料陳廣忠在「《列子》三辨：《列子》非偽書考之二」提出，證明燕昭王時，「火浣布」仍流傳於世。陳廣忠在此文中大抵已經舉出子順、張華、干寶、傅玄的資料，但沒有深入探討相關年代的確切時間以及「皇子」稱謂的合理性，沒有探討在戰國時代「皇子」只能是「氏」＋「子」的稱謂形式，反而以為「皇子」是指「皇人」。未免失之。

〈列子·湯問〉：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張湛註：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皜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孔叢子·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

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立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尸子·勸學〉：

夫學譬之猶礪也，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為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為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為武德侯傳，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尸子·廣澤〉：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

〈西京雜記·第一〉：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

〈藝文類聚·衣冠部·裘〉：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沉，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三國志·魏書·齊王紀〉：

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甚病，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鴻業，兢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僚，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裴松之註：「《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凋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沍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

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帛，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

〈博物志·異產〉：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膈。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八·手巾〉：

《廣志》曰：炎州以火浣布為手巾。

〈文心雕龍·頌讚〉：

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筆者註：乃劉勰對曹植所著《皇太子頌》的省稱，全文與切玉刀、火浣布一點關係都沒有！〕；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

〈文心雕龍·才略〉：

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

〈顏氏家訓·歸心〉：

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抱朴子·自敘〉：

洪見魏文帝《典論》自敘，未及彈棋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聞焉。

〈抱朴子·論仙〉：

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嘆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

〈抱朴子·釋滯〉：

夫乘云繭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狗蹄，脩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汎土船，沙壹觸木而生群龍，女媧地出，杜宇天墮，臂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醜倚枯，貳負抱桎，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交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虎景興，鮮卑以乘鰲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屍帝，鹽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荊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

〈水經注·穀水〉：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于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

〈莊子·達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瀦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鮪蠃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峩，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樓子·立言下〉：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昔燕昭重樂毅而惠王疑其能；**魏武誅文舉而曹丕收其集**，劉向劉歆立言相反，郗愔郗超所奉各異，而況九族乎，百姓乎？

〈藝文類聚·軍器部·刀〉：

（三國·魏·王肅）《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藝文類聚·寶玉部上·玉〉：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

〈藝文類聚·寶玉部下·銅〉：

晉·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冢）。**

〈藝文類聚·職官部二·祭酒〉：

後魏·溫子昇《為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曰：**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至於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候酌，懸鍾待叩，必須蘊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為式，垂三行於貴遊，揚六藝於胄子，而臣學媿聚沙，問慚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於茲曠官，青衿何仰。

今本〈列子·湯問〉有「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疑古派以此為《列子》為偽書之證。尤其當葛洪、劉勰、曹丕的事件被進行「聯想」之後，一般人也難以辨認。於是疑古派便把《典論》作者曹丕當成「皇子」，至於能評論的「蕭叔」是誰，則不可知。了不起的就誣說是《金樓子》作者梁元帝蕭繹。但這樣的解讀實在荒謬。且要說《列子》為偽書，然後全書除了「宋康王（故事）、鄒衍（排比句）」的例子之外幾乎沒有破綻，試問如此高明的造偽者難道竟然不知道曹丕《典論》之事？更可笑者乃指稱張湛偽造《列子》，如果張湛要偽造此書，會愚蠢到把曹丕的東西加到書中嗎？一整本都在談論東周人事物的書籍，居然摻入了三國時代人物的相關事件與評論？豈不可笑！而且退一萬步說，這即使照疑古派的說法指為曹丕之事，其時代相差過遠，也不過就如今本《孫子兵法》有一本有「破釜沉舟」的「注文摻入正文」現象罷了！

疑古派的錯誤非常明顯，其理由有幾個：

一、一般人聽到違背常識的「火浣布、切玉刀」，多少人不曾質疑？古今質疑者豈止曹丕一人？且曹丕因為沒有見過實物所以懷疑，那麼他是怎麼知道「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的呢？除了口傳，不就是只能從書上得知嗎？且三國·魏·王肅《聖證論》明明記載「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是王肅記載當時史利聲稱前人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這種東西，卻「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這不證明在王肅以前的史利就知道「火浣布、切玉刀」了嗎？王肅乃王朗之子、司馬昭的岳父，與曹操、曹丕同時。而王肅稱「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不也正合曹丕《典論》不信世界上有「火浣布、切玉刀」的記載嗎？不也證明《穆天子傳》未再次面世前，世人就知道「火浣布、切玉刀」的事情了嗎？

二、古今「皇子」無數，試問誰是皇子？「皇子」在這裡如果是一個泛稱、通稱，那就不是一個專稱、特稱。而這裡明顯不是用泛稱而是特稱。否則誰知道是哪個皇帝的「皇子」？更重要的是要稱為「皇子」，「皇子」之父必須已經「稱帝」，如〈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世說新語·排調〉：「元帝（晉元帝司馬睿）皇子生，普賜群臣。」其中魏文帝、魏明帝、晉元帝都有「皇子」，而他們也都已經「稱帝」。且提到哪個「皇子」都是「皇子」+「名字」的形式，否則誰知道是哪個「皇子」？因此可知，「皇子」在先秦以前與以後是兩種不同形式的稱謂，在先秦以前「皇子」只能是指「皇（氏）」+「子（尊稱）」之人，因為當時只有「周王」，「周王」之子只能稱為「王子、太子」，只有在秦始皇正式稱帝之後才有「皇子」（秦昭王、齊湣王只有短暫稱帝）可言！因此先秦之後的「皇子」主要指帝王之子。先秦確實有思想家「皇子」的存在，而先秦之後也確實沒有任何「皇（姓）」+「子」的名人存在！因此從稱謂的特徵來看，列子是春秋末、戰國初人，他所指稱的「皇子」不可能指任何帝王之子而只能指著書立說或收徒教學之思想家！如果要用「皇帝之子」的意義，那麼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誰是皇子，因為這樣的皇子只是一個泛稱而非特稱！顏之推：「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明白易懂。魏文帝已經是帝王，怎麼可能還被叫作「皇子」！

三、曹操未曾稱帝，有「太子」，無「皇子」。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216年）被封為「魏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建

安二十五年正月（220年），曹操去世，謚號武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謚曰武王。」）這短短四年之間，曹丕頂多也就稱為「王子」而已！如何能稱為「皇子」？而在建安二十一年以前，曹丕更連「王子」都沾不上邊！只能稱為「世子」。可悲的是疑古派卻能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胡謔「皇子」（泛稱）就是「專」指曹丕，而仍能取得學界認可，豈不可笑！且魏文帝稱帝後的稱呼是什麼？葛洪稱「魏文帝」、梁元帝蕭繹稱「曹丕」、劉勰與顏之推都稱「魏文」，誰稱「皇子」？更重要者乃在於曹丕根本不能稱為「皇子」！且曹丕在位不過六年，曹丕繼位之後誰還能稱之為「皇子」？因此很明顯，《列子》這裡所說的「皇子」不是一個泛稱，而是一個特稱，是指列子之前的某一位稱為「皇子」的作者。「皇」是氏，「子」是尊稱。而此人的作品至戰國中期尸子的時代還流傳著，還有點影響力，這也是為什麼尸子之前的列子會提到此事的原因！

四、尸子稱「皇子貴衷」，而〈莊子·達生〉則記載在齊桓公之時確實有一位士人就叫做「皇子告敖」。鄧析引《長廬子》、《呂子》，早已失傳，而《列子》也收入有長廬子的故事；《文子》引《中黃子》，也早已失傳，而《尸子》有引「中黃伯」的文字；這與《列子》引「皇子」，《尸子》也引的情況一致。是尸子之時還能知道誰是皇子。此書此後失傳，反倒證明了這些書籍的早出。〈漢書·藝文志〉著錄有《管子》（筦子，管仲著），管仲之前之書更不知凡幾。至如《長廬子》、《呂子》、《中黃子》都早已失傳。皇子告敖若有著作流傳至戰國時代，也屬正常。而皇子在列子之前，其能知周穆王之事而不信，也是正常之事情。因此後直到魏安釐王之時，「西戎利刀」才又重現江湖。而這「鍔鋸之劍、火浣之布」的製作技術也一直沒有失傳，因此直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還能獻「吉光毛裘」這類似「火浣之布」的寶物，到魏明帝曹叡景初三年時，西域還能再次獻「火浣布」。

五、尸子晚於列子，而尸子能以「昆吾之金」做譬喻，認為以此搭配「銖父之錫」由越國的鑄劍高手「鑄之以為劍」，然後稍加砥礪，就能「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表明尸子之時確實早已經知道「西戎獻鍔鋸之劍」此劍之鋒利以及相關故事。且晉·郭璞《赤銅贊》：「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冢（冢）。」不也再次證明戰國時代的《尸子》就已經提到「切玉如泥，火炎其采」了嗎？所謂「驗之汲冢（冢）」正是指《穆天子傳》。而且汲冢是指魏襄王塚或魏安釐王（魏安禧王）塚，魏襄王於前 318 年至前 296 年在位、魏安釐王於前 276 年至前 243 年在位，尸

子是商鞅幕僚，晚於商鞅而死，商鞅死於前 338 年。且燕昭王二年（前 312 年）還有海人獻上由火浣布纏繞而成的燈。這些年代都晚於列子而與尸子有所重疊。換句話說，尸子不僅確實可以看到《穆天子傳》，更有機會耳聞火浣布之事，並且《尸子》也確實提到了相關的事情！而這不就證明了《尸子》到至少魏襄王之時，《穆天子傳》這本書還沒失傳嗎？由此可見，疑古派之不讀書與好發無知謬論之一般！

六、「秦王得西戎利刀」時，子順已經引出：「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鋸之劍、火浣之布。**」的故事以及故事的來源《周書》。且子順更知「切玉刀」實名「鍔鋸之劍」，正與引周穆王此事的列子所說相同。這證明了這故事早在周穆王時代便已經存在，因此被記錄於《周書》之中，而周穆王的故事正是屢次被列子所提及的內容。其機器人故事便是最為著名的一例。且列子其時正是引《周書》、《書》最盛行的一刻！按照晉·郭璞《赤銅贊》則尸子也曾對這些事物感到驚嘆（當即〈尸子·勸學〉）！則是從周穆王、列子、尸子、子順都知所謂「鍔鋸劍、火浣布」！子順即孔子八世孫孔謙，而與孔謙交談的魏王正是魏安釐王，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周紀·周紀·赧王下〉：「（周赧王五十六年，前 259 年）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胡三省註：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由此可知，子順與魏安釐王的對談發生在前 259 年。其時在位的正是秦國一代強主秦昭王。而子順所交談的對象既然就是汲冢的墓主可能人選之一，子順能知《穆天子傳》又有何神奇之處？（牽涉到《孔叢子》公案）且秦昭王既然是繼周穆王之後又能再次拿到「鍔鋸之劍」的君主，且「以示東方諸侯」，搞得人盡皆知！那麼從秦昭王至魏安釐王至史利都知道有這些寶物，究竟有何奇怪之處？何以非得汲冢挖出了《穆天子傳》，世人才能「再次」知道？

七、「蕭叔」這樣的稱謂方式，屢見於《列子》一書，也符合春秋至戰國初年的普遍稱謂方式。除〈列子·湯問〉的「蕭叔」之外，尚有：〈列子·仲尼〉：「龍叔謂文摯」、「列子·楊朱」：「衛端木叔」、「列子·力命」：「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列子·說符」：「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柱厲叔事莒敖公」其中「鮑叔牙、孫叔敖」都是「氏」+「叔」+「名字」的稱謂方式，〈孔子家語·賢君〉：「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則有單稱「鮑叔」之例。而蕭叔批評皇子的「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試問難道不能適用於任何一個宣稱「無此物，傳之者妄」的人嗎？

八、張湛註「鍔鋸之劍」引用河圖、《尸子》，註「火浣之布」引用《異物志》，註此諸事物引用《周書》，最後總結：「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明明白白原文與注文分離，明明白白指出河圖、《周書》、戰國中期《尸子》，並引用東漢議郎楊孚《異物志》。且楊孚為漢章帝（75 年至 88 年在位）、漢和帝（88 年至 106 年在位）時人，與史利時代相當，而仍知有「火浣布」。那麼張湛還需要等待汲冢出土《穆天子傳》才能知道「切玉刀、火浣布」嗎？

由此可見，這一條根據分析，絕非注文摻入正文，「皇子」更不可能指「曹丕」。那麼誰是蕭叔？誰又是皇子呢？如上所說皇子當即尸子提到的「皇子貴衰」的皇子。而蕭叔則當是蕭叔大心，見以下相關引文：

〈左傳·莊公十二年（前 682 年）〉：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前 671 年）〉：

（經）**蕭叔朝公。**

〈穀梁傳·莊公二十三年〉：

夏，公如齊觀社。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屍女也。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公及齊侯遇

於谷。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左傳·文公十一年（前 616 年）〉：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

宋武公於前 765 年至前 748 在位，司徒皇父為宋戴公之子，而其後代便以「皇」為氏。而「蕭叔大心」也是宋國人，他在魯莊公十二年（前 682 年）至莊公二十三年（前 671 年）都還活躍著，並且是一位有名望的人士。這是符合列子記事不稱「宋人」泛稱而用「蕭叔」專稱的條件之一。而齊桓公於前 685 年至前 643 年在位，其時又正好有一位「皇子告敖」。論時間，「皇子告敖」與「蕭叔大心」時間正有交集！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列子所記的蕭叔即「蕭叔大心」；列子、尸子所謂的「皇子」即「皇子告敖」。而蕭叔與皇子的相關論述的時間發生在前 682 年至前 643 年之間。這時《穆天子傳》仍流傳於世！

管仲死於前 645 年，因此「皇子告敖」在此前與齊桓公、管仲在一處，從「蕭叔大心」對「皇子告敖」的批評，以及「皇子告敖」對齊桓公所述之事，不難發現確實有相關之處！而宋國大臣後代「皇子告敖」在齊國，以當時的環境而論必有政治因素，如果正是如此，那麼「蕭叔大心」對他的批評：「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也就顯得非常合理了！即使沒有這層政治因素，「蕭叔大心」與「皇子告敖」既然都是宋國大臣或其後代，即使批評對方也屬正常之事了！

那麼稍微整理一下關於「火浣布、切玉刀」從最開始到三國時代的文獻記錄：

《周書》、《穆天子傳》：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天子，時間約在前 1000 年。為故事起源！

《皇子》：皇子告敖，時間約在前 645 年左右，為東周春秋時代。當時齊桓公曾經有北伐燕國與西戎的記載（〈管子·小匡〉），皇子告敖提出世上沒有「切玉刀、火浣布」的說法可能與此事件有關！

《列子》：列子，前 400 年左右，提到蕭叔大心就此事批評皇子告敖的相關言論。時間在東周戰國初期！

《尸子》：提到「昆吾之金」與鑄劍。時間約在前 338 年左右，時間在戰國中期。

「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燈以火浣布為纏。」時間在前**312**年。見載於晉·王嘉〈拾遺記·卷十〉。

「秦王得西戎利刀」：秦昭王從西戎處得到切玉刀，向東方諸侯炫耀！時間約在前**256**年。孔子後代子順引經據典指出「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鋸鋸之劍、火浣之布。」

汲冢：魏襄王或魏安釐王死後以《穆天子傳》陪葬！時間在戰國中晚期！與尸子、燕昭王、秦昭王時代重疊甚多。

「西域獻吉光裘（火浣布所製衣服）」：事在漢武帝天漢三年，當前**98**年。見載於〈西京雜記·第一〉、《十洲記》。

《異物志》：楊孚提及「火浣布」。時間約在漢章帝（**75**年至**88**年在位）至漢和帝（**88**年至**106**年在位）年間。

「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梁冀在延熹二年（**159**年）被漢桓帝所殺，因此此事件發生在此前！見載於傅玄《傳子》，傅玄約死於**278**年。此時汲冢尚未被盜發，其中古籍自然也尚未面世。

「史利」：漢朝的舊優史利說：「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則「史利」在梁冀之後！見載於三國·魏·王肅《聖證論》，王肅約死於**256**年。

《典論》：「（魏）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魏文帝在《典論》中不信有「切玉之刀、火浣之布」。魏文帝在位期間為**220**年至**226**年。〈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則《典論》的完成在曹丕繼位之前，也即**220**年以前！

「西域重譯獻火浣布」：魏明帝曹叡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時間在**239**年。

「盜發汲冢」：西晉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準盜掘戰國魏國古墓（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發現《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古籍。

此後，干寶《搜神記》記載「火浣布」、張華《博物志》引《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晉·郭璞《赤銅贊》稱：「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冢）。」

從以上的時間軸不難看出，關於「火浣布、切玉刀」的傳說在汲冢挖掘出《穆天子傳》之前一直都是存在的！以此質疑《列子》書之晚出，只是不學無術的無稽之談！

按〈三國志·魏書·齊王紀〉則西域獻「火浣布」在「景初三年二月」，當 239 年，此年魏明帝曹叡去世。按《聖證論》則又稱是「正始初」，當 240 年，此年魏齊王曹芳繼位改元。

〈列子·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硤。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媿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暫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驪，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渠，主車則造父為御，騶駼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

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穆天子傳·卷四〉：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又服●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

〈風俗通義·皇霸·六國〉：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驪騶、騶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姓。

關於列子記載周穆王的故事其實有幾段，有些描述的比《穆天子傳》還要詳細與可解，這可能是列子對原始故事的改寫。其中一段與造父有關的記載，不僅《穆天子傳》、〈列子·周穆王〉有，〈風俗通義·皇霸·六國〉也有相關記載！《風俗通義》為東漢末年人應劭所著，而應劭與高誘、曹操同時。換句話說，關於周穆王與造父的故事，如果沒有〈列子·周穆王〉的記載，《穆天子傳》又早已失傳的情況下，應劭如何得知？

〈列子·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鎖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

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无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論衡·儒增〉：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

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西晉竺法護譯〈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第廿四）：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技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干年。」國中恭敬，多所餽遺。國王聞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眼，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敕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五行，長跪請命：

「吾有一子，甚重愛之，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唯以加哀，原其罪愆。」時王恚甚。不肯聽之，復白王言：

「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拔一肩梃，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即以賞賜億萬兩金。即持金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觀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機關為木人，過踰於生者，歌舞現伎樂，令尊者歡喜，得賞若干，寶誰為最第一。

東漢支婁迦識譯〈道行般若經·守行品〉（第廿三）：

譬如工匠黠師，剋作機關木人，若作雜畜木人，不能自起居，因對而搖，木人不作是念言：我當動搖屈伸低仰令觀者歡欣。何以故？木人本無念故。

西晉竺法護翻譯《生經》在晉太康六年，當 285 年。季羨林因此認為《列子》必出於晉太康六年之後，更去信胡適以求「認可」，胡適也以為這是「鐵證」，殊為可笑！且不說這兩個故事雖有雷同之處，依然有不小的差異，即便是有共同的來源，何以便能斷定《列子》這個故事必須來自於竺法護翻譯的《生經》？且這兩個故事的文字相差如此之大，〈列子·湯問〉的故事尚且包含了中醫五行生克之道，而這些生克之道與五臟歸屬，早在春秋末年程本、關尹子、孔子、扁鵲《難經》以及稍後的《素問》、《靈樞》便已經談論得十分詳細。季羨林、胡適等輩大師、權威，並不懂得如何考證，有此謬說，情有可原！

若以實際而論，列子稱「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而列子曾記載趙簡子及其子趙襄子之事，而趙簡子有「放生」思想，孫叔敖以至老聃都有「陰德、陽報」思想，而「周穆王西巡狩」所去之地正是佛教思想的發源地的所在方向，顯然說列子的這個故事與《生經》有共同來源，以列子以及《生經》的成書時間而論，更為可信。而根據王充所引魯般木車馬的故事，以及列子便已引用的飛鳶的故事，則自動化機器人的構想早在墨子時就已經出現了。也即春秋末年時便已出現，而墨子與趙簡子的生存年代極為相近，甚至有所交集。

〈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吾身云何瞋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這個人有「三百六十節」的說法，早在〈文子·九守〉：「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靈樞·邪客〉：「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便都有論述了！這種天人相應的思想體現的是周曆一年的日數「三百六十日」與人體的對應關係，符合《列子》一書為戰國初年著作的內在特質。也就是說〈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這個故事居然用到了周朝的曆法，除非印度也採用這個曆法，否則這不就表明了〈生經·佛說國王五人經〉的故事其實正是化用了周穆王機器人的故事嗎？果若中印思想的交流遠在春秋末期甚至以前，那麼誰為因、誰為果！究竟是佛教的思想傳入中國而影響了諸子，還是老子的思想傳入古印度而影響了佛教，或者互為影響，顯然需要再深入的探討。《老子化胡經》向來被視為偽書，這一點幾乎無人不認可，但若老子的思想以及中國的部份歷史確實早就傳入古印度，那麼「化胡」很難說不會成為一種巧合！

不管如何，周穆王、偃師的故事確實與「西方」有關，說這個故事起源於「西方」也是客觀事實，即便周穆王之時世界不可能造出所謂的「機器人」！即便周穆王、偃師的故事是虛構的，也都指向了「西方」！因此，即使退一萬步說，墨子、公輸般既然能聽到這個故事，那麼該改寫的不是《列子》的成書時間，而恰恰是中印思想交流的時間，精確的說即是佛教思想傳入中國的時間必須得到修正！

老聃必須消失，孔子才能成為至尊

錢穆在老子公案上連續兩次被胡適嚴重打臉，所以錢穆實際上在老子公案的筆戰上寫過三篇文章。這三篇是《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再論《老子》成書年代》以及最終收入《先秦諸子繫年》的這篇《老子雜辨》。所以大家應該已經猜到為什麼錢穆寫了三篇，卻最終只收了一篇的原因。因為這一篇胡適已經沒有反駁了，而胡適沒有反駁乃是因為胡適認為他的反駁已經夠了，同時他也知道他的反駁未能起到任何作用的原因根本不在於學術上的探討，而是妥妥的政治與信仰（對儒家偏執的信仰其實就是利益與權力的鬥爭）的鬥爭！胡適沒有敗在學術上，而是敗在政治與信仰上。而這種可悲的政治與信仰至今還在影響著整個公案、整個中國哲學界、學術界。即便個人已經徹底解決了老子公案。

胡適的缺陷是，胡適其實沒有足夠的邏輯學素養、對先秦諸子認識不足、缺乏語言學與訓詁學的知識（也缺乏考證、訓詁實踐），也仍深受疑古派其他謬論的影響。（如列子公案、孔子家語公案都讓胡適的中國哲學史蒙塵。）雖然，胡適的程度已經比其他疑古派好太多了！但終究還是沒有完全擺脫疑古派！因此，疑古派自然認為胡適你可以，為什麼別人不行？

筆者跟胡適最大的差異是，筆者是徹徹底底終結了這個公案。筆者不僅從各個層面找齊了所有證據，包含引文線索、譬喻演進線索、關於老聃的最詳細的考證、反駁了所有疑古謬論等等！也充分利用邏輯思想剖析了整個公案中雙方爭論點的邏輯效力問題。簡單總結就是，疑古派的論述根本沒有效力！（邏輯上、證據上、情理上都沒有效力）而胡適其實並沒有完全反駁了所有證據，即便剩下的東西其實也沒有效力！並且多數時候是被疑古派牽著鼻子走，譬如對於老子公案中李氏家譜的辯論，胡適並沒有一針見血的指出其中論證邏輯的問題，以及疑古派雙重標準的問題。

所謂論證邏輯的問題是指：證明家譜的假，也只能否定家譜本身，而無法否定一個不確定源頭的嫌疑人之一老聃。因為家譜並沒有指明是老聃的。而且證明家譜是假的（即使指明是老聃的家譜），並無法反推老聃是假的，甚至把老聃收孔子為徒、被關尹子逼迫寫書這些事判定為假。因為這些本都是獨立的事件，事件彼此並不存在依賴關係。

所謂雙重標準問題是指：疑古派包含錢穆用家譜來把整篇老子列傳打成假的，然後卻主張家譜可信！也就是說疑古派說是假的就是假的，說是真的就是真的！連證明都不用了！而且明明記載老聃與孔子的史料非常多，而記載周太

史儋的始終就是一筆資料的不同改造（僅《史記》記載而《漢書》謄抄、改寫）。結果疑古派不用提出任何能證明「周太史儋」姓李、可以被叫做老子（老氏）的證據，周太史儋居然就成了老子，就成了家譜的始祖，就成了《老子》的作者了！（家譜究竟跟《老子》的作者有什麼關係？有誰說過家譜的始祖就是《老子》的作者嗎？沒有！）把一個最不可信的私人性質的家譜當成打擊其他老聃史料真實性的武器，這是妥妥的疑古派最擅長的「拿假的來把真的打成假的」的伎倆！（參考孫子公案、鬼谷子公案、子華子公案等等等）最終疑古派說司馬遷的老子列傳不可信，然後家譜就可信了！這是什麼邏輯？這是什麼標準？而其目的無非就是要把老聃往死裡打，把《老子》打成非一人一時之作的偽書！把老子、《老子》拉到戰國時代！甚至可以拉到楊朱之後！（拉到戰國時，老子已經不可能是孔子老師了，錢穆連中山公子牟的家譜都能顛倒來玩了，師徒關係的取消只是很正常的操作！）

所以整個學術史就這樣被疑古派的無知、荒謬、虛假、暴力，夾雜著人海戰術、學術潛規則，給整個搞亂了！這跟四人幫、破四舊沒有兩樣。甚至我們今天早已經看不到四人幫（早已經遺忘），破四舊的損害也早就終止，但疑古派的勢力與影響力卻仍在繼續！

關於錢穆的三篇謬論，裡面的所有邏輯都能展現出錢穆國學水準低劣的一面。《疑古謬論綜駁》由於從老子公案最開始一篇一篇反駁，因此來到錢穆這最後一篇謬論，已經不需要太多的辯駁。當初也選擇節錄的方式來處理。今天既然以批評《先秦諸子繫年》的謬誤為主，就不得不加收錢穆這一篇前面的謬論。

在老子公案中，錢穆把「歸併」伎倆玩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不只是兩個人名相關就被歸併（如華、子華、子華子），不只是兩個相同國家的名人的事蹟就被歸併（如子產、列子事蹟，把事蹟混淆），到了這裡，只要兩個人都會釣魚（有相近技能）就能直接歸併了！這種邏輯水準，以及對考證毫無水平的表現，最終拼湊出這一本《先秦諸子繫年》。而這樣的東西，居然是所謂「史學四大家」這種無量牛皮的錢穆的基本水平。這所謂「史學四大家」是不是只要會吃飯喝水隨便拿著資料胡說八道就能當的呢？還是依靠什麼水準以外的條件來達到的成就？

讓我們再來看一下錢穆在目前所揭露的「考證」中使用的幾個主要伎倆：

因為名字上有相同點，所以數個完全不相干，都有各自記載的人就被說成是一個人：春秋戰國幾乎所有名字或稱謂帶「華、子華、子華子」的除了原始的春秋末年的真正子華子程本以外都被歸併成了一個人，子華子成了戰國人。

名字帶「詹」字符的，不管是姓氏還是名字，不管各自都有自己的記載，就被說成是一個人：春秋時代的詹何與戰國末年的太卜詹尹、周太史儋都成了一個人。

因為都會釣魚，所以春秋楚莊王時代的詹何，與戰國時代的漁父（不知名的捕魚人）被歸併成一人。（所以詹何這麼有名，為什麼要用漁父來指稱他？）

因為都是同一國的人，所以兩個完全不相干，都有各自記載的人，他們的事蹟就被混淆了（就是兩個人是一個人的另外一種說法）：「伯昏無人尤渺茫，特以子產乃鄭之聞人，而列子亦鄭籍，故言兩人事多牽混。」

因為長壽，所以兩個完全不相干，都有各自記載的人就被說成是一個人：「丈人即壽者也。老萊子之即荷篠丈人，夫復何疑，而猶紛紛為氏老、氏李、氏萊之辨哉？」

僅僅因為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把「狐丘子林」擺在子張、曾子附近！於是子產、列子之師「壺丘子」就變成了與楚莊王時孫叔敖交談的「狐丘丈人」！（時間不對錢穆都看不出來？這「狐丘子林」不是在子張、曾子附近嗎？跟楚莊王時的狐丘丈人有什麼關係？）僅僅因為他找不到「壺丘子」，所以「狐丘子林」就被當成了「壺丘子林」。而不管是否傳抄失誤，或者其實另有「狐丘子林」一人。而且更妙的是這「狐丘子林」明明是擺在子張、曾子、子產附近的，正與子產、列子之師壺丘子林的年代相合，怎麼又會跟孫叔敖扯上什麼關係呢？唯一扯得上關係的就是「壺丘子林、狐丘子林」中的「壺、狐」因為音近被寫錯了，如此而已！而僅僅如此的東西，居然就被錢穆無限放大，把所有其他證據拋到腦後，然後「壺丘子林」在沒有任何其他證據支持之下就成功穿越了！

先把分處兩個時代的不同人馬，歸併成一組，然後再用歸併出來的這一組的時間點來質疑原始的記載的真實性，譬如：先歸併了「狐丘、壺丘」，把與子產、列子交談的壺丘子當成是與孫叔敖交談的狐丘丈人，然後再用既然壺丘子是狐丘丈人的「結論」，來質疑楚莊王時的人怎麼跟春秋末年的子產、列子交談？於是得出結論可見壺丘子與子產、列子的等人的說法不可信。又譬如

「詳班氏所稱老子，當指孔子所從問道之周守藏室史而言。則環淵在莊、惠之世，又烏從而師之？」先把老聃的弟子蜎淵、關尹子用名字上有相近的字這樣的理由直接歸併成戰國末年的環淵，然後再說環淵是戰國末年的人，怎麼可能是春秋末年老聃的弟子！至於其中證明「蜎淵、關尹子」不存在的證據始終就是名字上有可以扯的關係，譬如「蜎淵、環淵」同名。甚至把一些會釣魚而被

相提並論的人的組合直接說成是包含了蜎淵的證據，然後也不管這些相提並論的人馬其實都沒有被提到時代的問題，這些人也自動的就成了戰國末年的人，然後就說這個會釣魚的人是戰國時人，所以蜎淵就是戰國時人！於是質疑戰國末年的人怎麼能拜春秋末年的人為師呢？至於其他證據，也都早已被錢穆拋到腦後了！

這種水準拼湊出來的東西，居然是一個所謂史學四大家的唯二成名代表之一。怎麼能不令人感慨呢！原來只要有人捧，X X都能成為經典！

不過確實應該憐憫一下錢穆，畢竟兩次被胡適在老子公案打臉，嚴重損傷了他的自尊心。於是做出了這等違背常人邏輯所能創造出來的東西。也確實是很可憐的！但更可憐的是，這種X X水準的東西，居然還有一大堆台大、中研院的人在捧！

先秦諸子繫年

〈先秦諸子繫年·七二、老子雜辨〉：

〈史記·老子傳〉：「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儋見秦獻公，《周本紀》在烈王二年，上距孔子之死百有六年，此誤。〕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汪中《老子考異》謂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即儋，凡立五證：（朔雪寒註：關於汪中這一篇的考證與反駁請參考〈疑古謬論綜駁·汪中〉。這裡只簡單提要一下。）

一，〈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原諸：「〈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審己篇〉，與〈說符篇〉文同。」按《偽列子》襲此二書耳。〕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烈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沒凡八十二年。〔按鄭殺子陽，下距太史儋入秦二十四年，則列子應為關尹前輩。諸書所載答問語，亦不可信。〕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為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朔雪寒註：偽列子、偽孔子家語，這些都是疑古派用來貶損真書的言語暴力！列子的兩個老師壺丘子林、關尹子都是鄭國人，與列子有地緣關係。且孔子弟子子夏都能成為魏文侯師、孔子弟子公孫龍都能跟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交往，老聃的弟子關尹子怎麼就不能收列子了？孔子生於前 551 年，弟子公孫龍小孔子五十三歲，那麼公孫龍生於前 498 年。假設公孫龍能活七十歲，那麼公孫龍能活到前 428 年。活到九十歲就是前 408 年。老聃收關尹子為弟子在離開周朝之後，其時間點根據《《老子》成書時間考》考證：「則關尹強留老子著書，應該在前 509 年至前 505 年或前 502 年之

間。」當時關尹子幾歲不得而知。假設當時關尹子二十歲，那麼關尹子活七十歲，可以活到約前 450 年。根據列子一節的考證則：「鄭子陽死於前 398 年進行倒推，則列子居住在鄭國當前 438 年，這一年列子究竟幾歲不得而知，但這可以視為列子在鄭國的主要生存時間。至於列子何時向關尹學射箭，則不可知。但若以列子前 438 年剛滿二十歲而論，則關尹的死期上限可以定在前 438 年。」那麼不管是關尹活到八十歲或者列子往前推十、二十歲，兩人都有充足的時間交集。)

二，〈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按此凡百一十八年，汪說誤。〕老子以燕與秦楚並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按此凡七十六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按《文子》所引，未必真為老子語，不足為證。〕（朔雪寒註：錢穆為了消滅老聃不得不直接說《文子》也是偽書。因為如果承認《文子》的話的可信性，錢穆就得面對《文子》為真時帶來的老聃的問題。因此權衡利弊，錢穆當然是直接把這本書當成偽書，說裡面的東西「未必真為老子語，不足為證。」反正，錢穆要瞎掰胡扯，也不差這一條。至於汪中說「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這完全就是不學無術的說法，相關證據可參考〈疑古謬論綜駁·汪中〉。)

三，〈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其死也，無瘞埋之資。」朱為老子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只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按〈楊朱篇〉偽書，非楊子親筆，此論亦不足據。《御覽》四七七又四九三引《列子》，皆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似誤。〕〈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按惠王元年，距孔子之歿百零九年，惠王稱王，距孔子死百四十五年。楊朱亦未必見梁惠王之稱王，汪亦誤。〕（朔雪寒註：錢穆為了保留自己用季梁來拉楊朱年代的謬論，因此選擇放棄汪忠的說法，這已經是第二條放棄了。且錢穆為了下拉楊朱就直接說《列子》〈楊朱篇〉是偽書，那麼試問既然錢穆說〈楊朱篇〉是偽書，不可信。楊

朱跟季梁的事蹟是從〈仲尼〉、〈力命〉來的，因此錢穆把〈楊朱篇〉打成偽書，不會影響到他自己搞出的結論。所以想用的時候就說是真的，對自己不利了就說是假的。這就是疑古派做學問的技術！根據《《老子》成書時間考》考證，則老聃與楊朱的交談是在老聃離開周朝之後，其時間點孔子也還沒死。說兩人是同時人絕無問題。而且就算楊朱與孔子沒有同時，也不妨礙他兩人都是老聃弟子的事實。至於「梁王」的問題請見楊朱篇考證！)

四，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樸子》以為散關，又以為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為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嶠猶為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嶠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瘞。」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按張琦《戰國策釋地》，秦取嶠函在惠王六年至後十一年間。汪說亦誤。〕（朔雪寒註：根據《《老子》成書時間考》考證，則所謂「關」乃是周朝前往鄭國的關，關令尹喜守的關跟函谷關等根本沒關係！而且葛洪的時代離老子已經很遠了，他也只是猜測而已。拿一個魏晉南北朝文人猜測的兩個地點想要去限縮一個作者的時代，不是很可笑嗎？遑論即使是司馬遷關於老子的記載也已經被後人所竄改了呢！詳細考證請參考《《老子》成書時間考》。）

五，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按去文侯之歿已二十三年，《史表》誤。〕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按此在周赧王四十二年，去孔子之歿凡二百零六年〔四七九—二七三〕，汪說錯四年。）則為儋之子無疑。〔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卷四，謂「太史儋見秦獻公，其年周顯王十九年，下距漢文元百七十年。而宗至假凡七世，年數略相當。宗乃儋子，與李耳無涉。」按顯王十九年，已為秦孝公十二年，非獻公，張說誤。至宗為儋子，語亦難信，辨見後第十六節。〕（朔雪寒註：究竟誰說周太史儋姓李、氏老？沒有，誰都沒說過！那麼請問周太史儋憑什麼可以成為家譜的祖先？可以被叫做「老子」？誰曾說過周太史儋寫了《老子》？也沒有！那麼很奇怪的是家譜與著書兩件明明完全獨立的事件，怎麼「證明」了家譜的主人，這李姓主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老氏《老子》的作者了？這其間的邏

輯在哪裡？可是疑古派就是這樣瞎扯淡，然後學界一大堆菁英居然也這樣瞎捧了快一百年！)

今按汪氏五證，雖未全塙，要為千古卓識，可以破孔子見出關著五千言之老子之傳說矣。（朔雪寒註：前面汪中五條，錢穆否認兩條，糾正幾條，然後他還說這叫做「千古卓識」？還可以「破孔子見出關著五千言之老子之傳說矣」。實在看不出究竟哪裡可以破了？不過好歹汪中確實是想要藉由人物的交往，人物所述歷史牽涉到的時間來釐清人物的時間座標。這一點比錢穆確實高明多了！）顧猶多未盡者。余嘗謂老子之偽跡不影，真相不白，則先秦諸子學術思想之系統條貫終不明，其源流派別終無可言。今請詳為申辨。雖若荒誕無稽，然亦足以備一說。上與司馬遷所謂「或曰即老子或曰非也」云云相等例，較之《朱韜》《玉筍》及《神仙傳》諸書，猶且遠勝萬萬也。……

五、環淵即關尹

（朔雪寒註：把這一段整段收錄僅僅因為裡面提到了壺丘、關尹被歸併之事，因此牽涉到本書的其他考證，只好全部收入。）

與詹何齊名者有環淵。其人亦以釣稱。〈史記·孟荀列傳〉云：「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上下篇》。」〈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蜎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環氏出楚環列之尹，後以為氏。楚有賢者環淵，著書《上下篇》。」張澍《輯注》曰：「環淵亦即蜎淵也。隗囂將環安，公孫述將環饒，吳有環濟，著《要略》。」則環乃本字，蜎乃借字。《楚策》范環，〈史記·甘茂傳〉作范蜎，此蜎環相通之證。）《文選》枚乘《七發》：「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釣鉞芳餌，加以詹何、蜎蠃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于玄淵。《七略》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是環淵亦名便蜎，蜎蠃，又名玄淵，亦稱蜎子，與詹何齊名。

（言詹何、便蜎之釣者，《御覽》八三四引宋玉《釣賦》云：「玄淵之釣，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以蛆蠃，鉤以細針，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又《列子》云：「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其語亦正相類。《御覽》七六七引《博物志》，「詹何之釣」云云，語亦大同。）宋玉從之受釣，則其人在頃襄王世，與詹子年亦相接。（朔雪寒註：錢穆在此明明知道〈列子·湯問〉關於詹何的記載是：「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鉤，荊篠

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試問「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這是多麼細小的釣具、釣餌？這跟「任公子為大鉤巨鎗，五十犗以為餌」的巨大釣具、巨大釣餌何止完全相反，甚至相差十萬八千里，所謂「犗」指「閹割去勢的牛」這能跟「剖粒為餌」相提並論嗎？但錢穆卻說：「〈淮南·覽冥訓〉：『詹何之鰲魚於大淵之中』，此即五十犗以為餌之釣也。」錢穆連這麼巨大的差異尚且看不出，還說成是一樣的！這是想唬弄誰？或者真心就是讀不懂古文！至此，讀者當已知詹何之所以能「鰲魚」，其秘訣就在他那細小的釣餌上，而這正好跟任公子的釣餌的「尺寸」天差地遠。）

（今《楚辭》有《卜居》《漁父》兩篇。《卜居》乃屈原問太卜鄭詹尹，竊疑即由詹何誤傳，而漁父亦詹何。以詹何前識，遂誤稱太卜詹尹。以詹何隱於釣，故稱漁父。屈子之所問，與宋玉之所師，其時代固相及。詹子亦楚人，蓋楚人傳說，自有詹何與屈原往復一段情事，後人寄託為文，乃《卜居》與《漁父》並傳也。）所著書，《史記》云《上下篇》，而《漢志》稱十三篇，已不同。至其年世，《史記》與慎到、田駢相次，是謂在齊威、宣王、梁惠王、楚威、懷王時，與莊周、惠施、孟軻相先後。而班固云：「是老子弟子。」詳班氏所稱老子，當指孔子所從問道之周守藏室史而言。則環淵在莊、惠之世，又烏從而師之？（朔雪寒註：錢穆先把春秋末年老聃弟子的楚人蜎淵與戰國末年活躍於齊國稷下學宮的環淵僅因名字上的相似，就硬扯成一人。而不管這兩個人都有各自的著作這一個明顯的事實。然後錢穆在用這個結論質疑一個戰國時人的老師怎麼可能是春秋末年的人？這種水準的東西，在疑古派的論文裡是非常常見的招數。而其證據也仍維持錢穆一貫的水準，就是名字有相近處！所以這兩個人就莫名其妙成了一個人了！）蓋其先言師詹何，則與楚莊王、魏公子牟接世。其後言師老子，則年移而益先。故《文選》枚乘《七發》，應璩《與從弟書》，《注》皆引高誘注《淮南》，謂：「蜎嬛白公時人。」高氏蓋亦謂蜎嬛師老子，則與孔子年相當。以其楚人，故推謂與白公同時爾。〔此猶誤以文子為老子弟子，遂推定為楚平王同時也。關於詹何、環淵年世，又見《考辨》第一四六。〕（朔雪寒註：一四六即「魏牟考」附錄「論詹何、環淵年世」。而其方法就是用兩人名字上的相近處直接歸併兩人為一人！而且高誘怎麼註解的，錢穆怎麼知道？班固、高誘都說老子有弟子蜎淵，而老聃、孔子、白公勝本來就是同一個時間的人。老聃的弟子蜎淵說是白公時人有甚麼問題？高誘難道不能是直接看到《蜎子》上面的內容來說的嗎？而且說文子是楚平王同時人，這本來就是事實。文子是老聃弟子，自然只能跟楚平

王這個平王說話。再者老聃、孔子、楚平王、白公勝（楚平王之孫）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啊！而且為什麼高誘用「白公時人」來註解老聃弟子的時間呢？最大可能就是《蜎子》一書記錄了蜎子與白公勝時人的交談甚至就是與白公勝的交談，因此高誘用白公勝時人來做年代註解。否則其他楚王或者周王的年代難道不更確定嗎？為什麼卻用「白公」來做時間註解呢？）

然漢人雖屢稱環淵，而先秦諸子書，則甚少言及。余又疑環淵即關尹。環關淵尹，特方音之一轉移耳，非有兩人也。（朔雪寒註：如果讀者以為錢穆把蜎淵、環淵歸併就作罷了，那是太小看他了。這不，直接連關尹都扯進來歸併成一人了！）凡先秦之稱關尹，即漢世之所謂環淵矣。〈莊子·天下篇〉以關尹、老聃並稱，（今人范耕研《呂氏春秋補注》〔刊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六年刊》〕謂：「〈史記·老子傳〉，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之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詳《史記》文義，似謂關尹喜聃之見過，非其名為喜也。先秦諸子皆稱關尹，無稱喜者。且亦非聃弟子。《天下篇》列於老子之前，似在師友間。高誘注〈呂氏·審己〉，謂師老子，似是老子師之誤。後人習聞俗說，妄乙之耳。」今按范說極是。（朔雪寒註：讀不懂文言的看來不只錢穆一人，這裡直接把「人名喜」直接當成了「動詞」了！

〈列子·仲尼〉：「關尹喜曰」然後引出的是《關尹子》的內容，「先秦諸子皆稱關尹，無稱喜者。」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說穿了不是沒讀書，就是先把《列子》當成偽書，然後再把它排除在先秦諸子行列，接著又說先秦諸子沒說！這種伎倆在疑古派的謬論中非常常見！）竊意《天下篇》關尹乃人名，非關名。篇中引其書亦先老子，則決不為老子弟子。（朔雪寒註：用一本書的引書先後順序來定兩本書的年代，究竟有什麼效力可言？所以僅僅因為〈莊子·天下〉這篇被疑古派普遍當成不是莊子寫的偽作引用兩本書的順序有先後，於是兩本書的成書時間就定下來了？然後班固、司馬遷等人所說的都不如這個偽作來得可信？而疑古派想要利用時就說偽作可信，不想要利用時就說偽作絕不可信！這種亂七八糟的東西，怎麼就能在精英之中受到追捧呢？所以如果〈莊子·天下〉先提到誰，現實上誰就先出生嗎？這種荒謬透頂的邏輯與所謂的考證，到底要繼續愚弄世人到什麼時候呢！）漢人老子出關，關令尹強之著書之說，其先亦由《天下篇》關尹、老聃兩人並列而起。）（朔雪寒註：證據在哪？意思是老子出關是司馬遷編造的意思嗎？）則猶劉安、枚乘以詹何、便蜎俱舉。蓋以老聃為詹何也。（朔雪寒註：所以老聃莫名其妙僅僅因為有人把「詹何、便蜎俱舉」就變成了「詹何」了？這是何等高超的考證技術啊！這兩件事情究竟有什麼邏輯上的關係？這什麼程度呢？）〔〈呂氏·不二篇〉：老

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竊疑此處先後序列，蓋非《呂》書本真。故以老聃列孔子前，而關尹居墨子後。細玩全文，均以兩人異尚者為一列。如列貴虛，陳貴齊，是一列。陽貴己，孫貴勢，又是一列。王貴先，兒貴後，又是一列。以後例前，則孔貴仁，墨貴廉，為一列，關尹貴清，老耽貴柔，為又一列。如此乃與〈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年輩仍可相通。今以老耽移孔子前，則柔仁相類，廉清相似，既與下文不稱，老耽、關尹年世輩行，亦與《天下篇》乖違矣。故知此經後人妄易也。（朔雪寒註：所以疑古派、錢穆居然硬性規定古人書寫時一定要按照出生順序來寫！這種說法究竟有沒有常識！誰寫文章提到人物一定要時間先後來排呢？如果按照這種邏輯，荀子每次提到鄧析、惠施都是惠施在前，所以表示惠施比鄧析早生？還是表示《荀子》牽涉到的文字都被後人竄改？後人沒事吃飽去改這種東西做什麼？究竟有沒有常識啊！）又本篇此下有脫文，則昔人已論之。又《呂氏》云：「關尹貴清」，殆即環淵著書《上下篇》之宗旨。（朔雪寒註：錢穆看過已經失傳的《上下篇》？）而今〈漢志·蜎子〉十三篇，《關尹子》九篇，豈即《史記》所謂《上下篇》者，而誤分為十三篇與九篇歟？惜其書均佚，無可深論矣。）（朔雪寒註：《關尹子》、《蜎子》、《上下篇》各有作者，篇數都不同。然後錢穆隨便僅用名字上有相近的字這種幾近鬼扯蛋的方式就把三個作者歸併成了一個作者！同時即使另外兩本書已經失傳，《關尹子》卻還存在！結果錢穆當然又把這本書當成了偽書。所以直接說「惜其書均佚，無可深論矣。」拜託！國學大師喔！這種程度喔！這種程度能叫做國學大師喔！）而其故事傳說之流變，則尤有離奇荒誕之甚者。（朔雪寒註：荒誕的難道不是錢穆自己嗎？）夫環淵為沉淪江海之釣客，而關尹則為抱關山谷之官尹，何以謂之為一人？此則猶詹何之蹲釣於會稽，而史儋則騎牛而過關。史儋、詹何既誤混為一，橘渡淮則為枳，隱淪漁釣之處士，自亦可變而為抱關守谷之關尹矣。（朔雪寒註：所以什麼證據都不用？隨便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的意思就對了！）故蜎蠃之蜎非姓也，蜎蠃，子子也。將欲言糲餌之大，而極言其小。如莊生言大魚而舉鯢也。玄淵之淵非名也，淵有九族，皆指水言。玄淵奇蹟，如莊生言畏壘之居大人也。凡此皆俗談小說之引而益遠者。遷《史》博古，故稱環淵，而所得猶未盡，不知環淵之即關尹耳。（朔雪寒註：〈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司馬遷再怎麼愚蠢也不

會把春秋末年的人搞成戰國末年的人。結果錢穆自以為掌握了什麼考證技術，結果只是一路瞎掰胡扯！最後竟然還說司馬遷「不知環淵之即關尹耳」！真是讓人笑掉大牙了！這究竟什麼水準？錢穆怎麼好意思把這種文章拿出來發？）

〔〈莊子·應帝王篇〉有壺子，〈呂覽·下賢篇〉作壺丘子林，〈淮南·精神訓〉作壺子林，《人表》作狐丘子林，皆一人。《韓詩外傳》之有狐丘丈人，亦其人也。然僅觀壺子與狐丘子林，則不辨其為一人矣。僅觀壺子與狐丘丈人，則更不辨其為一人矣。《漢志》道家《蜎子》十三篇下，即《關尹子》十篇。蜎子之與關尹子，正如壺子與狐丘子林及狐丘丈人也。〕（朔雪寒註：原來這就是錢穆把「壺丘」「狐丘」歸併成一個人的證據！也就是說只要古籍傳抄發生點小錯誤，就能拿來當成兩個人就是一個人的主要證據？這是什麼考證？而且錢穆不知道壺子所對談的對象是子產與列子嗎？而狐丘丈人所對談的對象是楚莊王時的孫叔敖嗎？就算狐丘丈人就叫做狐丘子林，就不容許同名人存在了？明明兩件區分明白的事情，錢穆可以這樣瞎搞就歸併成一人！究竟是誰給他這種不怕丟人的勇氣！）今試就其故事之演變論之，則詹何、便蜎之游於釣，與史儋、關尹之過於關，其孰為真，孰為妄乎？曰：論其情則皆妄也。

（朔雪寒註：所以錢穆到這裡還不收手啊！不僅要把春秋末年的老聃弟子一次性消滅，還要說這些人的事蹟都不可信啊！）詹之入秦，曰：「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離字本作合，據王念孫《讀書雜誌》改。七十年依梁氏《志疑》所定。〕此秦人有天下之神識也。關尹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此又無稽之妄譚也。（朔雪寒註：司馬遷什麼時候說關尹能相風角了？）其書既佚無可考。〔《漢志》所載，或出漢初人依託，今本則為唐宋間物。〕而史儋、關尹之故事，則必妄可知。至於詹何、便蜎，其事荒晦，非可以作信史。故曰論其情則皆虛也，皆世俗之傳說也。然則此傳說之起，以詹何、便蜎為先歟，抑史儋、關尹為始歟？曰：此則更不可以確論。夫語及於史儋、關尹、詹何、便蜎之事，固以自古多妄，荒渺難稽矣，又何從而必為之明據確說哉？而孔子之見老子，則古籍記載較詳，固可爬梳抉剔，以略得其真相者。蓋孔子所見之老子，其始為南方一隱君子，漸變而為北方之王官，一也。（朔雪寒註：錢穆繼續玩弄倒因為果的招數！）孔子之見老聃，其先為草野之偶值，漸變而為請於國君，以車馬赴天子之朝，而北面正弟子之禮，以執經而問道，二也。（朔雪寒註：試問如何漸變？記載這些事蹟的那些書的先後順序都已經確定無疑了嗎？）其先為老死而友人哭，漸變而為莫知其所終，三也。（朔雪寒註：僅有這一點勉強矇對。老聃之死確實是可知之事，是後人為了神話老聃，所以竄改了《史記》的相關部分。詳細考證請參考《《老子》成書時間考》。）何以攀

老子為王官，則以誤於太史儋。何以謂關令尹強之著書，則以誤於詹何、環淵。蓋詹何、環淵之隱於釣，有其事未必有其技。太史儋之過關尹，則有其名未必有其人。〔凡《莊子》《呂氏》言關尹，皆人名，非官名，而其人尚在後，與太史儋不同時。〕孔子之見老聃，雖有其人，而其事則未必有如後世之所傳也。（朔雪寒註：所以反正如果不能把老聃徹底消滅，把老聃的事蹟都說成假的也是可以的。這就是錢穆的盤算！）

六、涓子即環淵

余考環淵之事，猶有說者。環淵既稱涓子，亦作涓子。《御覽》八三四又七三六。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釣於澤，得符於鯉魚腸中。」又九三六引《列仙傳》云：「涓子，齊人也，好餌術，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鯉魚腹中符，隱於岩山，能致風雨。」〔《水經·睢水注》：芒碭二縣之間，山澤深固，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並隱碭山得道。疑《列仙傳》岩山，實宕山字訛，宕山即碭山也。其地初屬宋，後入楚，故涓子亦云楚人。《列仙傳》又云：陵陽子明，銓鄉人。釣於澁溪，得白魚腹中書，教服食之法，三年，龍來迎去。莊周之蒙邑，老子之瀨鄉，彭城之彭祖，皆在梁宋間，此蓋道術長生之說所自起。後遂與燕齊方士神仙合流。至《淮南》著書，仍近道術長生誕始之故地也。〕又六七〇引《集仙錄》云：「涓子，齊人也，餌術，著《三才經》。淮南王劉安得其文，不解其旨。又著《琴書》二篇，甚有條理。」據此諸書，則涓子傳說，又有可得而論者。蓋其初本以涓子為楚人，其後乃以涓子為齊人也。云「三百年乃見於齊」，則亦謂其初非齊人矣。初為釣者，後為仙人，乃謂其得鯉魚腸中符。《御覽》九三六又引《列仙傳》云：「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是傳說之流播而至燕也。此以涓、彭連稱，則涓子亦大年，猶詹何為老聃，亦大年也。《高士傳》稱：「涓子告伯陽九仙法」，後世即以伯陽指老子，則涓子乃為老氏師，與云環淵為老子弟子者，適相反矣。（朔雪寒註：錢穆不僅顛倒人的家譜，連師承關係都要顛倒，以此來證明自己的高見卓識！而實則看看錢穆引的書有哪一本不是疑古派認定的偽書？連《列仙傳》都能拿來扯，把史料與小說混為一談！這樣都能被稱為史學四大家！這名號也真的是不值錢啊！）《御覽》九三五引《符子》：「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六年，未嘗得一魚。魯連聞而觀焉，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摧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是涓子亦稱太公涓，猶

如任公子稱太公任。下及魯連，則固晚世齊人之說也。（朔雪寒註：所以這時候魯仲連時候的太公涓也被歸併到環淵身上了！這種隨意的瞎扯淡，連不入流小說的不入流情節都還遠遠不如啊！）

余考楚自頃襄王二十一年東遷郢陳，其時齊已滅宋。而淮北入於楚。東楚之於南齊，壤地密接。詹何、環淵在是時，謂為楚人者，殆即郢陳東楚。故詹何稱蹲釣會稽，而環淵之列齊稷下。其後漢代辭賦，吳、梁啟先，淮南翼後，皆當陳楚之地。而神仙黃老，齊楚同風，正自詹何、環淵之徒始耳。

小結

所以看完這兩篇，讀者能理解錢穆「國學大師」稱號的由來嗎？能理解錢穆「史學四大家」稱號的由來嗎？原來這種程度都能成為大師、大家啊！

那麼錢穆在短短兩篇裡面幹了什麼事？全部用荒唐無稽的名字上的相似處，直接否定所有有明確記載的人、事、物。所以春秋末年老聃的弟子蜎淵、老聃弟子關尹子、列子的師傅關尹子，都被歸併到戰國末年環淵身上。其目的就是把老聃弟子消滅掉。這樣老聃就算存在，也沒什麼歷史可言了！

消滅老聃弟子只是次要的，重要的就是把老聃給消滅掉。所以春秋末年老子老聃，又被歸併到一個會釣魚的詹何身上，而根據〈列子·說符〉：「楚莊王問詹何」，那麼詹何根本就是楚莊王時人，結果錢穆這樣一路瞎搞，把楚莊王的詹何、春秋末年孔子老師老聃、戰國初期周太史儋全部歸併成周太史儋，然後這也還不滿意！還要說這些人的事蹟都不可信！至於什麼叫做邏輯與證據、什麼叫做推理！錢穆都不知道！

而且不要說楚莊王時的詹何跟孔子老師老聃的年代有點距離，就是老聃跟周太史儋的活躍時間也相差一百年左右。而且根據〈史記·周本紀〉則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在周烈王二年即前 374 年，請問他要怎麼去收環淵當弟子？這年紀差距要不要解釋一下？

接著錢穆又隨意的把列子的另外一位師父「壺丘子」年代上提與孫叔敖交談的「狐丘丈人」歸併，理由竟然是因為班固在〈漢書·古今人表〉把「狐丘子林」擺在子張、曾子附近！請問誰是「狐丘子林」？說白點，這個「狐丘子林」如果按照年表的排法就根本不是與孫叔敖交談的「狐丘丈人」啊！只是這裡我們已經不想針對這種胡說八道繼續深究了！而且「狐丘子林」也可以是班固誤寫或者傳抄失誤啊！怎麼就能變成跟孫叔敖交談的「狐丘子林」就是子產的老師「壺丘子」了呢？這擺設的位置不就錯了嗎？擺設的位子究竟跟與孫叔敖交談的「狐丘丈人」有什麼關係？然後一大堆沒關係的東西就這樣被牽強的

胡扯在一起，然後居然就說這叫做證據，這叫做考證，這究竟是在考證個什麼玩意啊？這到底有什麼水準可言啊！這就是國學大師、史學四大家的程度喔！是要笑死人還是怎樣！

道德經論正相關考證

錢穆《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

（十九，十二，燕京學報第八冊）

《老子》乃晚出之書，此可于各方面證成其說。此篇特其一端，自哲學思想之系統立論，說明《老子》書出《莊子》內篇七篇之後。稿成於民國十二年·夏秋之間。當時本擬博綜諸端，草為《老子辨偽》一書。單篇孤義，藏之篋衍，未以示人。頃既書成無日，而于老出莊後之意則信之益堅，爰先發表陳文，以求通人之教益焉。

大凡一學術之興起，必有其中心思想所在。而此中心思想者，對於其最近較前有力之思想，或為承受而闡發，或為反抗而排擊，必有歷史上之跡象可求。《老子》一書，開宗明義，其所論者，曰「道」、曰「名」。今即此二字，就其思想之系統而探索其前後遞嬗轉變之線索，亦未始不足以考察其成書之年代。且一思想之傳布，必有所藉以發表其思想之工具，如其書中所用主要之術語，與其著書之體裁與作風，亦皆不能逃脫時代之背景，則亦足為考定書籍出世年代之一助也。

甲（道）

今按《老子》「道」字有主要之涵義，即道乃萬有之始，雖天地上帝，從來認為萬物之所從出者，《老子》亦謂其乃由道所生，此乃《老子》學說至堪注意之處也。如云：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四章）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十六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二十八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八章）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三十四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衛氣以為和。（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五十一章）

上引七章，可見《老子》書中道字之觀念，實《老子》一書中心思想之所寄也。今尋《論語》言道，僅指人事，與《老子》之道絕不相類。《墨子》言義不言道。孔、墨均淺近，而老獨深遠。孔墨均質實，而老獨玄妙。以思想之進程言，《老子》斷當在孔、墨之後，已無待煩論。（朔雪寒註：疑古考證到此，已經登峰造極！無待煩論了！原來證明一件事竟是如此容易的事情！完全不用證明就證明了！按照錢穆這種邏輯，人還有所謂思考自由可言嗎？豈不可笑！）至於《莊子》論道，乃與老有同樣之見解。其言曰：

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師）

此亦謂道先天地而生也。然內篇七篇言道先天地，惟此一節。其他言道，如「道不欲雜」：「惟道集虛」：「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凡諸道字，皆與《論語》素樸之義為近，與《老子》深玄之旨為遠。則莊生言道，明為孔墨與《老子》之過渡。雖有道生天地之說：而持之未堅，廓之未暢，尤未成為確定之觀念。至於《老子》書，乃始發揮光大，卓然成一家之說也。而《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語尤明承《莊子》而起。（朔雪寒註：按照這種說法，《孫子兵法》以後的兵法其境界都應該超越《孫子兵法》，但事實上不僅中國古書絕無此例，放諸四海，西方經典自是經典，能超越經典者究竟有幾個？）《莊子》之言曰：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盤星之是非。……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齊物論）

又曰：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恢詭矯怪，道通為一。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

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此皆以道與言辯并稱，即《老子》道名並提之所本也。（朔雪寒註：完全不需要任何證明！）《莊子》之意，在破儒墨是非之辯。儒墨之羣言淆亂，皆所以爭道之是非，故《莊子》論之如此。其間先後脈絡淵源，明白無疑。（朔雪寒註：不知哪裡明白了！）調老在莊後，其說自順。調老居莊先，則其義自逆。即此以觀，《老子》書成之年代，居然可見。（朔雪寒註：考證技術莫大之進步！）今更據上引《老子》論「道」各節，擇其與「道」字相牽涉諸名詞，如「帝」「天」「地」「物」「大」「一」「陰陽」「氣」「德」「自然」「象」「法」之類，一一追溯其思想上之來源，以證成吾說如次：

（1）帝

帝字見於《詩》、《書》、左氏內外傳，皆指上帝。《論語》不言上帝，其言天即帝也。《墨子》亦常言天。獨〈貴義〉篇：「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色黑，不可以北。』」，乃用帝字。此言墨子不信日者，非不信帝也。《論語》、《墨子》均不言先天有道，即不知《老子》「道為帝先」之說也。（朔雪寒註：毫無邏輯素養可言！）〈易·說卦傳〉：「帝出乎震」，帝有所出，乃與老似，則以〈說卦〉較《老子》晚出也。何以不謂《老子》襲〈說卦〉，而謂〈說卦〉晚出於《老子》？則以《老子》「道為帝先」之論，於其書中，有精密之組織，有一貫之精神，為全書之創見，非可以外襲（朔雪寒註：荒謬！），至於〈說卦〉帝出於震之說，若以孔子語，則與《論語》思想不符，謂非出孔子，則其思想之規模，條理及組織，盛大精密，皆遜《老子》。故謂其書出《老子》後，襲《老子》語也。以下推斷率仿此。《墨子》而下，論及帝字者有《莊子》（篇中引《莊》僅限內篇，外、雜諸篇多出莊後，不盡可據也。）。其言曰：「古者謂是帝之縣解」，猶是常義。至云：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應帝王）

則言帝有生死，遠異在昔。《詩》、《書》勿論已。以《論語》、《墨子》言，《論語》言天命，《墨子》言天志，皆謂道本乎天。莊生之意，則謂雖帝亦制乎道，故得道則生，違道則死。帝有生死，則帝亦一物，此所謂「天地尚不能久」者也。其尤明顯者，則曰：「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謂鬼神、上帝皆得道而乃神，則神不在帝而在道，道在帝先也。此明與《老子》似。故知老、莊實較為同時之產物，以其思想上之態度，及其發表之形式，即其所用之術語，皆相近似故也。以思想發展之進程言（朔雪寒註：請問進程的

規律從何而來？），則孔、墨當在前，老、莊當在後。否則老已先發「道為帝先」之論，孔墨不應重為天命、天志之說。（朔雪寒註：按照這種荒謬邏輯，所以前人說過什麼話，後人若不遵循，後人就不是人？或者，後人若不遵循，則前人便不是人？果真如此《老子》如何「後出轉精」？錢穆豈非自相矛盾！但錢穆自相矛盾的功力卻是疑古派中無人可及的！）何者？思想上之線索不如此也。

（2）天

《論語》言天字者十餘見，皆為一理想上有意志、有人格、有作為之上帝。孔學重知天命，墨子亦然，常以尊天、事鬼為是，詬天、侮鬼為非，其學說行事，自謂一本天志。孟子亦稱知天、事天。雖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之為正謂天為之，莫之致正謂天命之，非自然之謂。至《莊子》言天，其義乃大變。其論天籟曰：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齊物論）

曰自已，曰自取，始以自然言天。自然者，謂非冥冥之中別有一天以使之然也。《老子》言天，亦本自然為說，與莊同，與孔、墨、孟異。今使《老子》言自然之天在前，孔、墨、孟重言神道之天在中，而《莊子》返言自然之天在後，則思想上之線索，有難言矣。故我謂莊、老較為同時，同出孔、墨、孟之後也。（朔雪寒註：錢穆竟不知莊子與孟子同時？不知惠施與孟子皆見過梁惠王？尚未定出莊子與孟子的時代先後，就大作文章！豈不可悲！當然，錢穆寫了《先秦諸子繫年》哪有不知先後的道理？問題在於先後是如何定出的？）今試再將莊、老兩家論天之言細為比較，則知《老子》猶在《莊子》後。何則？《莊子》重言天，故曰：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齊物論）

依乎天理。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是遯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養生主）

按：遯天謂違自然，倍情謂背道。情即道有情有信之情。

渺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瞢乎大哉獨成其天。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烏得不謂之人。（德充符）

按：此道與天互言之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按：此亦道與天互言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大宗師）
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應帝王）

故荀子評之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解蔽）。蓋《莊子》之意，猶若有合乎天者謂之道之一種觀念存其胸中，雖其對於天之意義已無舊時神道的之臭味，而其尊天之論，無形中尚受舊說之束縛而不自覺也。至《老子》乃捨天而言道，曰：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二十一章）

不道早已。（三十三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譬道之於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三十二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三十七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夫唯道善貸且成。（四十一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四十八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五十一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五十三章）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六十章）

按：此即《莊子》神鬼、神帝之意也。（朔雪寒註：荒謬可笑！）

道者萬物之奧。（六十二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六十七章）

可見《老子》道字之地位實較《莊子》七篇為遠過。故曰：「天乃道」，曰「天法道」，加道於天字之上，可證《老子》書較《莊子》七篇為晚出也。
（朔雪寒註：即便道字地位較高，何以就必然可以導出晚出的結論。錢穆文章大多如此隨意論定。其實如果不是人給的名氣太響、學者互相吹捧上了天，以至於產生了龐大而荒謬的影響力，連批評的價值都沒有。）不然，《老子》先

分言之，明明道尊於天者，《莊子》復混言之，而調合乎天乃道，亦非學術思想層累前進之象也。（朔雪寒註：按照這種邏輯，試問《老子》之後，誰超越了他？《孫子兵法》之後，誰超越了他？孔子之後，誰超越了他？）故在《莊子》時，天之意義已變，而在《老子》時，天之地位乃降。即此可以推斷莊老之先後也。

（3）地

《論語》、《墨子》僅言天，而不言天地。何者？天為上帝，地不得配言也。《莊子》則言天地。何者？天乃萬物自然之總名，否則亦塊然之一物，已無至高無上唯一獨尊之勢也。故曰：「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逍遙遊）。曰：「地籟天籟」。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齊物論）。曰：「官天地，府萬物」。曰：「吾以夫子為天地」（德充符）。曰：「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曰：「生天生地。」曰：「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曰：「狶韋氏得之以絜天地。」曰：「以天地為大鑪，造化為大冶。」曰：「遊乎天地之一氣。」（大宗師）曰：「吾示之以地文天壤。」（應帝王），皆以天地並言。天地並言，是天之意義變而地位降也。（朔雪寒註：荒謬可笑的說法！〈禮記·哀公問〉孔子屢言天地、〈墨子·非攻下〉墨子也說天地，錢穆不知乎？錢穆不讀書一至於此乎？至於其他更多的例子就不再繁引了。相關例子可見：〈禮記·哀公問〉：「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墨子·非攻下〉：「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老子》亦然，曰：「天地不仁，以造物為芻狗。」（五章）。

「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六章）。「天長地久」（七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十五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三十二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三十九章）。亦皆天地並言。而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天地猶若有等級焉。此蓋既合言之，而復析言之，然而天字之地位益不可復其舊矣。《中庸》亦每以天地並言，而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後人偽書也。（朔雪寒註：不用證據了！開始排除不利證據了！排除的方法就是一句「此後人偽書也」，乾淨俐落，不用證明了！）盡性襲孟子，參贊天地則襲莊老。何以謂盡性襲孟子？孟子道性善，故曰盡性。然孟子言人之性善，異於物性，故不言盡物性也。《中庸》推盡人性而至盡物性，已非孟子本意，故不得謂孟子承子思之言，而知是後人層累孟子之言以為言也。（朔雪寒註：隨意性結論！）何以謂天地竝言襲莊、老？其曰「天命之謂性」，曰「鬼神之為德」，曰「郊社以事上帝」，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知為《中庸》者本言昭赫之上帝。其言天地，亦指能化育萬物者而言，與莊、老自然之天地不同。是乃襲用莊老天地之文，而重以孔、墨之神道粉飾之也。（朔雪寒註：所以不同就是襲用+粉飾的結果！真是驚人的考證與論斷！所以所有用天地概念的人都不是用天地本來所指涉的概念，而必然要得襲用自誰？從誰那裡粉飾而來？這種違背常識的荒謬論斷，哪怕小朋友都不能同意！但當代的許多大學者卻居然同意了！豈不可悲！）且曰「參天地」，則以人助天，以儒附道，明為後人兼採兩家之說而累言之矣。

（朔雪寒註：錢穆的所有論斷率皆如此隨意、如此違背常識！簡直荒謬已極！）其曰「可離非道也」，與孔子「何莫由斯道也」異。其曰「道者自道也」，與孔子「道之將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異。豈有子思於其親祖父之學而已大相乖戾至此者？（朔雪寒註：所以人的創造性該完全被消滅？從錢穆這裡的說法，可以看出其實他對於子思的理解、思想來源局限於被他定為偽書的《中庸》，這種荒謬性不言可喻啊！且子思曾經解釋過他與孔子的差異所在！這一點如果錢穆看過或相信，估計不會有這段謬論了！）且此皆道家之精言，故知非道家之襲《中庸》，乃《中庸》之襲道家也。凡學說之首創必精闢，其後承乃博綜，烏得子思先綜述率性為道之理於前，而後孟子專闡性善，《莊子》特發道體於後？此亦於思想之系統有不然矣。（朔雪寒註：這些說法完全沒有任何根據！邏輯上完全不能成立！而且究竟思想系統從何而來，錢穆完全不需要解釋，彷彿那是人的基本常識！這樣的考證文章連水準都稱不上！）〈易·繫辭〉天地人三才之說，亦與《中庸》參天地同例，皆儒道兩家雜糅之言，在莊、老之後也。（朔雪寒註：按照錢穆的說法，老在莊後，那麼試問老之後還有多少時間讓多少學者得以在先秦時期把所有文章補足？豈不可笑！）

（4）物

《論語》不言物。何者？物與心對言，孔子僅論人事未及心物之問題也。墨經有之，曰：

（經上）知，接也。

（說）知，知也者，以其知遇物而能貌之，若見。

（經上）恕，明也。

（說）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

（經上）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

此言知而遂及物也。其討論之重心在知識，不在物質。又曰：

（經說下）物盡異，大小也。

（經下）物盡同名。

（經下）數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此論名實異同而遂及物也。其討論之重心在名實之異同而不在物質。大率墨經論物，盡此二途。至孟子倡性善，常言反求本心，而以心之陷溺放失歸罪於物欲，於是心物遂漸立於對等之地位，而成為學術上一討論之問題，故曰：

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是孟子雖言外物，而其討論之態度亦復傾向於內心，不以物質為注意之一問題也。至《莊子》出，乃始於外物一面，進而觀察其本質與真相。（**朔雪寒註：彷彿孟子先於莊子而非同時人已經是一個定論了！**）大率《莊子》論物，有如下之四義：

A 討論物之來源者

自來言物源，均歸諸天帝之創造。（**朔雪寒註：請問中國古籍誰說天帝造物？**）莊周獨加非難，謂物皆無待而自然。其言曰：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善乎郭象之言曰：「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造物無主，乃莊學一大發明，前此無有也。（**朔雪寒註：莊學不能等同於莊子，郭象更不能代表莊子，這「似乎」也是一個基本常識。**）然一學說之興也，必有其背景焉，必有其動機焉。今莊生於數千年前舉世共信上帝造物之時，（**朔雪寒註：此又驚天之論！**）而獨創此可驚之偉論，（**朔雪寒註：這才是驚天之論！**）則試問其背景何在，動機何在？蓋莊生之時正儒墨爭辯甚烈之時也。其時學者莫不欲得一是非之標準，以為依歸。而其標準，則莫不求之於冥冥之上帝。蓋欲爭事物之是非，不得不推尋事物之根源，則上帝是已。（**朔雪寒註：自己編、自己掰、自己謊、自己扯！**）如曰：「天生下民，

有物有則」、「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非古人以上帝為事物是非最後標準之所在乎？故《墨子》言天志。其言曰：

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天志上）

此為墨家以天志為自己學派辯護之確證。至於儒家亦莫不然。請證之於孟子。其言曰：

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離婁上）

此儒家以堯舜為是非之標準，即以聖人為是非之標準也。而推究之，則亦以天為是非之標準。何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曰：「聖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耳」。人之性善，乃天所與，而聖人堯舜不過性善之實證也。故墨者夷之見孟子，孟子告之以人之葬其親，由於中心之不獲已。又謂儒者一本，而墨二本。一本者，謂標準之不二也。《莊子》對於儒、墨之辯，極欲有所判定，而覺其雙方各執一見，各有是非，定讞難成，於是激而為斬根塞源之論，以為萬物本非天造，則是非亦無一定。（朔雪寒註：繼續編、繼續拚、繼續謗、繼續扯。）故曰：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齊物論）

蓋儒墨之爭，其勢必均推極於造物之天。《莊子》乃曰天亦一物耳，非能造物者。非有能造物之天，即無超出物外為萬物最後是非之標準。（朔雪寒註：毫無邏輯素養可言！）故《莊子》言道，言自然，則昔人以天為一切是非之標準者自破，此乃莊生自然論之所由起也。

B 討論物之情狀者

夫討論是非，一方必求其有外界一定之標準，如儒墨之言天是也。而一方又必有其內部相當之識力，於是知識之評價尚焉。然知識之可恃，乃在外物之有常。莊生則力破其說曰：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齊物論）

此莊生言外物時化，不居常境，故人類當前之知識，亦復不足恃也。知識不足恃，則是非亦不足辯矣。故曰：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C 討論物之法則者

物既自然非天造，則無所謂天秩、天序、天衷、天則之類矣，（**朔雪寒註：這無非是在告訴大家一個違背常識的說法，也就是自然界沒有規律、沒有秩序可言！**）而又時化不居，則又無所用物質物體之名矣，然則物固尚有法則可求乎？曰有之，既此自然之時化是也。此自然之時化，莊生名之曰道，亦曰天。故其言曰：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莊生既言知之不足恃，而此則又言其無所用也。

D 討論對物之應付者

外物之真相既變動不居，我之知識又不可恃而無所用，莊生乃謂應付外物之方法，在乎一順其自然而時化，而人之私智小慧無與焉。故曰：

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又曰：

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按此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旨也。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孰肯以物為事？

此莊生應付外物之態度也。故曰：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此莊生對於物字之觀念也。我所以不憚詳引，條分縷析以著之者，凡以見《莊子》之言，乃係對當時儒墨是非之辯而起，其思想上確有其背景，確有其動機，一一皆可指證，而非漫無來歷，偶然而云也。繼此請言老。

老之言物，有與莊同，有與莊異。同者在論物之來源，老之言曰：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一章）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四十章）

萬物生於無，明其非生於天也。（朔雪寒註：無法導出這種結論！）然《莊子》僅言萬物之無待於天，非確言萬物之創生於無，則莊、老雖同而不同也（此層詳後有無一節）。其與莊異者，在論物之情狀，與其應物之態度。其言曰：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此一節，《老子》論物之情狀與其應物之態度者，至明且盡。莊生僅言物化，而《老子》則進一層言之，以謂物之化常循環而反復，故雖化而實靜，雖變而實常。（按莊生雖有「不與物遷而守其宗，死生命也，夜旦之常天也。」之語，要僅足為《老子》之暗示，不如老子之明晰。）

又曰：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十四章）

故曰：

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二十五章）

反者道之動。（四十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五十二章）

是《老子》於物之自然而時化之中，籀得一至大之公例。萬物變而公例則常，萬物動而公例則靜。此公例維何？道之於萬物，為其母，為其根，為其命。故曰：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三十二章）

又曰：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三十七章）

此又莊老一絕異之點也。莊之於人言神人、真人，其於物言物不能傷，物無害者，而老於人則言侯王，於物則言御，言鎮，言以為芻狗。莊生雖有〈應帝王〉之篇，然其意常在退避，不若老之超然燕處，而有取天下之志。故《莊子》之於儒墨是非之爭辯而發，以反抗懷疑消極破壞者居多。《老子》之論，則繼《莊子》而言，以承續肯定積極建設者為多。以此判之，亦見老之後於莊也。（朔雪寒註：一大堆沒有根據的說法！通篇毫無價值可言！且錢穆既然主

張老子在莊子之後，而主張《老子》是戰國時代的產物，試問這時候的莊子怎麼就沒有「取天下」之志了，這不是整個疑古派包含錢穆自己所主張老子、

《老子》晚出的重要證據嗎？怎麼身處戰國中期的莊子可以例外呢？孟子難道不談取天下？錢穆究竟讀不讀書！)

(5) 大

大，形容詞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惟堯則之。」。於文，一大為天，亦言惟天為大也。至《老子》則名道為大（朔雪寒註：老子不是說：「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嗎？），此亦有所本，本諸《莊子》。

《莊子》鑒於儒墨之辯是非，各守一先生之言，顛顛焉自以謂莫吾易，故慨乎言之，（朔雪寒註：繼續掰！全然都是掰！可寫小說，不能寫考證文章。）

曰：「道隱於小成」、「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鵠鵬之與斥鷃學鳩，何以相笑？曰以不相知。鯪援猴麋鹿螂且鴟鴞之於民，何以相非？曰以不相知。故莊生言大，所以破己執。己執破，則儒墨是非之辯息。故莊生言大知，以明彼我也，言大道以和是非也。其意皆有所激。至《老子》道大之言，特承莊為虛美之詞耳。即此可以證莊老之先後也。（朔雪寒註：疑古技術大進步！)

(6) 一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非道也。《老子》則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道以後萬物以前之一二三者為何物乎？求其解則在《莊子》。《莊子》之言曰：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解之曰：

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

象之言可謂妙得莊旨矣。故莊之所謂一二三者，名言之謂也，非實有其物也。墨經有之：

（經上）言出舉也。

（說）言，言也者，口能之出名者也。

言以出名，則名言為二也。且所謂萬物為一者，此非莊生之言也，其友惠施言之也。惠施歷物之意，而曰「萬物一體」。惠施，墨者徒也，言兼愛，故言一體。一體之說，本諸墨經：

（經下）數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說）數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一。

此萬物一體之論所從出也。初不過辯名實之異同，如言一足，則三足在外；言一牛，則四足皆舉，而馬猶在外；曰一物，則牛馬同等矣。惠施引伸為大一小一、畢同畢異之論，遂曰：「萬物一體」。故當兼愛。不知萬物一體，原出名言，即言以求，一已成三，豈能一天下之言，使盡一於我哉？此莊生所以欲以忘言齊物論也。則莊生一二三之言，豈不確有根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至《老子》書已不辨斯義（朔雪寒註：一方面說老子超越莊子因此應該在其後，一方面又說老子不能明白莊子高妙的意思！簡直可笑！），漫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不知一二三是名言，萬物是實體，實體烏得自名言中生？（王弼注亦知一二三是名言，然不能發明名言生實物之理也。）又曰：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王弼之注曰：

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

彼不知數是名言，物是實體，數終不足以生物。數之始，終不足以為物之極也。《老子》之言，蓋即以指道耳。《莊子》所謂「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云云者，而《老子》襲取以為言也。《老子》又曰：「載營魄抱一」，一亦是道。蓋老子既曰道生一，而又即以一稱道也。今以《老子》之一追溯至於《莊子》之一，以《莊子》之一，又追溯至於惠子之一，以惠子之一，又推溯至於墨經之一，則脈絡分明，路逕宛然，皆可指證。

（朔雪寒註：所以莊子與惠施為友，竟莫名其妙的繼承了惠施的思想？莊子與惠施辯論取勝，卻被其思想洗腦？）使謂《老子》於《莊子》前先已有「道生

一，一生二」之說，則請問此一二之數果何指者？（朔雪寒註：既然連書都讀不懂，何以有膽來寫考證？）

（7）陰陽、氣

然莊生亦自持萬物一體之論，特與惠施之論不同。（朔雪寒註：一說脈絡可循，現在又不同了！）惠施以名數言，《莊子》取其意而變其說，遂以實體言。曰：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朔雪寒註：這明是莊子引孔子的話，怎麼不說？）

其所以一萬物者何在乎？曰氣。故曰：

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天地萬物皆一氣之自然而時化，故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萬物，託於同體。

造物之以予為此拘拘也，浸假而可以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左臂以為鷄，尻以為輪，神以為馬，為鼠肝，為蟲臂，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於是言六氣（御六氣之辨），言陰陽（必有陰陽之患），至《老子》遂云：「萬物抱陰而負陽，沖氣以為和」。此以前孔、墨、孟子都未之言（朔雪寒註：所以按照這種邏輯，以前的人沒說過，以後便說不出，那麼是誰說了那第一句話，或者是誰說了全部的話！），其後〈易·繫辭〉出，乃汲莊老陰陽之流而發揮之，成一系統之學說。其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云者，即模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言之也。（朔雪寒註：這種東西也需要模仿嗎？這種東西就不能自己說出來嗎？）使老子、孔子本已言陰陽於前，則墨家亦何愚而倡名數的萬物一體論於後哉？（朔雪寒註：按照這種說法，這種荒謬可笑、無稽可悲的邏輯，那麼何以墨子要節葬、兼愛，要跟孔子唱反調！）

（8）德

《莊子》內篇僅言德，不及性，《老子》亦然，此莊老之所由與儒家異。然《莊子》以道與言對稱，《老子》以道與名對稱。至於德字，在《莊子》內篇中似不佔重要之地位，至《老子》有「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與「道生德育，尊道貴德」之言，而後道德乃若有對等之位置。（朔雪寒：不學無術的最佳寫照！連孔子、孟子也談道德，僅舉幾例如下：〈荀子·宥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

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涸盡，似道。』」、〈說苑·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孟子·離婁上〉：「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試問錢穆究竟是怎麼讀書的？）《莊子》外篇時有道德并舉為一句詞者，則其書又出《老子》後，非《莊子》之真也。（朔雪寒註：全篇無非隨意論斷！一點價值都沒有！凡是不符合錢穆主觀臆測的說法的，就可以一句話定為後出！像這種毫無價值的「考證文章」是怎麼取得學界共識的！難道不是該成為一個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嗎？）

（9）有無

孔、墨、孟子皆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自莊、老發生萬物起源之問題始。然《莊子》言有無，亦與老微有不同。《莊子》之言曰：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此所謂未始有物者，與無不同。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道通馬一，無彼與是，故曰未始有物也。莊生特於萬類紛然之中，見其同，見其化，不認有彼是之分別耳。非追論在萬物之先，更有未始有物之一境界也。莊生又言之，曰：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此始以有無對言。然所謂有無者，僅言有謂之與無謂，非論有物與無物也。故莊子並不遠論物始，僅就物之彼我封界名言有無之間，辯其虛實。有無兩字，在莊書尚未成為確然對立之兩名詞。故《莊子》書中屢言無有，曰：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

又曰：

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

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

足證《莊子》書中於無字尚未定為特殊之一名。至《老子》則不然，乃始確然以有無兩字對立，成為有特殊意義之兩名。故曰：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於是無之一名，確然為天地之所自始，為萬物之所從生；此在莊時並無其說也。以無之一名之確立，足證《老子》書成在莊周之後矣。（朔雪寒註：把一般人常用的概念，炮製成專有、專用之物已屬匪夷所思的作法，如今「有無」對立本來就是基本概念中便已經存在的事實，而錢穆似乎連這點常識都不具備！按照這種邏輯，《老子》一書中甚至《孫子兵法》、《周易》三書中所有對反的概念，都能從那些不講對反的書中找到祖宗了！豈不荒謬可笑！）

（10）自然

《莊子》雖創自然之論，而自然一名詞之地位猶未確定。（朔雪寒註：按照這種說法，發明「自然」這個概念的人不知道有沒有解釋什麼叫做自然？不然一般民眾怎麼知道什麼叫做自然？簡直可悲！但這跟錢穆主張「仁義」可當證據的邏輯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可悲！）故曰「咸其自取」，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曰「因其固然」，曰「自本自根」，皆自然也。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內篇自然二字僅此再見，可證《莊子》未嘗確立自然為一名詞也。至《老子》始曰「道法自然」，又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百姓皆謂吾自然」，曰「希言自然」，自然二字乃確然成為一名詞，（朔雪寒註：由此看來，錢穆讀不懂莊子與老子的自然。且孔子也屢次言及自然，僅舉幾例如下：〈孔子家語·五儀解〉：「哀公問於孔子曰：……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孔子家語·郊問〉：「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新書·保傳〉：「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試問：錢穆究竟讀不讀書。）而佔重要之地位。此又可以證吾莊先老後之說也。至《莊子》外篇言自然者乃出老後。（朔雪寒註：於是這裡只要不符合錢穆說法的，都可以隨便指稱其先後產生順序了！這樣的「考證」除了讓人吃驚以外，大概也只能令人無言以對了吧！）

（11）象

象字古人用者極少，《莊子》僅云「寓六骸，象耳目」。至《老子》乃好用象字。如云：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又云：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十四章）

大象無形。（四十一章）

執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

於是象字始有神秘之價值。其後〈繫辭〉好言象，而曰「易者象也」，乃有大象傳，亦受《老子》之暗示而為之者。（朔雪寒註：全篇無非如此瞎掰胡說！至於證據！只能用抱歉兩個字代替！從這裡又可以看出錢穆讀不懂莊子的象跟老子的象。）

以上論有無，論自然，論象，均見凡此諸語，在莊書僅義取達旨，乃臨文遣辭之恒規，在老書則若特鑄專名，以稱妙理，乃成一固定之術語。如此之類，尚不乏例。如莊言：「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又曰：「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皆不過形容道體之語。

《老子》則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以精信連文，即猶《莊子》之情信連文也。云「道有精有信」，即猶《莊子》之謂「道有情有信」也。惟老則肯定其辭，曰「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則若實有精信其物，為一特定之專名，與莊書之僅以形容道體者不同也。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凡此諸名，曰夷，曰希，曰微，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曰惚恍，其實皆即莊書所謂道之無形也。又曰「大象無形」，是明承無形之意而特鑄大象之一名。至於無為二字，尤常見於老書。其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尤為明承莊書道無為之語而轉深一層言之耳。若此之例，苟深辨其文體之異同，必將首肯於吾莊先老後之論也。

（12）法

《論語》不言法，僅有法語一言而已。法字之重要，始見於《墨子》。所謂「子墨子置天志以為儀法」（天志下），又曰：「莫若法天」是也（法儀篇）。其在〈經上〉云：「法，所若而然也。」，〈經下〉亦曰：「一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莊子》破是非之畛域，故不喜言法。老繼莊後，已自破壞而漸趨於建設，故曰：「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以埋植其學說之根蒂於自然之裏。此後法象之觀念遂為陰陽家所重視。（朔雪寒

註：說錢穆沒讀過《孫子兵法》，大概沒人相信，也不是事實。可是孫子也講法，說穿了也不過就是用其原本的概念之義，但如果按照錢穆自己取消孫子的著作權而轉移給孫臏的做法，即使如此，他也該交代一下孫臏跟莊子誰先誰後的問題。結果看到這裡，彷彿當時偌大的天下竟只有莊子一人存活，甚至只有他才能使用這個概念一般！因此，別人使用了相同的概念就必須從他繼承而來。而且這裡也沒有交代究竟墨子的法怎麼影響了老子，墨子除了法影響了老子以外，還影響了什麼？墨子講不講自然〔用五諾，若自然矣。（經說上）〕、講不講象〔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辭過）〕，究竟又對老子這個「後出」者形成了什麼影響，也都沒交代！彷彿就沉浸在一個天下只剩下老、莊的世界一般！可悲已極！)

乙（名）

《老子》書開首即以道名并言，道字之來歷大略如前述，今請論名字。

《老子》書中論名字，約可分二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

道常無名，樸。（三十二章）

道隱無名。（四十一章）

此言道之不可以名舉也。其意承襲《莊子》。蓋孔子首言正名，然其所指不過君臣父子間之名分，非謂凡名實之名也。墨辨論名，乃指凡名實之名，其涵義較孔子遠過。〈小取〉篇云：「夫辯者，將以察名實之理。」。又云：

「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經說上〉云：「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又「舉，告以之名，舉彼實也。」。《公孫龍子》：「名，實謂也。」。皆以名實並舉，與孔子正名之名不同。（朔雪寒註：一般概念至此已經被錢穆專有化了！從這裡真心可以看出錢穆對於古文之理解能力實在低下無比。）

孟子距楊墨，然殊不論名實。淳于髡則曰：「先明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可見名實兩字，在當時已成一極流行之名詞。故《莊子》亦云：「名者實之賓也」。然其意又較墨家提出名實二字之本意不同。墨家謂「以名舉實」，重在名。《莊子》謂「名是實賓」，重在實。墨家以名與辭為辯論真理之利器，而《莊子》則謂名字言說均不足以言真理，此其間蓋有一至巧妙之機括焉。墨家根據實事實物以為辯，則名之功效自大。何者？名實之謂也。如或謂之牛，或謂之馬，此實物之辯也。求白馬不可以驪色之馬應，此實事之辯也。使無名字言說，則實事實物之理固不可辨。然其末流，往往過重於名字言

說之辯，或好為驚世駭俗之論，而轉失實事實物之理。如云：「雞三足」，是與實物背也。（朔雪寒註：「雞三足」只是詭辯之產物，但基因突變之可能導致的雞三足的客觀現象還是有存在之可能！如何便能說是「與實物背」？）曰「犬可以為羊」，是與實事乖也。《莊子》當名家詭辯極盛之時，儒墨之是非相爭而不息，又親與名家鉅子惠施相過從，（朔雪寒註：所以按照錢穆自己的說法，惠施究竟是墨家還是名家？還是兼職？）故其受名家之刺激最深，莊子學說之努力點，即為若何而可以打破此繳繞之辯論。（朔雪寒註：上面還說莊子從惠施那裡繼承了什麼？現在又說要打破惠施什麼？彷彿莊子儼然是惠施後輩而不是同輩！而且如果莊子能打破惠施什麼，不知老子為何不能打破莊子什麼？以致於必然得從莊子那邊繼承了什麼？這一大堆種種的胡扯、胡謔、瞎掰、鬼扯蛋實在讓人對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還能持續的在學界發揮影響力而感到不可思議之極！）於是其驚人可怪之論遂起，曰實事實物，固無是非之可辯也。何者？大瓠可用而不可用，不龜手之藥可貴而不可貴，學鳩可以笑大鵬，彭祖可以悲衆人，昭文、師曠、惠子不足以明其好，麋鹿螂且鴟鴞不足以正其嗜，莊生惝恍其言，凡以見事物之間，是非淆亂，無一定之標準可據，而籀其大故，則不出兩端，曰各拘於地域，各限於時分，則不足以相喻而已。莊生乃進而求其包地域、踰時分之一物者，而名之曰道。其言曰：「道在六極之上不為高，六極之下不為深」，此言其包地域也。又曰：「先天地生不為久，長於上古不為老」，此言其踰時分也。墨家之辯是非，本人而為辯也，本己而為辯也，莊生乃本道而為辯。曰「有真人焉」，明拘地域、限時分之人之非真也。曰「至人無己」焉，明本己以為辯者之非人之至也。且墨家之辯，辯實事也，辯實物也，莊生乃捨實事實物而辯道，曰：「何肯以物為事」，曰：「以道觀之」，若是而《墨子》以來一切名實之辯，儒墨是非之爭，若劍首之一映，不足以復控搏矣。故名實之辯，墨家所慎重提出者，至莊子之手而輕輕轉移，變為言道之辯也。此吾所謂一至巧妙之機括也。（朔雪寒註：類似這樣的胡謔，是完全的排斥了先秦諸子其他學說下所幻想出來的。可惜錢穆不能復生，否則應當熟讀《孫子兵法》！再思考是否寫這篇謬論，方是上策！當然以錢穆已被吹成國學大師的現況，估計是不會有任何的改變的！）

然莊生之意，僅謂是非拘於地域、限於時分，不足以推而廣之，引而遠之耳。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則莊生之意，亦不過曰各行其是耳，亦不過為儒墨兩家作一調人耳。至《老子》則息爭之事匪急，而認道之心方真，於是名以舉實者，乃求所以舉道，而道終不可舉也，故曰「道隱無名」。然而無名者終不可以不名，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然則此大道者，將實有者乎，抑虛名之乎？使道為實有，則避實而言道，道不可復言實也。使道為虛乎，則道又不可以虛也。於是曰：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非虛也，（按《說文》：「冲，涌搖也。」此以形容道體之流動不居，流動不居則虛矣。自來祇以虛訓冲者失之。）不盈非實也。又曰：「道常無名，樸。」樸者，非實非虛，而為實之本質者也。實可名，實之本質不可名，故曰：「無名之樸」。又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然則道者非無實而又不可名，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道樸何以生物實，其中間之過渡則曰「象」。曰「大象無形」，象之與形，猶樸之與實也。凡《老子》之所以言道者如此。故《莊子》之言道，激於名實之繳繞，求離實而言之也。老子之言道，病於名之終不可以離實而言之也。求棄實，故曰道。將自道而重返之實，故曰象。於是後之辯實事實物之是非者，不求之於名，而求之於象，此又學術思想轉變之一大關捩也。《老子》又曰：「大辯若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莊生所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此皆明承《莊子》言之也。使老子生孔子前，未經儒墨之爭，絕不言此。（朔雪寒註：談名家，竟通篇不提鄧析，更不知鄧析直接引用了《老子》。至於「未經儒墨之爭，絕不言此」這又是毫不負責任的隨意論斷了！至於本篇那一大堆「明承《莊子》」的說法也根本毫無邏輯素養可言，而且從來不需證明。要像這樣寫考證文章，還難嗎？一開始就直接下結論即可，何須瞎掰胡扯一大堆毫無邏輯素養與常識的東西，才來下結論呢！）

（2）

道當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治（從胡校）（三十二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得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三十七章）

前舉以無名言道，此則以無名言治也。以無名治，即是以道治。《老子》之意，謂天下之亂由於民之多欲，多欲則外逐物而內喪其真，違自然之道。而欲之興由於名（朔雪寒註：所以人的慾望不是自然產生？生理慾望不是自然產生？而是因為「名」，這難道是想告訴讀者在沒有概念的蠻荒時代，那時的人們連生理慾望都沒有？沒有口腹之慾、沒有性慾？還沒有常識？），故曰：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其論亦始於莊。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應帝王）

又以壺子之無得而相以為〈應帝王〉，此皆《老子》以無名治之說也。惟《莊子》特粗啓其意，而未一其旨耳。其後至於《莊子》之外篇，闡發此意者乃甚多。以君天下者本已好惡出名字以擾天下人心者為亂之本，則其論又多出《老子》後矣。故《老子》斥仁義而重道德，其意亦本諸莊。不過莊子以之言學術，而老則重言政治耳。莊子謂是非無一定之標準，不當以吾之所是強同諸人。故《老子》言君人者不應以一己之好惡號召天下人也。無一定之標準，而一任各己之自然者，此道體也。鎮之以無名之樸，即是鎮之以道。《莊子》用道字息儒墨之爭者，（朔雪寒註：彷彿莊子寫文章的目的就是為了平息儒墨之爭！豈非好笑已極！）老乃進一步而以之為政治之理想的標準（朔雪寒註：所以儒墨之爭已經平息了？），此莊、老學說不同之又一點也。根據上諸論列，故我斷為《老子》後於莊子。至其他論證，當別詳，此不具。

朔雪寒駁

錢穆這篇，可以用「通篇胡扯，毫無價值可言！」一言以蔽之。其他的簡單反駁請見隨文附註。所謂「思想進程、思想線索」既然要成為一篇文章的主要論據，自然必須加以解釋，什麼叫做「思想進程、思想線索」？怎麼得出這個「思想進程、思想線索」的？為什麼「思想進程、思想線索」可以確定一個思想的時間先後？而不是把它當成一種類似「常識」的東西？錢穆對此毫無任何解釋，於是就開始把自以為不符合自己定義卻又不說出來的思想進程、思想線索的東西全部打成後出的產物。

不管是「思想進程」或「思想線索」，究竟兩個思想之間為什麼會存在任何關係？這既然不是一個基本常識問題，自然應該加以解釋。但我們既然已經知道錢穆這一篇不過是完全不講究任何客觀證據的自說自話，反駁自然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但不反駁一下，眾多被迷惑已久的學者必然心存僥倖。於是我們只好隨文附註的略加反駁。

如果要談思想的「相關性」而非空泛的「線索、進程」，又絕不如相似與不相似、相同與不相同來得令人容易把握與理解，這是一般人都能判斷出的。不管要講相似或相同，本書相關單元：〈老子思想探源〉、〈先秦諸子與老子〉、〈老子與先秦諸子〉都有絕對豐富的例子可供讀者參考！在老子所在的春秋末年之前許多思想就「已經」存在，在老子的主要活躍時間，許多思想普

遍的存在於各個智者的言論中；在老子之後，老子的思想取代了之前與之相似或相同的思想而成為被徵引的主要對象、文獻來源（《老子》、《文子》），同時徵引《老子》的現象也在春秋末年便已經開始了！這些客觀證據就足以把錢穆所謂的思想進程、思想線索的相關說法完全的加以擊倒了！

錢穆先後寫過三篇「考證」老子其人其書的文章，這一篇被胡適反駁後，大概自知難以為繼，於是別開新面、另起爐灶！不再談論虛幻、虛妄、自行定義、自說自話的主觀「思想進程」與「思想線索」，開始從前人如汪中等處汲取營養，同時開始進行「縮減歷史人物」的「慣技」，將一些本是兩人的物合併而為一人，最終其主要目的就是證明老子非有其人、《老子》非老聃所作。

錢穆曾經先後考證過孫子與老子其人其書，那些曾經在孫子身上用過的方法也都被用到了老子身上，諸如「主」、「仁義」、用兵數量「十萬」或軍隊總量「萬乘」、「將軍」或「偏將軍、上將軍」，都被拿來當成證偽這兩本書的證據。但錢穆居然對「原本就被記載為春秋末年的書籍」的兩本書有這麼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一無所覺，而一味的想要攻城掠地，想要把孫子、老子兩位思想上的偉人從人類的歷史上予以消滅，既要取消其著作權，更要取消其人格權。說有什麼深仇大恨，或者追求真理的精神，那都是太過虛幻了。說穿了，不過揚名立萬之法罷了！至於這一篇，自然毫無價值可言！至於胡適的辯駁，請見《與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不贅。

民國初期西潮大興，眾多學者為了展現一下自己「知識廣博」的一面，尤其愛引用一些西方傳來的「新潮」概念，譬如「反命題、術語、思想」，可惜都只是抓到了皮毛，有些甚至連什麼叫做「術語」尚且不知，卻能把「仁義」當成「術語」來當成「證偽」證據！這些當年大學者為了「炫耀」知識的把戲，至今仍然影響著許多搞國學考證的學者！而其荒謬性是更無以附加了！錢穆這一篇玩的正是「思想」的把戲！

錢穆《再論《老子》成書年代》

錢穆被胡適一駁之後並未就此放棄，否則學術地位難保。而此一篇更是荒謬透頂。實在不足論。錢穆除了繼續大用「倒因為果」的手法把所有《莊子》中被《老子》所影響的或者毫不相關的詞彙、語句反過來說是《老子》受到《莊子》的影響之外，並繼續把一般的常識概念如「仁義、芻狗」當成術語，以致於別人都不許用，尤其老聃絕不許先用，以證成他的謬說。

此篇特出之處在於錢穆繼續另闢蹊徑，企圖用自己發明的「文體進程」，來取代「思想進程」，從而用文體的產生先後來證明《老子》的晚出。這種違背常識與客觀實際的謬說，幸賴有張福慶進行反駁，而有《對錢穆先生從文章的體裁和修辭上考察《老子》成書年代的意見》一篇，此篇已經駁之甚詳，不再繁引。

這裡只撿擇一條作為其此篇謬論的代表加以駁斥，其他完整謬說與張福慶的反駁請見《古史辨》第六冊，不贅。整體而言，錢穆的所謂證據，除了那些新「發明」出來的「文體進程」之外，其他都乏善可陳！甚至說是已經被駁倒的陳腔爛調都不為過！因此，連看的價值都沒有！

錢穆說：

春秋時貴族世襲之制猶未破，故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當時治國者有禮有刑，不知所謂法也。法令之起，則亦在戰國矣。

朔雪寒駁

錢穆為了把《老子》成書時代拉後，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於連最一般的常識都能完全的加以忽視！「不知所謂法」，這是對常識與先秦諸子書最漠視的情況下，才能產生的「偏見」！更荒謬的是，有「刑」卻沒有「法」，這種違背常識的說法居然可以從一個「國學大師」口中說出來，簡直令人不可思議！請問如果沒有「法」，「刑」的根據是什麼？豈不荒謬可笑！豈不嚴重違背常識！

要反駁這種謬論，簡直不需要多說，請見以下資料：

〈左傳·昭公六年（前 536 年）〉：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韓非子·內儲說上〉：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

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轡，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轡，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

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二十一〉：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呂氏春秋·高義〉：

荊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返，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為獄吏，別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孔叢子·嘉言〉：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眾，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殷朝的法不是法是什麼？晉文公的軍法不是法是什麼？楚莊王的「茅門之法」不是法是什麼？沒有「法」怎麼判「罪」？怎麼用「刑」？這種常識問題，居然還要拿出來講，簡直令人無言了！至於叔向用「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來預測鄭國將「敗」，不也很明白的指出了三個朝代的刑法了嗎？堂堂「國學大師」，讀書不精一至於此乎？

孔子本身即曾擔任過魯國的司寇，所謂司寇，其具體職責引如下：

〈周禮·秋官司寇〉：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國語·周語上〉：

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蔣國出王而立子頹。王處于鄭三年。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遍舞。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也。

〈國語·晉語九〉：

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于叔魚以求直。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奸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雍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于市。」

〈荀子·宥坐〉：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從風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之世陵遲已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不哀哉！」

果真沒有「法」，不知如何判「刑」、判「罪」？這本是一個常識問題！

孔子既然曾經擔任司寇，自然也對法有所研究，雖然孔子所主張的一如以上回答季孫的話，以及以下回答衛將軍文子的話，但這並不表示孔子不懂法！就好像老聃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不表示他不懂禮一樣！

〈孔叢子·刑論〉記載了孔子對於刑、法的相關論述，詢問者有仲弓、子張、衛將軍文子、孟武伯等人。至於「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的說法，冉有已經發出疑問，而孔子也已經做了回答，相關說法，都請見下引文獻：

〈孔叢子·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先）禮以教之，然後維（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

「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

「以御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於獄，其於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孔子家語·五刑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姪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姪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

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至於被一般學者認為屬於商鞅的標記的「連坐法」，起源甚早，絕非商鞅首創，請見以下引文：

〈左傳·僖公十九年（前 641 年）〉：

（經）梁亡。（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春秋繁露·王道〉：

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仇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

至於商鞅變法，難道不能告知這些疑古者、大學者、專家、權威另一個常識嗎？試問：沒有「舊法」要怎麼「變法」？

〈史記·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

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如果連常識都欠缺，卻硬要寫考據文章？能不鬧笑話嗎！

錢穆《老子雜辨》

錢穆一如羅根澤，知錯不改，屢敗屢戰，荒謬性更是不停的累增。錢穆此篇的荒謬性與郭沫若的《老聃·關尹·環淵》至少不相上下，實際上是超越了郭沫若的荒謬性。在這一篇裡，錢穆把一大票人「濃縮」成了一個人，運用的也是郭沫若使用的「聲訓」，至此大家才知道原來「聲訓」這麼好用、可以這樣用。於是「太公任即老聃」、「任公子即詹何」，其原因竟只是「任、詹聲近義通」，荒謬可笑到了極點！至於「漁父」首先成了「太卜鄭詹尹」接著也成了「詹何」、「環淵」變成了「關尹」（如郭沫若），整篇文章之荒謬性實在到了無以附加的地步，若說這是疑古派裡最荒謬經典的一篇文章，絕不為過。因此，將全文列出只是浪費作者與讀者的寶貴生命。若不列出，疑古之魂必不死。因此，僅撿擇此中荒謬到令人發笑的片段，以饗讀者。

至於其全篇之目錄如下所列：

「一、太史儋與老聃」、「二、太史儋與詹何」、「三、太公任即老聃」、「四、任公子即詹何」、「五、環淵即關尹」、「六、涓子即環淵」、「七、臧丈人誤太公望」、「八、孔子所見老子即老萊子」、「九、老萊子即荷篠丈人」、「十、老萊子與狂接輿」、「十一、老子誤伯陽」、「十二、續耳即老聃」、「十三、李耳即離耳」、「十四、老子師商容」、「十五、老子弟子文子」、「十六、孔子比老彭」、「十七、戰國言老子之真相」、「十八、老子之子孫」、「十九、老子書之年代」

從這個目錄不難發現，許多人消失了，並被「歸併」成為一個人了！地球人口再次成功在疑古者的偉大工程下「被」銳減了！至於「證據」？說穿了就

是一個「編故事大賽」罷了！錢穆隨便抓著兩個人物在姓名或事蹟上的相似點便「證明」了兩人其實是一人，這一招錢穆在考證孫子與《孫子兵法》時也玩過。只能說從錢穆的所謂考證文章來看，其招數用來用去就是那幾招，一些完全欠缺邏輯素養與訓詁學、校勘學知識的招數！

錢穆《老子雜辨》節選：

一、太史儋與老聃

竊謂秦漢之際言老子，凡有三人，而往往誤以為一人。此三人者，一為孔子所見，一為太史儋，而又一則尚在晚世。

莊周稱孔子所見為老子，又曰老聃，而老聃與太史儋每易混。〈史記·老子傳〉：「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史記》《索隱》，《老子音義》，〈後漢書·桓帝紀〉注，〈文選·遊天臺山賦〉注所引皆如此。今本《史記》作「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乃淺人妄改者。王念孫《讀書雜誌》有詳辨。）《說文》：「聃，耳曼也。」《莊子》書稱老聃，〈呂氏春秋·不二篇〉作老耽。《說文》：「耽，耳大垂也。」〈淮南·地形訓〉：「誇父、耽耳在其北方。誇父棄其策，是為鄧林。」然則誇父者，猶云大人國，耽耳，猶云大耳國也。耽耳亦作瞻耳。《說文》：「瞻，垂耳也。南方有瞻耳國。」瞻耳又作儋耳。〈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儋耳之國。《注》云：「儋耳，其人耳大下儋，垂於肩上。」〈後漢書·明帝紀〉注云：「儋耳，南方夷。」蓋古人傳說，邊荒有儋耳之國。南人因謂在南荒，北人則謂在北荒也。漢《老子銘》：「聃然，老旄之貌也。」古人以耳大下垂為壽者之相。至今俗猶然。故高年壽者稱老子，稱老聃、老耽，亦得稱老儋。

（《抱樸子》曰：「老子耳長七寸」，《列仙傳》：「務光耳長七寸」，皆此類。）以其年老，而曰老聃，（鄭注〈曾子問〉云：「老聃古壽考者之稱也。」）以其為周史官，則曰太史儋。故儋之與聃，每易混說而為一人也。

二、太史儋與詹何

其又一人則為詹何。《說文》：「何，儋也。儋，何也。」詹何二字，蓋一義兩音。單呼儋者，連其餘音則為詹何，今人稱擔荷，或稱儋負。如蟾之為蟾蜍，澹之為澹宕也。《古今人表》周儋桓伯，《左傳》儋作詹。然則詹何宜可為詹何，或呼詹子，（〈莊子·讓王〉作瞻子。）如匡章稱章子，陳仲稱仲子。則老聃、太史儋，又易與詹子相混。高誘注〈淮南·覽冥〉云：「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則詹何為南方之道者，與老聃似。〈韓非·解老〉：「詹何能坐堂上知門外牛黑而白在其角。」是詹何有前識，與太史儋似。〈呂氏春

秋·執一篇〉：「楚王問為國于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又〈審為篇〉：「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曰：雖知之，不能自勝。詹子曰：縱之。」是與道德之意五千言似。（朔雪寒註：《老子》何時要人「縱之」？簡直是在瞎掰妄造！而且「詹何」雖然可以稱為「詹子」，「詹子」卻不一定是「詹何」！而更荒謬者乃是楚莊王時的「詹何」如何與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交談？豈不可笑！）〈淮南·道應訓〉謂楚王問詹何治國者為莊王，此莊王不在春秋世，蓋楚頃襄王又稱莊王，（參讀《考辨》第一三一。）（朔雪寒註：記載明明就說是「楚莊王」，錢穆為了牽合己說，硬是把楚莊王「搞成」楚頃襄王。果真考證文章可以這樣隨意編造、胡亂瞎扯，不知「考證」的意義究竟何在？且退一萬步說，就依錢穆掰的「楚頃襄王」，試問魏文侯之子中山公子牟與「楚頃襄王」時人交談的機會有多大？）故與公子牟相及。〈呂覽·重言篇〉：「聖人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是猶以詹何與老聃為兩人。其先後之序，蓋自近以逮遠。老聃在田子方前，非太史儋即孔子所見。而詹何在田子方後，則為與公子牟並世之人也。（朔雪寒註：錢穆一如眾多疑古者把作者對於歷史人物的敘述順序當成了歷史人物在客觀世界的生存順序，可以說是缺乏常識的表現！）

三、太公任即老聃

而余觀戰國言老子，其混並牽涉之跡，猶不止此。〈莊子·山木篇〉：「孔子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為言不死之道，告之以意怠之為鳥，教之以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夫太公亦老者之稱，猶云老子也。任者，《齊語》：「負任儋何」，《孟子》：「門人治任將歸」，注：「任，擔也。」《釋名》：「儋，任也。」任儋聲近義通。則太公任猶云老子聃，即老聃矣。其告孔子「至人不聞」，即「良賈若虛，君子若愚」之意也。其謂「飾知驚愚，修身明汙，故不免」，即「驕氣多欲，態色淫志，無益子身」之說也。「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明處，（疑當作德得而不明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即「得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行」者也。（朔雪寒註：差異如此之大的文章，可以說成相近甚至相等，我們能不感嘆疑古者的偉大嗎？從這裡我們難免要再次質疑錢穆究竟是否能讀懂古文！至於超級濫用聲訓、訓詁，是連多費筆墨批評的意義都沒有了！）

（《史記》老子與孔子語，不出此篇及〈天道〉、〈天運〉、〈外物〉三篇之外，蓋雜采《莊子》書而意造云爾也。）《莊子》書本成於眾手，此獨不

曰老聃而云太公任，其實皆一人也。（《文選》卷五十九注，引作太公，則如不稱老聃而僅稱老子矣。）

四、任公子即詹何

《莊子》書有太公任，又有任公子。太公任即老聃，而任公子則為詹何。〈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鎗，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鎗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盪，聲侔鬼神，憚嚇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瀾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文選》卷二十五注，引作任公。）任公子即詹子也。何以言之？〈淮南·覽冥訓〉：「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即五十犗以為餌之釣也。故詹何者，據《莊子》任公子之故事言之，乃一隱淪江海漁釣之君子也。（《御覽》八百三十二引《闕子》云：「任公子東羅鯉于山阿，眾人皆以為惑，既而鸛鶚擊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諒其他關於任公子釣魚之怪談尚多，惜不備見。又按〈淮南·說山〉：「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任公子羅鯉，即詹公之釣鯉也。此又二人為一人之證。）（朔雪寒註：按照錢穆的可笑邏輯，凡是會釣魚的就能成為同一個人的證據，在如此大差異的文本中只因為兩人都會釣魚便成了一人，其荒謬性自不待言。且任公子「為大鉤巨鎗」釣的是大魚，詹何「驚魚於大淵之中」是說詹何釣的是大魚嗎？〈淮南子·覽冥〉：「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高誘註：「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馳驚來趨釣餌。故曰驚魚。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何也。」、〈淮南子·說山〉：「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軋車，引楫者為之止也。」高誘註：「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釣者，有精之術，故得千歲之鯉也。」據此，我們不得不再次質疑究竟錢穆到底有沒有正確閱讀古文的能力？究竟釣大魚跟「驚魚於大淵之中」有什麼關係？且兩個人都釣鯉魚就表示兩人是同一個人，就表示得到了「一證」，這種非正常人思維的疑古技術，只能說還真是實在好用！）

五、環淵即關尹

與詹何齊名者有環淵。其人亦以釣稱。〈史記·孟荀列傳〉云：「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上下篇》。」〈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蜎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應劭《風俗通·姓氏篇》：「環氏出楚環列之尹，後以為氏。楚有賢者環淵，著書《上下篇》。」張澍《輯注》曰：「環淵亦即蜎淵也。隗囂將環安，公孫述將環饒，吳有環濟，著《要略》。」則環乃本字，蜎

乃借字。《楚策》范環，〈史記·甘茂傳〉作范蜎，此蜎環相通之證。）《文選》枚乘《七發》：「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釣鉞芳餌，加以詹何、蜎蠅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于玄淵。《七略》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是環淵亦名便蜎，蜎蠅，又名玄淵，亦稱蜎子，與詹何齊名。

（言詹何、便蜎之釣者，《御覽》八三四引宋玉《釣賦》云：「玄淵之釣，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以蛆蠅，鉤以細針，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又《列子》云：「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其語亦正相類。《御覽》七六七引《博物志》，「詹何之釣」云云，語亦大同。）宋玉從之受釣，則其人在頃襄王世，與詹子年亦相接。（朔雪寒註：錢穆在此明明知道〈列子·湯問〉關於詹何的記載是：「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試問「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這是多麼細小的釣具、釣餌？這跟「任公子為大鉤巨鎗，五十牯以為餌」的巨大釣具、巨大釣餌何止完全相反，甚至相差十萬八千里，所謂「牯」指「閹割去勢的牛」這能跟「剖粒為餌」相提並論嗎？但錢穆卻說：「〈淮南·覽冥訓〉：『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即五十牯以為餌之釣也。」錢穆連這麼巨大的差異尚且看不出，還說成是一樣的！這是想唬弄誰？或者真心就是讀不懂古文！至此，讀者當已知詹何之所以能「驚魚」，其秘訣就在他那細小的釣餌上，而這正好跟任公子的釣餌的「尺寸」天差地遠。）

（今《楚辭》有《卜居》《漁父》兩篇。《卜居》乃屈原問太卜鄭詹尹，竊疑即由詹何誤傳，而漁父亦詹何。以詹何前識，遂誤稱太卜詹尹。以詹何隱於釣，故稱漁父。屈子之所問，與宋玉之所師，其時代固相及。詹子亦楚人，蓋楚人傳說，自有詹何與屈原往復一段情事，後人寄託為文，乃《卜居》與《漁父》並傳也。）所著書，《史記》云《上下篇》，而《漢志》稱十三篇，已不同。至其年世，《史記》與慎到、田駢相次，是謂在齊威、宣王、梁惠王、楚威、懷王時，與莊周、惠施、孟軻相先後。而班固云：「是老子弟子。」詳班氏所稱老子，當指孔子所從問道之周守藏室史而言。則環淵在莊、惠之世，又烏從而師之？蓋其先言師詹何，則與楚莊王、魏公子牟接世。其後言師老子，則年移而益先。故《文選》枚乘《七發》，應璩《與從弟書》，《注》皆引高誘注《淮南》，謂：「蜎蠅白公時人。」高氏蓋亦謂蜎蠅師老子，則與孔子年相當。以其楚人，故推謂與白公同時爾。（朔雪寒註：對於這

種荒謬絕倫的所謂考證文章，實在已經無言以對了。「以詹何前識，遂誤稱太卜詹尹。」不知道這種錯誤要怎麼產生？「尹」又表示什麼？「以詹何隱於釣，故稱漁父。」證據又在哪裡？〈漢書·古今人表〉將「老子」與「漆彫啟、師曠、周史大弼、蔡悼侯」置於同列；又將「太史儋」置於「秦獻公」之後，明擺著班固認為是兩個人。班固又將「漁父」與「魏昭王」並列。結果錢穆怎麼都不提了！通觀全篇無非如此隨意牽強附會之文，而學界乃奉之為國學大師。而其謬論尚且能在關於老子的考證文章中佔有一席之地！如此荒謬之文章，毫不講究真憑實據的瞎掰胡扯！比之說故事大賽猶有過之。所謂反駁，似乎也毫無必要了！）……

八、孔子所見老子即老萊子

然則孔子所見之老子固何人乎？莊周述孔子、老聃，其固羌無故實，盡出虛構乎？曰：不然。莊周之言老子，其先固據《論語》也。〈莊子·外物篇〉：「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語子貢以近古之賢者，自伯夷、叔齊以下十許人，曰：「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而獨不及老子，是即以老萊子為老子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楚老萊子。」乃分老子與老萊子為二人。（朔雪寒註：司馬遷明明白白說老聃與老萊子是兩人，錢穆現在又倒因為果，先預設了老子是老萊子，然後又以孔子稱讚諸人沒提到老聃於是就說那表示「老萊子」就是「老子」？類似這種毫無邏輯、因果關係的「論述」或「證明」，充斥於錢穆整本《先秦諸子繫年》之中，而此書竟能取得歷史學界的認同！簡直令人無言以對！試問，根據什麼文獻可以證明「老萊子」又被稱為「老子」？根據什麼文獻證明孔子沒有見過老聃？錢穆這種掰故事的考證，自然可以完全不用理會！然而我們想問，何以學術界竟能認同這樣的「論文」以及他所作出的「結論」！）

（然〈老子傳〉又明云老子為楚人，蓋史公於此，殊無辨白。）今即據《戴記》孔子所稱道，如伯夷、叔齊、羊舌大夫、趙文子、隨武子、桐提伯華、（羊舌赤。）蘧伯玉、柳下惠、晏平仲、老萊子、介子推凡十一人，其他十人，或見於《論語》，或見於《左傳》，獨老萊子無聞焉。其事始見於《莊子》之雜篇，而記禮者采之，而其名乃特著，亦可怪矣。余考《楚策》：「或謂黃齊曰：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抗志篇〉謂老萊子教子思，《淮南》又以為商容教老子，一語之傳，訛謬如此，其不足信據可見。（朔雪寒註：這裡牽涉到誤傳、使用相同

比喻的問題，誤傳是老萊子教子思被誤傳為老萊子教孔子，商容教老子的故事所用比喻雖同，文字內容已經有別，這一點可參見〈老子與先秦諸子〉，不贅。對於錢穆，凡是只要符合他想要的，隨便什麼文字、隨便瞎掰妄造都是可信的，但只要是不符合他想要的，都「其不足信據可見」！再說可悲，真是多餘的了！)

九、老萊子即荷篠丈人

然則《莊子》雜篇之老萊子者何所來？余嘗為之搜根掘柢，而知其即《論語》之荷篠丈人也。余考《莊子》書，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馬遷已先言之。而老萊子實有其人。萊者，除草之稱。子路「遇丈人，以仗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其事明見《論語》。而丈人之姓字不傳。後之記者異其辭，因謂之老萊子，蓋猶云芸草丈人也。惟《莊子》謂老萊子弟子出薪而遇孔子，則與子路之行後而遇丈人適相反。然此特小節相差，無害為一事之訛傳。（朔雪寒註：錢穆的荒謬在此又再一次展露無疑！不知何以關於老萊子的故事就不可信、「老萊子者何所來」！老萊子自是老萊子，到底有什麼好懷疑的呢？於是錢穆為了展現自己豐富的「想像力」，又東拉西扯，把《論語》裡的無名隱者或者直白說是無名老人就說成是老萊子，彷彿老萊子如果不是荷篠丈人，他的存在就是可疑的！可是從錢穆的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即便是《論語》的記載他也不全信，依然是符合他的妄想的就可信的、不符合的就是不可信的！至於老萊子、荷篠丈人，都能用這麼簡便的「伎倆」扯成一個人，到底還需要什麼考證？還需要什麼邏輯？還需要什麼知識？還需要什麼常識？簡直荒謬可悲！)

（〈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仲尼曰：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此與「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往視之，至則行矣。」取徑略相似，亦一事之訛傳也。惟曰市南宜僚，則並其事中之主人而訛之耳。）《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裡人也。」《路史》：「老子邑于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賴《史》作厲。」今按萊賴厲皆聲之傳。云老子居厲，居賴，皆涉萊音而訛。《路史》之言，是謂倒因為果，認虛作實。

（魏源《老子本義》云：「莊子稱老子居沛，《邊韶碑》則云：老子楚相縣人。《釋文》引《莊子》注：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水經·陰溝水〉注，東南至沛為渦水，渦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即春秋之相，王莽更之為賴陵，又東逕賴鄉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云

云，尤為詳備。」今按苦縣相城故城，皆在今河南鹿邑縣城東，《太康地記》，苦縣東有賴鄉村，老子所生。其地距沛不得謂相近。大抵苦縣自有賴鄉，云老子生其地，則涉萊音而訛，不必更牽莊子居沛以為說。）《史》又云老子姓李氏，萊李亦聲近。畢沅《道德經序》：「案古有萊氏，《左傳》有萊駒，老萊子應是萊子，如列禦寇師老商氏，以商氏稱老矣。」蓋由不得其會通，而必欲為之說。故曰老聃、老氏，或曰李氏，老萊子則又為萊氏焉。

（魏源云：「老子居沛，沛宋地，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轉為李，猶姒之轉為弋歟。」今按古者男子稱氏不稱姓。《史》稱其姓李氏，猶姓項氏、姓劉氏之例，蓋已訛氏為姓矣。今魏氏既謂老子氏老，又稱其姓子而轉為李，此皆屈說強解，《史》固明云其氏李不氏老也。）劉向《別錄》云：「老萊子，古之壽者。」丈人即壽者也。老萊子之即荷篠丈人，夫復何疑，而猶紛紛為氏老、氏李、氏萊之辨哉？（朔雪寒註：從都會釣魚變成一個人，到都長壽變成是一個人，這就是錢穆「高超」的考證技術！）……

十二、續耳即老聃

以老子為伯陽，乃為周幽王史官，益遠而為舜師。牽涉離奇極矣，而猶未也。乃與伯陽之外，重有續耳其人者，同時為堯舜師。其人實亦為老子，則尤其離奇荒誕之甚矣。〈呂覽·本味篇〉：「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畢沅云：「續耳，《韓非子》作續牙，〈漢書·人表〉作續身，皆隸轉失之。」余謂續耳即聃也。《說文》：「聃，耳曼也。曼，引也。」《魯頌》毛《傳》：「曼，長也。」續字正有引長之義。故曰續耳即聃。《淮南》有耽耳，《說文》有瞻耳，《山海經》有儋耳，又有離耳。注：「即儋耳也。」〈水經·溫水〉注亦云：「儋耳即離耳。」《初學記》引《韓詩》：「離，長貌。」〈詩·湛露〉：「其實離離」，《傳》：「離，垂也。」〈文選·西京賦〉：「朱實離離」，薛《注》：「離離，實垂之貌。」耳垂在肩上，故稱離耳，又云續耳。離續相反為訓益知續耳即聃。據此則云續耳為堯舜友，其意實指老聃。然此無足怪。伯陽在周幽王時，可以上友堯舜。安見老聃與孔子同時，即不得前友唐、虞哉？〈漢書·古今人表〉伯陽、續身皆列三等，儼若自古實有其人者，見古人之輕信而好誕也。（朔雪寒註：錢穆自己瞎掰妄造，卻說古人「輕信而好誕也」，荒謬可笑到了極點！本來不誕之事被錢穆搞「誕」了，這才又來質疑古人「輕信而好誕」！這種栽贓伎倆，確實不可謂不「高明」！至於這樣把有點意義相關的字就能扯出一篇考證「故事」來，也實在難為今日的學界尚有奉錢穆為國學大師者！試問，這種程度能當國學大師，誰不能當？且究竟「續耳」跟「老聃」到底哪裡有關？如果按照錢穆這種名字上有其中一個

字有相近的意義，就表示是一個人，那麼春秋時代的人口必然大大銳減！按照這種邏輯：子路必是顏由，顏回鐵定是子路生的。公孫龍既是孔子弟子，也必然是平原君的屬下！老聃與秦開、子張必是一人，老聃必實為孔子弟子，而他人誤傳耳！豈不荒謬可悲！）……

十四、老子師商容

孔子所見之老子，其辨既如上述，請再及于老子之師弟子。〈荀子·大略〉，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呂氏·離調〉，箕子、商容以此窮。〈史記·樂毅傳〉，燕王喜遺樂間書，箕子不用，商容不達。《燕語》，未如商容、箕子之類。皆明以商容為人名。〈淮南·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主術訓〉高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又曰：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商容殷賢，豈得下為老子師乎，故不得不謂之神人。《文子》、《說苑》言老子學于常樅，常樅即商容也。（朔雪寒註：從錢穆此論以及《先秦諸子繫年》所有文章看來，錢穆實在欠缺校勘學的常識與知識，並且有著極大的偏見與雙重標準。明明殷朝商容就不可能是春秋末年老聃的老師，明明「常樅、商容」就是音近甚至可能加上記憶失誤而成的失誤，卻被無限誇大為偽造！明明老聃的老師就是常樅，即便曾經被誤說成商容，何至於便能根據一些常見的文本錯誤而無限上綱？明明「商容」是「常樅」的錯誤，卻被說成「常樅」「就是」「商容」！豈不可笑！退一萬步說，即便老聃的師父真的是叫做「商容」不叫做「常樅」，難道不能允許兩人同名同姓同稱謂嗎？

〈禮記·樂記〉：

（子曰）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管子·小匡〉：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甯戚為田。隰朋為行，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晏尚處燕，審友處晉。」

根據引文，殷朝時有商容，管仲時也有商容。難道錢穆不知道同名同姓同稱謂在古代是如何普遍的一件事情嗎？而我們之所以能肯定「商容」是「常樅」的錯誤，不只是因為「商、常」、「容、樅」都音近，還因為他們所牽涉到的事實都指向他們是老聃的老師一事。也就是說，「商容」、「常樅」確實

在字面上完全不同，但如果不是有相同的事蹟記載，我們也不能因此隨意判定其中一個是錯的，因為在春秋末年有兩個以上的老師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孔子就是最佳實例。如果不是因為商容是殷朝人，且「常縱、常從」的例子多於「商容」，且「商容」在歷史記載上還存在其他可能，且我們從記載的文本的可信度（《漢書》）與「常縱、常從」的相似度更大等理由，我們也不會就肯定的說「常縱」或「常從」一定就是對的，而事實上，僅僅依據當前的文獻，我們也不可能肯定究竟「常縱」或「常從」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形式。只是為了論述上的方便，因此我們選擇用常縱來指稱老聃的老師，即便老聃的老師實在就叫做「商容」，與殷朝時人的名字完全相同，也無妨。只是如此一來，「常縱、常從」便成了錯誤形式。這與錢穆隨意牽合，「單」憑音近就說是「相等」是完全不同的作法。白話的說就是證據多寡，以及證據力的問題。如果單憑音近就能把兩個字面上完全不同的文字背後的意義等同，那麼一如上文所說，春秋時代的人口必將銳減。）偽《列子》有老商氏，亦襲商容之名而故變以為飾。後人知其不可信，乃轉以商容為商之禮樂官名，非人名，此皆不免以古人語必無誤而強為之說耳。夫老子已為舜友，豈不及師商容哉？宋於庭《過庭錄》云：「〈史記·殷本紀〉表商容之閭。《索隱》皇甫謐云：商容與殷人觀周軍之入，則以為人名。鄭玄云：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台。《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正義》曰：鄭知容為禮樂者，〈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與百姓並稱，可知非一人。」又謂：「老子不能與商容相接。商容即殷禮，老子為守藏室史，守藏為《歸藏》殷易，故所業亦殷禮」，此非以古人凡語為無誤，而強為之說乎。

（〈管子·小匡〉：「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方處衛，匱尚處燕，審友處晉，又遊士八千人，使出周遊于四方。」其文本之〈大匡〉，謂游公子開方于衛，游季友于魯，游蒙孫于楚。蒙孫無考，公子開方、季友乃魯、衛公子，豈得妄攀以為齊之遊士？當春秋之世，何來有遊士之風？又何至遊士八千人？然則往所謂商容處宋者，殆又妄攀殷賢為說。則商容亦自周初下迄春秋，當管仲、桓公世，宜得為老子師矣。梁玉繩《呂子校補》謂：「管子、商容別是一同名者。」此又昔人讀書信古謹飭之態度宜然也。）……十七、戰國言老子之真相

今綜述上陳，則戰國言老子，大略可指者，凡得三人。一曰老萊子，即《論語》荷篠丈人，為孔子南遊所值。二曰太史儋，其人在周烈王時，為周室史官，西入秦見秦獻公。三曰詹何，為楚人，與環淵、公子牟、宋玉等並世。自以老萊子誤太史儋，然後孔子所值之丈人，遂一變而為王室之史官。自以環淵誤關令尹，然後太史儋出關入秦，遂有人強之著書。夫《論語》之丈人，已為神龍出沒，一鱗片爪，不可把摸。太史儋以神讖著，詹何以前識名，益復荒誕。今以三人傳說，混而歸之一身，又為之粉飾焉，則宜其去實益遠。今為分別條理，則孔子所見者，乃南方芸草之老人，神其事者由莊周。出關游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屬秦人。著書談道，列名百家者，乃楚人詹何，而神其事者，則為晚周之小書俗說。其混而為一人，合而為一傳，則始《史記》。而其牽而益遠，以老子上躋堯舜，下及商初，則人知其妄，可勿深論也。（朔雪寒註：從頭到尾「神其事」、荒誕其事的始終只有、就是錢穆自己一人，而如今他自己妄想發作，竟把這一大堆自己的妄想全部說成是古人的「粉飾、神其事」！而老萊子一個著書立說的思想家一變而成除草老人，不成為除草老人，他的存在就顯得突兀，豈不可悲！且究竟老萊子教孔子，為何就是「神其事」，究竟是哪裡「神」了？這不是莫名其妙嗎？至於其他荒謬之猜想全出錢穆自己妄想，而如今他卻反過來以自己的妄想批評自己，簡直令人發笑！）……

十九、老子書之年代

老子之辨既定，則今傳道德五千言者，又出何人之手乎？曰：此已無可確指。其成書年代，亦無的證，可資論定。（朔雪寒註：所以從頭到尾瞎掰胡扯，把多人合併成一人，隨便編幾個可笑故事，《老子》的「成書年代」就「亦無的證，可資論定」了！這種考證技術真是便利好用！若錢穆改行當小說家寫幾本奇幻小說，難保不會受到讀者青睞！）據其書思想議論，及其文體風格，蓋斷在孔子後。當自莊周之學既盛，乃始有之。汪氏以為太史儋之書，亦非也。縱有太史儋，其人乃在莊周先，此書猶當稍晚，不能出儋手。（朔雪寒註：總之，不是老聃寫的就對了！）

且《漢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

（陶憲曾曰：「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下》，引《風俗通》云：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調年高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也。」）陰陽家有《南公》三十一篇，（〈項羽紀〉《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徐廣云：「楚人也，善言陰陽。」）公者，長老之號，（〈漢書·眭弘傳〉集注。）老人之稱也。

（〈漢書·田叔傳〉集注）農家有《野老》十七篇，（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蓋道家、陰陽家、農家之三派者，皆貴遁隱無名，又尚葆真全年，故著書每匿其名而稱老。老子亦其流，烏從而必指其人哉。（朔雪寒註：〈漢書·藝文志〉收錄的書不下數百本，錢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提道家《鄭長者》、陰陽家《南公》、農家《野老》，不提農家《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不提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公孫發》二十二篇、《馮促》十三篇，不提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長盧子》九篇。至於「南公」本類似魯申公、毛公、太史公、杜文公（也是陰陽家）、蔡公（《蔡公》二篇。班固註：「衛人，事周王孫。」）之稱謂，錢穆為了把結論做出來就以偏概全，企圖把極少數的例子變成主要例子，完全罔顧其他客觀資料。至於蔡公因班固有註，錢穆便略過不提，令人無言！）

其意著於《莊子》之〈寓言篇〉，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肆意攻擊己言也。是謂耆艾。」郭象曰：「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道家著書，非藉之外，則托之老。如《莊子》稱列禦寇、南郭子綦，是藉之外也。」（參《考辨》第五十九。）如老子、鄭長者、南公、野老著書，是托之老也。（朔雪寒註：老子字聃，稱為老氏、老聃、老子，與鄭國的「長者」、南公、野老，例子相差十萬八千里，如何能相提並論？不過，自然只要錢穆喜歡，再怎麼荒謬的差異性都是可以完全忽略的！）今《莊子》寓言，知曉者多，其重言則人少瞭者。故云彭祖八百，則人習養生矣。云老聃仙隱，則人輕儒墨矣。是皆入其重言之彀中也。又曰：「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蓋僅托之於年耆，猶不足以取重而動聽，乃必為之經緯本末焉。經緯者，上下為經，旁通為緯。如言老子，而孔丘師之，楊朱問道，庚桑楚屍祝於畏壘，南容趨贏糧而往從，是老子為經，孔丘、楊朱、亢桑、南容為緯也。本末者，如言老子先為王官，終則遁隱，關尹尼之，乃著五千言，是其本末也。故後人尤重老聃，不信彭祖。則彭祖雖年耆，其經緯本末，不如老聃也。此則莊生重言之說也。乃後人讀書者，終必以老子為可信，不敢自越出於十七之數，吾以是不能不愛莊生之智矣。

今不得已而必為《老子》五千言尋其作者，則詹何或庶其近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乃莊周、公孫龍以後書耳。魏牟問于詹子，其年粗合。《莊子》內篇述老聃語，絕不見今《老子》五千言中。蓋其時尚無《老子》書，特莊周自為寓言。（朔雪寒註：老聃日常的對話

為何一定要寫到《老子》之中？沒有寫到《老子》之中就說是當時還沒有《老子》。是「特莊周自為寓言」！按照錢穆的邏輯，這《老子》卻是莊周以後的人所偽造，既然如此，則「偽造」《老子》的人不是明擺著可以看到莊子的寓言了嗎？為何不把莊周的東西加進去呢？這些都是隨意就能揪出的不能自圓其說的點，而錢穆卻茫然無知！錢穆這種沒有必然性的亂七八糟式的推論充斥於錢穆此篇論文以及整本《先秦諸子繫年》，而今日之許多歷史學者仍然視之為經典！難道不可悲嗎？）至《荀子》云：「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

（〈天論篇〉）或其時已有《老子》書。

（若僅見莊周寓言，荀子博學，未必遽加彈駁。）以詹何年世言之，亦當在莊周、荀卿間也。（朔雪寒註：錢穆把楚莊王「硬搞成」楚頃襄王，然後再來說「以詹何年世言之，亦當在莊周、荀卿間也」，其不讀書一至於此乎？楚頃襄王在位時間為前 298 年至前 263 年，其時莊周已經確定死亡了嗎？而荀子不就正是活躍於楚頃襄王的學者嗎？如何能定出詹何與荀子的先後？這種莫名其妙、隨意論斷的東西充斥全文，實在不知道這種低劣素質的文章究竟是如何取信於數十年來的眾多歷史學「專家」的！）又詹何屢見於晚周人之稱述（朔雪寒註：「詹何」的事蹟，先秦的文獻總共只有四筆，散見於詹何《列子》〈湯問〉〈說符〉、《韓非子》〈解老〉、《呂氏春秋》〈重言〉，其中《列子》已被疑古者與錢穆自己視為「偽書」，錢穆更在此篇直稱「偽《列子》」，根據疑古者對偽書的看法，則顯然偽《列子》不在錢穆「晚周」之列，那麼只剩下兩篇，其中〈呂氏春秋·重言〉：「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如此只剩下一篇。不管是四篇、二篇還是一篇，這樣的次數能叫做「屢見」嗎？「屢見」是這樣定義的嗎？），而《漢志》獨無詹子書。便娟與娟何齊名，而漢人稱環淵師老子。然則，必不得已而求今道德五千言之作者，與其歸之孔子時之丈人，與秦獻公時之周史，無甯與之公子牟、楚襄王同時之詹何為得矣。（朔雪寒註：〈漢書·藝文志〉沒有詹子的書，詹子就成了老聃；孔子不評論老聃，於是老萊子就成了老子。為何詹何一定要有著作呢？一個沒有多少事蹟流傳，論出現次數遠遠不及老聃，一個明明記載是楚莊王時人的人，錢穆可以違背如此多的事實，硬是掰成詹何是楚襄王時人，然後預設他一定有著作，而〈漢書·藝文志〉一定會收，於是找不到就說《老子》就是詹何寫的！這種莫名其謬、荒謬可悲的論文，實在是令人無法再繼續讀下去了！）

朔雪寒駁

相關「簡單」「反駁」請見隨文附註，像這種程度的論文，居然也可以影響學者們的判斷，個人覺得很不可思議。果真會釣魚就是同一個人，名字中連一個字都沒有相同且事蹟也完全相異也能被「合併」成一個人，沒有任何相關記載，一個人卻可以成為「漁父」，因為能「前識」所以「詹何」就會被「誤稱」為「太卜詹尹」！荒謬性，無以復加！按照這種邏輯，春秋時代有準確預言、預測被記載下來的，且是記載在《左傳》中的不下數十位，豈不每一個都能被「誤稱」為「太卜詹尹」！至於關於「老聃」的所有事蹟與記載，叔向引老聃以下的例子，完全沒被提到。老聃彷彿「就這樣」便「消失」了！這樣的文章，討論它都是在浪費生命！可是就是這樣荒謬透頂的文章，居然能在學術界取得一定地位，錢穆還能因此被奉為「國學大師」！也真是夠諷刺的了！至於連這種素質的論文都會信的學者，我們絕不期待他們能正確的理解古文與知曉邏輯學、訓詁學的重要。當然更不期待他們能理解「真相」！以下僅就幾點「謬論」做點補充說明：

關於詹何，所有相關文獻引如下：

〈列子·湯問〉：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鶻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列子·說符〉：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呂氏春秋·重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謔！日之役者，有執蹠蹠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韓非子·解老〉：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淮南子·原道〉：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淮南子·覽冥〉：

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

〈淮南子·道應〉：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于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淮南子·詮言〉：

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後漢書·張衡列傳〉：

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蒯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弈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數子。愍三墳之既積，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抱朴子·外篇·逸民〉：

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季灰！

〈抱朴子·外篇·知止〉：

抱朴子曰：祝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鹹蹈云物以高驚，依龍鳳以竦跡，覘輶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途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繆，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覲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弭楫於沖風之前，瞻九牛害而深藩，望密蔚而曾逝，不托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

關於「詹何」的年代，唯一能給出線索的就是〈列子·說符〉與之對談的「楚莊王」，而事實上，遍查先秦以後至宋朝《太平御覽》，「楚莊王」並沒有其他「異文」，也就是與詹何對談的「楚王」始終指向「楚莊王」，那麼我們試問，錢穆是根據什麼把「楚莊王」「搞成」「楚頃襄王」的？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一三一、楚頃襄王又稱莊王考〉：

余考楚頃襄王又稱莊王。《楚策》：「莊辛謂楚襄王。」高誘注《荀子》，作：「莊辛謂楚莊王。」其證一也。

（金氏《國策補釋》亦言之。）〈韓非·喻老〉：「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先慎據楊倞注《荀子》，改作莊子，〈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作莊周子。莊周年世固可與楚襄相接，（參讀《考辨》第八八。）然此莊子或乃莊

辛，周字蓋或人旁注耳。）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莊蹻之事，又見〈荀子·議兵篇〉，云：「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

（金氏《國策補釋》云：「垂沙乃重兵之訛，唐蔑即唐昧也。」）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此三事相續。垂沙之敗在懷王時，鄢郢之舉在襄王時，莊蹻為盜，據《韓非》書在莊王時。然懷、襄之間別無莊王，則莊王即襄王之證二也。楊倞注《荀子》引《韓非》書杜子諫曰作莊子。莊子即莊辛，與楚襄王同時，此莊王即襄王之證三也。

（《御覽》八二，《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引《韓詩外傳》云：「楚襄王聘莊子為相」，亦莊辛。）自《史記》誤以莊子為莊周，謂與楚威王同時，遂誤以莊蹻亦楚威王時。故〈西南夷傳〉云：「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高誘注〈淮南·主術〉，亦從《史記》，謂莊蹻在威王世。又高注〈呂氏·介立〉云：「蹻在楚成王時」，同出一人，不應互歧。成亦威字形近而誤。）而曰：「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此由史公見先秦古籍以莊蹻為莊王時人，而不知莊王即襄王，遂誤謂莊王在春秋世，不得其解，而以莊蹻乃莊王苗裔矣。

（《索隱》云：「莊蹻，楚莊王弟。」則亦謂莊王時人。惟謂莊王弟，為審何據。）又云：「蹻定滇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通典》辨之曰：「楚自威王后，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取巫、黔中。若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陷巫、黔中，道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後漢書》則言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通志》亦以范《史》為定。

（《志疑》謂：「蔚宗蓋依《華陽國志》。」今按〈史記·西南夷傳〉正義〈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國志》，皆云頃襄王之時，則梁說是也。惟今本〈國志·南中志〉云：楚成王遣莊蹻伐夜郎，蓋經後人妄改。）此又莊王即襄王之證四也。〈韓非·奸劫弑篇〉又云：「楚莊王之弟春申君。」夫春申君侍頃襄太子質秦，則韓非所指莊王，上不能為懷王，下不能為考烈王，其即謂襄王明矣。此又莊王即襄王之證五也。

（〈史記·滑稽列傳〉：「楚莊王時，有優孟語王曰：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集解》：「裴駰案：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然《史》序優孟事在淳于髡後，優旃前，楚莊王在齊威王、秦始皇之間，亦即襄王也。惟史公不能辨，又誤以牽涉于春秋時之莊王與孫叔敖，遂轉

迷歧耳。）戰國時君多有異諡兼行，後人不考，如莊躋之事，遂糾結而不可解矣。

從以上的引文，我們不難發現錢穆之所以敢如此「篤定」的說所謂「楚莊王」是「楚襄王」，其原因竟是因為他缺乏應有的「校勘常識」所致！豈不可悲！這種弄錯「諡號」的情況是非常常見的，這個王在甲文中被弄錯成另一個王，並不表示所有其他文章中這個王都可以是另一個王！這是常識，而錢穆竟自以為是一種「證據」！豈不荒謬可笑！

按照錢穆的邏輯與證據，我們想請問的是，關於「詹何」的所有例子，包含先秦以後的所有引文裡，可有其他引作其他楚王的例子？如果沒有，何以就

能在沒有其他異文的時候把能確定詹何的唯一一條時間線索「隨意」的進行「修改」。如果按照錢穆自己引的所謂「證據」（顯然錢穆並不理解這是一種常見的錯誤，而以為「楚頃襄王又稱莊王」，荒謬可笑！），那麼難道我們不能說所謂的「楚莊王」其實是「楚威王」嗎？反過來，我們再看看疑古者怎麼利用〈曾子問〉的「諡號」錯誤的？因為〈曾子問〉把「衛君」的「諡號」弄錯了，變成了「衛靈公」，於是整篇連孔子協助老聃辦葬禮遭遇日食的記載都被說成是假的，而這裡錢穆連個異文都不用，就可以直接把「楚莊王」改成「楚襄王」，然後再把「詹何」隨意的說成是《老子》的作者！這種雙重標準是如何可悲呢？且如果錢穆按照自己的邏輯，難道他不該承認〈曾子問〉弄錯「諡號」的「合理性」嗎？與「詹何」對談的「楚莊王」可以在沒有「相關」「異文」與內文線索（主要是所說王與時間不合，如〈曾子問〉的衛靈公。）、其他文獻線索的情況下，僅因曾經被弄錯過幾次，就可以隨意被說成是「楚襄王」，甚至說「楚襄王」又稱為「楚莊王」，如果按照古籍中已經存在的其他錯誤，還有誰不能隨意竄改歷史？何況為什麼「楚莊王」可以變成「楚襄王」，「衛靈公」就不能是其他衛君的錯誤？可是錢穆確實就是不信〈曾子問〉，否則試問錢穆要怎麼繼續編造故事下去？退一萬步說，即便「楚襄王」又能叫做「楚莊王」吧，試問錢穆是根據什麼其他線索來判定究竟與詹何對談的是「哪一個」「楚莊王」？錢穆這種把唯一能證明一個人的重要時間線索，用這種荒謬可笑的「證據」就進行了「時間轉移」，實在令人「歎為觀止」！只是如果考證文章可以如此隨意而為，不講究與文本直接相關的客觀證據，究竟考證的意義何在？又有誰不能隨意修改、竄改、編造歷史？

按照錢穆把《老子》的著作權轉移給詹何的邏輯，我們不免產生疑問。疑古者們一開始是怎麼否認〈曾子問〉中老聃與《老子》的作者是不一樣的人

呢？他們說〈曾子問〉中老聃是一個「拘謹守禮」（守喪禮）的人，而《老子》中卻有「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的說法，疑古者在完全忽視《老子》中重視「喪禮」的相關文字的情況下，便得出顯然老聃不是《老子》的作者這樣的結論。可是我們現在反過來看看錢穆是怎麼把《老子》的著作權轉移給詹何的？他說：「太史儋以神讖著，詹何以前讖名，益復荒誕。……今不得已而必為《老子》五千言尋其作者，則詹何或庶其近之。」再看〈老子·三十八〉：「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如此，則依照疑古者的邏輯，一個以「前識」著稱的人，如何會是《老子》這本寫著「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的文字的作者？疑古者的雙重標準，我們毫無意外的又再次領教了。

參考書目

個人著作

個人著作由於遭到封殺，因此只有電子版。電子版都是以個人名義出版。

[《孫子兵法論正》](#)，2021。

[《道德經論正》第二冊《老子弟子與老子》](#)，2021。

[《道德經論正》第三冊《先秦諸子與老子》](#)，2021。

[《道德經論正》第四冊《老子與先秦諸子上》](#)，2021。

[《道德經論正》第五冊《老子與先秦諸子下》](#)，2021。

[《道德經論正》第六冊《〈老子〉成書時間考》](#)，2021。

[《道德經論正》第七冊《考證概論》](#)，2021。

[《道德經論正》第八冊《疑古謬論綜駁》](#)，2021。

[《孫臏考》](#)，2021。

[《鬼谷子》公案徹底終結](#)，2021。

[《子華子》公案徹底終結](#)，2021。

[《亢倉子》公案徹底終結](#)，2022。

網站與檢索系統

本書參考古籍，如果檢索系統沒有標點就自行標點，如果檢索系統文字有誤就根據相關版本進行校正。讀者以通行本視之即可！這裡就不再一一條列了。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

漢リポ Kanseki Repository：<http://www.kanripo.org/>

版權頁

書名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的文化貢獻
作者	朔雪寒（葉原宏）
出版日期	2022.4.18
再版日期	2022.6.5
出版者	一個人出版
版本編號	1.1